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ISSN 1000—7326

(191)

1990 · 1

国家二级企业、省级先进企业——鹤山毛纺织总厂在改革开放中腾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专号



世界学生新型用品
小太阳

为了您孩子的
健康发育，
请使用保
健书包

保健书包

(专利产品，仿冒必依法追究)

这是一种最新型的可使青少年学生在背书包时避免出现“驼背”现象，并保持自然挺胸的优良姿势的书包。



过去，学生使用单背带书包，容易形成脊骨侧歪，所以现在由双带背式书包逐渐代替了。

但目前国内外市场上的双带背式书包，在力学结构上仍很不合理。书包的重量常集中斜压到学生的腰背部。为了抵消这种斜来的压力，学生常呈现“驼背”的姿势（见左图）。这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发育会造成不良影响。



小太阳保健书包是由中国深圳市颈腰椎病专家、香港治脊学会特约顾问关令华医师创新设计的。书包在背用时呈垂直状态，其重量不会集中斜压到学生的腰背部，避免学生出现“驼背”现象。

小太阳保健书包之所以能使青少年学生避免“驼背”现象，除背带在力学上合理外，主要功能是靠后背板，它是根据青少年学生人体背部生理弧度相适应，使用时保持自然挺胸的优良姿势。

小太阳保健书包是我国至今唯一经过多位高级骨科教授鉴定，认为是“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健康发育”的书包，并建议早日推广使用这种书包。

对保健书包（专利号87213918）的鉴定意见

关令华医师设计发明的保健书包（中国专利87213918号）在构造和功能上都有创新性，在力学结构上能有效地分散书包对学生腰背部的压力。保健书包背侧衬板的形状与人体背部生理弧度相适应，可使青少年儿童在背用书包时保持自然挺胸的优良姿势，避免发生胸椎后突畸形。建议早日推广使用此种书包，以有利于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发育。

天津市骨科研究所所长 兼中国骨伤科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顾云五

顾云五

湖南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院长
骨科教授

孙材江

孙材江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骨科
教授

马元璋

马元璋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教授

袁浩

袁浩

天津市骨科研究所副主任医师

李长信

李长信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于柳江

广东省第三届儿童用品优秀新产品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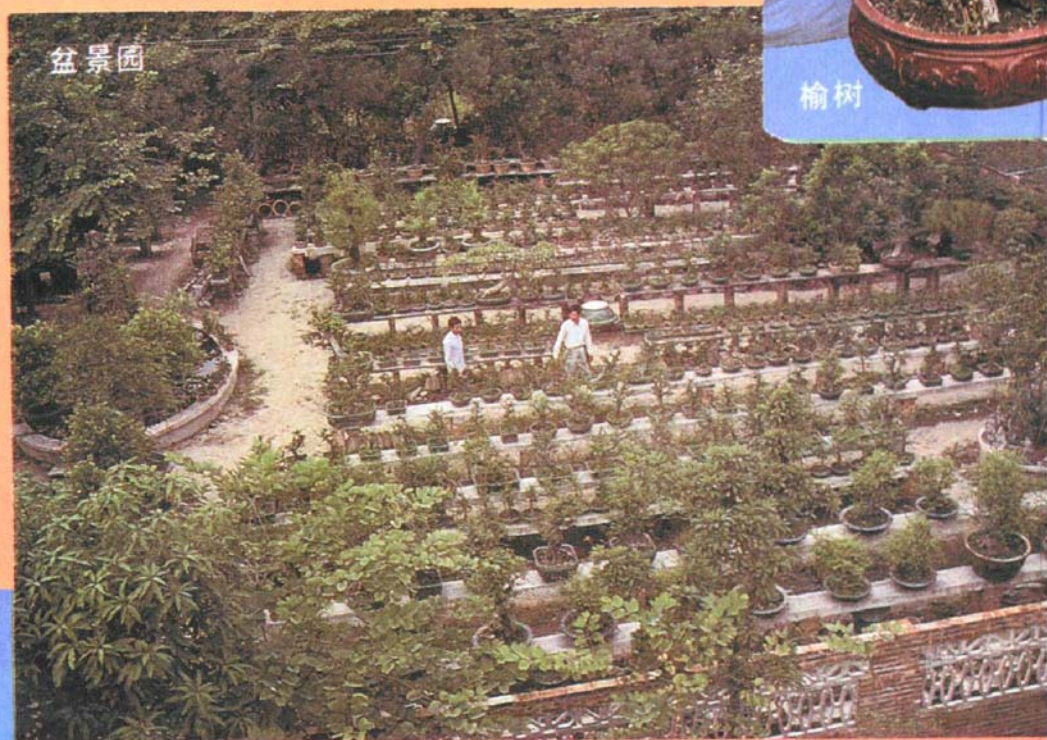
最受儿童喜爱的儿童用品奖

广东顺德县乐从镇旅行袋厂独家生产

广东顺德县乐从镇新马路83号 电话：61400 61354 61608 61704 厂长 李元璋

花的故乡 美的世界

陈村是二千年种花史的著名花乡，
陈村花卉研究所是专业从事花卉科
学研究的单位，花卉品种1500多个，
并有盆景工厂化生产和栽培及园林绿化
工程等。占地100亩，设盆景园、兰花园、
茶花园、盆栽桔果园、绿化草木园、园林绿化
工程部和花卉科研实验组。创制的小盆景大量销
往港澳地区和美、法、荷等欧美国家。代客户办理
出口检疫、包装和运输等一切手续，讲究信誉，欢迎
各界光临惠顾。



广东顺德县陈村镇花卉研究所

电话：51946

廣州市南方交電企業公司

Guangzhou Nanfang Transporting & Electric Equipment Enterprises Co.



公司下设五个专业生产厂，共6万M²生产场地，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远销日本、欧美、中东、东南亚以及国内。主要产品：恒宝牌座椅系列（1989年全国星火计划金奖）、恒宝牌豪华型拉闸门（1989年全国星火计划金奖）、虎头牌气筒（广州市优产品）、自行车手闸（部优产品）、自行车车架、车把三大部件，摩托车制动系统，手推车，各式脚轮，组合式衣帽柜等。 本公司宗旨：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信守合同，愿与各方真诚合作，

经理：凌国强

地址：广州市槎头 电话：628947 628611 电挂：0245 邮编：510436

京有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三十週年

後底
的唯
物主
義者
是無
所畏
懼的

任仲夷
一九五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三十周年紀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

與中國國情的結合。

一九八九年冬

劉田夫

贯彻双百方针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

林若
一九五九年十月

社會科學理論需要

要大發展

祝賀廣東社科聯成立三十周年

景選平
一九八九年
十二月

团结合作探索科学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广东社科联三十周年

许非
五五年十一月

但开风气

正为时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三十周年

借题发挥句以贺

吴南生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

团结协调 联系广泛

为促进广东改革开放

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廿周年纪念

曹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鳴鑼開道！

祝賀

廣東省社科聯成立三十周年

楊應彬



希望多做些善
及馬克思主義的
教育工作

广东省社研会三三十四年
德慶

陈叔平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

積石尋河端馬列
集思廣益振中華



己巳仲冬

歐初



身勤澆灌結碩
果實事求是
綻新花

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三十周年

張濟書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学术研究杂志社

谨向鼎力支持社会科学事业的海
内外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并祝新
春快乐，万事顺利！

We hereby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you, the personalities of
various circ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your supporting the undertaking
of social sciences on behalf of us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and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We'd like t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nd
the very best of luck in your busi-
ness.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祝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社会科学
界紧密团结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广州市社会科学
研究所）谨祝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并
向全省学术理论界致意！

肇庆市人民政府

谨祝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 欢迎海

内外专家、学者、客商光临肇庆，为振兴

肇庆出谋献策！

韶 关 日 报

祝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志庆

中 国 银 行 广 州 分 行

广 州 国 际 金 融 学 会 贺

中国银行广州国际金融研究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祝贺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加
强合作，共图发展。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财政学会
祝贺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

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志庆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广州分公司贺

本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主要对外贸易分支机构，是工贸和技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主要经营轻工、化工、光学和电子工业的产品及技术、设备、材料的进出口贸易；承办来料、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劳务出口业务；承包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服务。

本公司一贯重合同、守信用，有较高国际信誉，已同世界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公司、企业建立了经贸关系。年出口能力达数千万美元。

本公司所办的北方大厦、国泰宾馆设施豪华、服务精优方便。热诚欢迎世界各地朋友同我们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关系。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76号 电传：44211 CNICG CN

电挂：1056（广州） 电话：（020）753828

传真：（020）766173

繁荣社会科学 促进经济建设

祝贺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

广东省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总经理：崔 河

电话：34394 36221 34466

地址：清远市南埗路一号

电挂：1420 邮编：511515

下 属 单 位

清远市泰和棉纺厂	电话 33321	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供销公司	电话 34384
清远市广安染织厂	电话 32191	清远市纺织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电话 36354
清远市远威针织印染厂	电话 36451	清远市纺织工业物资公司	电话 36345
清远市第一针织厂	电话 36297	清远市纺织工业工贸公司	
清远市远光纸箱厂		清远市纺织工业进出口公司	电话 36204

祝贺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

厂长 陈 庚

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是一间综合性食品加工企业，下设5个分厂及一个贸易公司。主要产品有冰糖、冰片糖、广东可乐、菠萝汁、荔枝汁、豆奶、各式糖果、饼干等20多个品种，其中冰糖荣获1989年广东省优质产品称号，冰片糖荣获1989年广东省名优产品奖，菠萝蛋饼干荣获1988年广东轻工四新产品优秀奖。

本厂坚持“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产品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1988年被海康县人民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称号，1989年被湛江市人民银行授予“信用优良单位”称号，在质量管理验收、计量验收、统计工作规范化验收、节能工作验收等方面，已上省级先进企业。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广州至海南交通枢纽海康城北面，交通便利，是洽谈业务的好地方。

厂址：广东省海康县雷城西湖大道124号

电话：812356 812572

电挂：0126 邮编：524200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

庆祝广东省社联成立30周年，谨向关心支持、提携青年学者成长的省社联、老一辈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

《华夏》杂志社

祝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华夏》双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以宣传华侨、华人、介绍侨乡新貌及海外华侨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刊物，设有“华夏新议”、“特写通讯”、“粤海侨踪”、“赤子心影”、“域外揽胜”、“侨苑艺林”、“经贸之窗”等栏目，及提供有关出国移民留学等外事政策，外向型经济信息，为各大企业与海外合作起桥梁作用。欢迎直接向本社订阅、邮购、零售。每期1.65元（含邮费），全年10.00元（含邮费）。

地址：广州市侨光路四号二楼 电话：336888—5732

邮编：510115 开户银行：广州市一营 帐号：089—01—08612

祝贺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全体同仁谨向社会各界人士致意!

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工商局同意在佛山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国营企业,900多个业务网点遍布世界各地,与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多家厂商和进出口商有密切的贸易联系,年营业额超亿元,税利超一千万元。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题辞的、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科普综合大楼将于近期投入使用。

经营范围

1. “科特”牌V P S电源系列:
500W; 1000 V A; 2000 V A; 3000 V A; 5000 V A; 7.5~75 K V A。
2. 微机、小型机及各类消耗性材料。
3. 计算机房外围设备, 各类抽湿机, 吸尘器。
4. 各种进口名牌空调机, 发电机。
5. 各种进口名牌录、摄像设备, 大 $\frac{1}{2}$, $\frac{3}{4}$ 录像带。
6. 各种进口办公现代化设备, 文化用品, 三洋牌保密用碎纸机。
7. 微机、电子、V P S电源的维修用元器件, 密封式电池。
8. 各种医疗器械, 玻璃器皿, 化学试剂。
9. 经销: 中国华地实业公司专利产品, 华地牌去油洗手孔。

公司法定人: 许祥焱

总经理: 许祥焱 副总经理: 陈建华、杨沛霭

公司法律顾问: 佛山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家钜

公司地址: 佛山市燎原路八座

电话: 223120 223804 248084

图文传真: (0757) 223120

广东省



中国旅行社

祝贺广东省社科联成立30周年

业务范围

组织省内外旅行团和赴港澳游、泰港游、泰国游；代办私人出国签证；代售代订国内外交通客票和住房；接受办理国内外旅客及行李的接送和联运业务；华侨大厦、华侨酒店设备先进，服务周到，承办各类型宴会、酒席；中侨总公司广东分公司设中旅商场、免税商场，经营旅游和免税商品；储运贸易公司经营港中旅售券广州提货，代办客货运输和报关仓储业务；汽车公司备有150多辆各类豪华客车为接送旅客服务；洗涤公司提供干湿洗、熨服务。

地 址：广州市侨光路2号 电 话：336888
电 挂：3307 电 传：44217 CTS CN
电话传真：332247 邮政编码：510115

属 下 单 位

广州华侨大厦	地址：广州侨光路2号	电话：336888	
广州华侨酒店	地址：广州站前路	电话：663488	
广东省中旅社汽车服务公司	地址：广州站前路	电话：663488	
中侨总公司广东分公司	中旅商场	地址：广州江南大道中126号	电话：447490
	免税商场	地址：广州侨光路	电话：336888
广东省中旅社洗涤公司	地址：广州三元里	电话：664633	
广东省中旅储运贸易服务公司	地址：广州侨光路	电话：336888	
广东华誉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侨光路2号	电话：336888	

祝贺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成立30周年（1960—1990）

（排名不分先后）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暨南大学
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华南理工大学社科系
广东省计划委员会	广州外国语学院
广东省农业委员会	广东民族学院
广东省经济委员会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广东省体制改革办公室	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中共广东省委讲师团	中共江门市党校
广东省广播电视厅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高等教育局	广州市总工会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广州市体制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
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翁源县人民政府	广东省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
中山大学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广州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保险研
究所
顺德县陈村花卉研究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广州石油化工
总厂
广州合成纤维厂
万宝电器集团公司
南方大厦股份集团公司暨南方大厦百
货商店
广州南方交电企业公司
佛山市陶瓷工贸集团公司
广州市南方面粉厂
深圳市新元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县乐成日用电器厂
顺德乐从镇旅行袋厂（小太阳保健书
包厂）
广东顺德贸易旅游中心
广东国营顺德糖厂
顺德县桂洲四基长塘打火机厂
鹤山毛纺织总厂
韶关第一棉纺织厂
韶关毛巾厂
韶关无线电五厂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华侨商品供应公司
广东省新华书店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东省邮局报刊发行局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
青海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
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筹）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茂名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化州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信宜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电白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佛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韶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乐昌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乳源瑶族自治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学术论坛杂志社
南雄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金融学会
曲江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经济学会
始兴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人口学会
江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省会计学会
湛江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农村金融学会
清远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省农村经济学会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省统计学会
肇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省价格学会
梅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劳动学会
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筹)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
新华社广东分社	广东省物资经济学会
中新社广东分社	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
人民日报社广东记者站	广东营销学会
光明日报社广东记者站	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
经济日报社广东记者站	广东省小经济研究会
南方日报社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学会
羊城晚报社	广东省农垦经济学会
广州日报社	广东省计划学会
中国金报社	广东保险学会
文明导报社	广东税务学会
新华文摘编辑部	广东省审计学会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广东省经济法研究会
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	广东经济特区研究会
岭南学刊编辑部	广东省旅游学会
武林杂志社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学会
计划与发展杂志社	广东城市金融学会
创业者杂志社	广东省投资学会
港澳经济杂志社	广东粤港澳经济关系促进协会
国际金融导刊编辑部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韶关电视台	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
湖北社会科学杂志社	广东哲学学会
福建论坛杂志社	广东省逻辑学会
江汉论坛杂志社	广东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

广东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广东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广东党建学会
广州工人运动学会
广东统一战线研究会
广东学校青年工作研究会
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
广东省社会心理学会
广东民俗学会
广东省民政学会
广东省妇女学研究会
广东社会学学会
广东老年学研究会
广东青年研究会
广东省城市科学研究会
广东华侨研究会
广东公共关系学会
广东省法学会
广东省检察学会
广东省监察学会
广东省写作学会
广东省世界语学会
广东中国语言学会
广东外国语言学会
广东外国文学学会
广东中国文学学会
广东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广东群众文化学会

广东美学学会
广东历史学会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
广东华侨历史学会
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
广东孙中山研究会
广东华商报史学会
广东农史学会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会
广东侨刊乡讯研究会
广东省地方志学会
广东康梁研究会
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广东教育学会
广东省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
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广东省人才学研究会
广东省中专教育研究会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
广东图书馆学会
广东省档案学会
海南省经济学会

同 贺

热烈祝贺广东省社科联成立30周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部分图书介绍

政治理论

伟大祖国的广东(1—4卷)		
本丛书编写组	精、平装	24.00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本书编选组	1.70元
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	本书编选组	2.80元
哲学简明教程	张江明主编	1.10元
问题中的哲学	黄楠森主编	2.35元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	刘 嵘	0.66元
列宁《哲学笔记》若干问题研究		
刘歌德等		3.70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哲学分册		
李又华等主编		1.05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分册	李又华等主编	1.15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分册	李又华等主编	0.66元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本书编选组		3.40元
中国与社会主义		
邱金用 吉布武编著		1.20元
两个社会面面观	叶煜荣	1.20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话	张江明主编	2.10元
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问答		
本书编写组		0.70元
党章通俗讲话	本书编写组	0.87元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简论	梁木主编	2.60元
新时期的社会矛盾	梁渭雄等	1.50元
改革者的哲学	钟锦泉	1.25元
科学预见概论	江家齐	1.25元
企业管理哲学	袁惠民等	1.80元
领导就是服务	严子楞主编	2.00元
大众心理学	陈汝懋主编	1.70元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刘夏帆主编	0.63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教程		
杨日隆等主编		3.30元

经 济

大众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本书编写组编		3.10元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卓 炯	2.00元
政治经济学新探	卓 炯	2.25元
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	王 琢	1.20元
宏观经济调节论	王 琢	2.30元
我国当前经济效益问题	赵元浩	2.50元
香港经济概论	方振鸿	2.90元
当代中国经济概述	张剑编	6.45元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沈光耀	3.85元
大系统论——预测决策管理方法		
萧南楠		3.50元
广州工业四十年	汤国良主编	48.00元
广东省农业资源要览	本书编写组	8.00元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学		
黄守登 陈鸿宇主编		4.00元
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伍爱等	2.90元
国际市场学	梁世彬 罗国民	2.10元
企业公共关系必读	曹小元 黎岳梁	1.15元
广告学	采 湘 毓朗译	2.05元
韶关投资指南	本书编写组	30.00元

法 律

《民法通则》通俗讲话		
李捷云 梅卓萃		0.50元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讲话		
省普法常识办公室编		0.36元
广东省地方性法规汇编(1—2辑)		
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编		2.50元
普及法律常识学习问答		
省普法常识办公室		0.78元
人民调解知识手册	陈饮一	2.90元
经济法常识	程信和	1.50元
企业经济法律知识学习问答		
何宝藏 李捷云主编		2.10元

宪法常识问答	李捷云	0.57元
民法通则常识问答	云飞	0.95元
刑法常识问答	张羽等写	0.85元
刑事诉讼法常识问答	王学琛	1.15元
继承法常识问答	徐名准	0.33元
经济合同法常识问答	黄木深	3.30元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常识问答	张少铨	0.53元

语言·文学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曾宪通编注	1.85元
诗词赏会	周汝昌	5.90元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	叶嘉莹	1.00元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叶嘉莹	1.95元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3卷)	詹伯慧 张日昇主编	58.00元
姜白石词校注	夏承焘校	1.10元
艺衡馆词选	梁令娴编 刘逸生校点	1.25元
白香词谱	柳诒校订	0.75元
唐诗小札	刘逸生	1.05元
宋词小札	刘逸生	1.40元
中国古代文学史问答	曹础基等	2.20元
柳亚子诗选	徐文烈笺 刘斯翰注	2.50元
文学概论新编	林焕平主编	2.25元
文学入门	饶芑子 谭志图	1.60元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1—25种)	刘逸生主编	
历代小说笔记系列(1—10种)		
语文丛书(1—25种)	潘允中 唐启运等主编	

历史·地理

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	杨荣春	4.40元
简明广东史	蒋祖纛 方志钦主编	7.50元
近代史思辨录	陈旭麓	2.70元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蔡尚思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蔡尚思	5.70元
五四运动论文集	彭明	1.18元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	彭明	2.50元
中国革命史丛论	丁守和	3.35元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概述	向青	0.65元
广州起义研究	广州市委党史办编	2.97元
广东农民运动	杨绍练 余炎光	2.10元
广东抗战史研究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编	3.00元
香港史话	金应熙主编	2.40元

孙中山研究(第1辑)		
	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编	3.20元
孙中山论	张磊	3.50元
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	胡华等	0.60元
瞿秋白年谱	周永祥	1.70元
胡汉民评传	周聿峨 陈红民	3.00元
南粤英烈传(1—5集)		
	广东党史人物研究会等编	18.45元
近代广东名人录(1—2集)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籍华侨名人传	温广益主编	2.60元
华侨沧桑录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20元
广东风情录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15元
中国经济地理	吴郁文 林仲达	3.40元
中国的热带	于显芳等	2.80元
广东省地理	刘琦 魏清泉	3.40元
南海诸岛	曾昭璇等	1.60元
富饶的珠江三角洲	蔡人群等	
广东地理丛书(1—11种)		
	徐俊鸣等	

工具书·年鉴

中国书法大辞典(上下册)		
	梁披云主编	54.00元
中华文化辞典	丁守和主编	42.00元
红楼梦辞典	周汝昌主编	14.00元
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李新魁主编	1.30元
潮州音字典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1.95元
广州音字典	饶秉才主编	2.10元
海南音字典	梁猷刚主编	6.50元
汉语虚词词典	唐启运 周日健主编	7.20元
汉语谚语小词典		
	中大中文系本书编写组	2.00元
简明政法词典	本书编委会编	8.50元
分类成语词典	王理嘉 侯学超编著	6.40元
小学生字典	北大中文系本书编写组	1.20元
英语常用2000词	赵清华等	4.90元
简明德汉词典		
	广州外语学院本书编写组	5.80元
汉英分类插图词典		
	广州外语学院本书编写组	4.70元

广东年鉴
珠海年鉴
深圳经济特区年鉴
汕头经济特区年鉴

岭南学术论丛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丁宝兰主编	2.45元
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	章沛	1.15元
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罗克汀	2.50元
孙中山哲学研究	张江明主编	2.55元
人口问题概论	刘渠	2.10元
宋词散论	詹安泰	0.76元
詹安泰词学论稿	汤肇民整理	1.70元
古典文学论集	詹安泰	0.78元
唐宋诗词赏析	郑孟彤	2.65元
汉魏六朝诗歌赏析	李文初	2.20元
唐宋咏物诗赏鉴	陈新璋	2.15元
中国文学批评简史	黄海章	1.25元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	黄海章	2.30元
求索小集	王季思	1.60元
庄子浅论	曹础基	2.25元
古音概说	李新魁	0.39元
求是集(1、2集)	陈乐素	5.30元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关履权	1.60元
宋元文史研究	陈乐素主编	2.90元
碎砖集	杨应彬	1.85元

经济改革开放丛书

过渡社会主义论	王琢 廖曙辉	1.50元
广东企业文化	周圣英主编	3.90元
新的探索	黄浩主编	4.80元
改革之星	黄浩 易振球主编	2.80元
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曾东汉主编	1.10元
广东改革开放研究	本书编选组编	5.20元
改革开放与广东	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编	3.90元
成功之路	黄浩主编	7.00元
广东企业家列传	刘维明主编	7.00元

天风阁丛书(部分)(夏承焘主编)

饮水词	清·纳兰性德撰	冯统编校	1.30元
梅村词	清·关伟业撰	李少雍校	1.40元
衍波词	清·王士禛撰	李少雍校	1.85元
曝书亭词	清·朱彝尊撰	关肃森编校	3.60元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

崖州志	郭沫若点校	2.05元
岭表录异	鲁迅校勘	0.37元
南汉书	林梓宗校点	0.70元
广东通志·前事略	李默校点	0.66元
楚庭稗珠录	羊阜校点	0.64元
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	杨伟群校点	0.64元
岭南画征略	周锡馥点校	2.75元
粤讴	清·招子庸撰 陈寂评注	1.40元
曲江集	唐·张九龄著 刘斯翰校注	5.90元
岭南三家诗选	刘斯奋 周锡馥选注	1.10元
历代名人入粤诗选	黄雨选注	3.80元
苏曼殊诗笺注	刘斯奋笺注	0.73元
康有为诗文选	陈永正选注	2.50元
梁启超诗文选	方志钦 刘斯奋选注	2.45元
黎简诗选	周锡馥选注	1.35元
宋湘诗选	周锡馥选注	2.80元
黄节诗选	刘斯奋选注	1.95元
黄遵宪诗选	钟贤培 管林等选注	2.80元
邝露诗选	梁鉴江选注	1.80元
岭南历代诗选	陈永正选注	6.50元
岭南历代词选	朱庸斋选 陈永正注	3.80元
丘逢甲诗选	李树政选注	1.00元

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诗词曲论文集	罗忼烈	0.53元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黄天骥	2.45元
杜诗论稿	李汝伦	
西厢记艺术谈	吴国钦	0.76元
陶渊明论略	李文初	1.95元
谈词随录	廖辅叔	1.80元
意境·风格·流派	王昌猷	2.30元
红楼梦新探	曾扬华	2.90元
红楼梦人物新析	吴颖	2.60元
孔尚任与桃花扇	洪柏昭	2.55元
史记人物画廊	黄绳	4.20元

广东少数民族研究丛书

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4辑)	广东民族研究学会等编	
黎族简史	本书编写组	0.82元
广东少数民族	本书编写组	0.32元
广州满族简史	汪宗猷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概况	本书编写组	2.00元

广东近现代史料丛书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	广东文史馆	3.65元
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陈周棠主编	2.80元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省政协文史研究会编	1.35元
省港大罢工史料	广东社科院历史室编	2.37元
黄埔军校史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4.90元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3辑)	广东省委党史办等编	
中共“三大”史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1.15元
劳动者		0.98元
青年周刊		1.15元
东江纵队史料	广东省档案局编	3.75元
东江革命根据地财税史料选编	惠阳地区税务局编	3.50元
海陆丰革命史料(1—2集)	海丰、陆丰县委党史办编	7.00元
普宁革命史料	普宁县委党史办等编	4.90元
广州外县工委史料	广州市委党史办编	3.30元
彭湃研究史料	本书编辑组编	1.05元
苏兆征研究史料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等编	2.80元
叶挺研究史料	中共惠州市委、惠阳县委党史办等	5.20元
黄居仁研究史料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	3.85元
谭平山研究史料	广东省委党史办等编	4.95元
冯白驹研究史料	海南区党委党史办编	6.30元

革命回忆录丛书

东纵一叶	王作尧	1.20元
琼岛烽烟	庄田	1.00元
巍巍五岭	黄业	
珠江怒潮	谢立全	
挺进粤中	谢立全	0.82元
浴血天涯	马白山	1.05元
逐鹿南疆	庄田	0.75元

华南军史丛书

东江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	2.10元
琼崖纵队史	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著	3.60元
两广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	3.20元
粤赣湘边纵队史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	
珠江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	

文集

阮啸仙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2.50元
李春涛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1.80元
杨匏安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1.90元
朱光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4.70元
陈唯实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2.80元

当代大学生丛书

社会主义四百年(上)	于幼军 黎元江	2.15元
人类文明纵横谈	潘龙海主编	0.70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洋溟	2.10元
经典人格论	郑敦淳等	2.30元
社会学趣谈	顾晓鸣	1.05元
科学探索与辩证方法	李辛生主编	1.90元
著名科学家谈智力开发	本社编	0.70元
大学生口才	谢盛圻	即出
大学生心理学	戴清海	1.40元
大学生恋爱观	李萍等	0.90元
体育欣赏	唐汉滔	1.30元

人与创造丛书

创造性想象	王明利等译	3.00元
创造是心智的最佳活动	梁彪译	2.80元
创造是精确的科学	魏相 徐明泽译	2.10元
综合与创造	张华夏	1.50元
发现与发明过程方法学分析	徐明泽 魏相译	2.40元
发明学入门	谢燮正	2.00元
发明导游	谢燮正 王道生译	2.80元
高效学习与创造技法	吕刚华等	1.25元
智慧书	谢燮正	2.40元
现代人学	刘悦伦等	2.50元
人与人	庄稼	2.00元
创造中的自我	张唐生	2.25元
创造性教育与人才	刘志光	1.55元
军人素质的延伸	王锦辉 徐布加	2.70元

创造开发的实践 王明利 盖莲香译 2.80元

现代青年智力与能力丛书

日常实用口才 吴绿星 2.80元
增强记忆力的奥秘 王维 2.65元
交际能力与技巧 曲渊 2.50元
你能出类拔萃 王荣武 何应欢 2.70元
创造你的明天 侯丽辉 2.50元
走向成功与成熟 陈创生 陈述 3.60元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丛书

悲惨世界 曹思彬 曹磊改写
席勒戏剧故事选 郭正元 蔡义为改写
瘸腿魔鬼 穆夫改写
三剑侠 苏炳文改写
巴黎圣母院 易新夏改写
奥列佛尔 秦原改写
名利场 晓兰改写
果戈里喜剧故事选 曾应诗改写
海蒂 邓汝锐改写
双城记 李彤改写
笑面人 黎敏子 黎锦鸿改写
布登勃洛克一家 魏家国改写
大卫·科波菲尔 麦世忠改写
莫里哀戏剧故事选 章以武 艾鸣等改写
斯巴达克思 易新农改写
艾凡赫 周蜜蜜改写
汤姆·莎耶历险记 陈虹 邓启龙改写
战争与和平 李而已改写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 吴绿星改写
白鲸 陈骜改写
王孙梦 陈克吾改写
堂·吉珂德 区嘉年改写

教学参考丛书

中学语文教学探讨 刘清涌 0.93元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重点难点解说 黄成稳 2.15元
高中语文优秀教案课堂实录选评 顾德希主编 2.35元
中学德育大纲设想 王屏山 李锡槐主编 1.65元

广东省中小学教改实验成果论文集

省教育厅教材教研室 1.80元
中小学课堂教学经验荟萃丛书(1—3集) 李慧君等
中学数学教学一得集 吕学礼 1.00元
小学数学引探教学法 深圳市教委教研室 2.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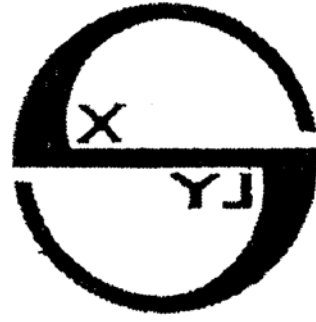
中学生课外读物

中学语文现代汉语语法 王建伦 0.44元
中学语文古代汉语常识 陈振寰等 0.58元
外国文学名著选讲 汤毓强主编 1.60元
中学课程辅导丛书(1—4册) 廖晏安等
中学生作文训练丛书(1—4册) 陈钟梁等
初中作文循序训练(1—3册) 李清主编
中学作文常用词辨析 黄宛方 1.40元
中学作文词语分类手册 谢国模等编 1.80元
中学生获奖作文选评 执信中学编 0.75元
中学生获奖作文精选 广雅中学编 1.60元
初中古诗文注译 何增光等 1.80元
高中古诗文注译(3种) 赖世达等
初中古诗文集解(1—3册) 余清逸主编
数学思维能力的训练 王屏山 傅学顺编著 2.55元
中学数学实际问题选 吕学礼 1.60元
数学的智慧 何培尧 1.65元
几何定值问题百例 黄则兴等 1.30元
几何组合计数趣谈 柳柏濂 1.25元
数的发展与应用 刘达中 1.00元
怎样使用微型电子计算机 朱铁夫 2.20元
初级计算机原理和使用 陶振宗 吕学礼 1.40元
中学生算图集 执信中学编 1.30元
中学生怎样学数学 陈焯欣 黄敬恕 2.40元
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几何题 谢国生 2.40元
中学物理解题方法与技巧 谭文智 1.45元
中学物理图象及其应用 俞贯中 1.55元
物质都热胀冷缩吗 李培林 1.30元
中学化学容易混淆问题的解析 龚行三 1.35元

中山大学出版社

祝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 | | |
|--|---|
| <p>《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一专辑 争端的解决)
〔联邦德国〕马克思、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
研究所主编 陈致中 李裴南 译 3.50元</p> <p>《比较国际私法》 唐表明著 2.50元</p> <p>《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
高齐云 刘景泉主编 3.20元</p> <p>《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袁伟时著 4.40元</p> <p>《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 冯达文著 4.90元</p> <p>《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 陈则光著 1.70元</p> <p>《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
格勒著 11.50元</p> <p>《人口社会学导论》(美)德·马特拉斯著
方时壮 汪念梆译 2.40元</p> <p>《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简明教程》
王 境主编 1.40元</p> <p>《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苏)其高主编 1.80元</p> <p>《价值和价格论》
——对有关世界难题的思考与探索
李 耕著 4.90元</p> <p>《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辩证法》
高齐云主编 2.70元</p> <p>《中国小市镇的发展》 许学强等著 3.50元</p> <p>《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
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委员会编 4.00元</p> <p>《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 李 耕著 2.45元</p> <p>《现代香港对外贸易》 张作乾编著 1.70元</p> <p>《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关系的研究》
雷强、郑天祥主编 5.00元</p> <p>《澳门》 缪鸿基等著 3.50元</p> <p>《香港经济教程》 甘长求著 4.20元</p> | <p>《香港经济成长特征》 郑德良著 1.80元</p> <p>《香港经济问题初探》(增订本)
郑德良著 2.65元</p> <p>《写作大要》 刘孟宇、诸孝正主编 2.10元</p> <p>《广韵研究》 方孝岳、罗伟豪编著 2.20元</p> <p>《古文字学纲要》 陈炜湛、唐钰明编著 1.80元</p> <p>《中国文化概论》 李宗桂著 4.20元</p> <p>《新时期文艺论辨》 黄伟宗著 4.70元</p> <p>《西方文论辨析》 潘翠蓉著 2.40元</p> <p>《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讨论会秘书组编 15.00元</p> <p>《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陈锡祺主编 2.20元</p> <p>《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 陈胜彝著 3.90元</p> <p>《冯乃超文集》(上卷)
《冯乃超文集》编委会编 2.95元</p> <p>《红杏山房集》
〔清〕宋湘著 黄国声校补 4.90元</p> <p>《独漉堂集》
〔清〕陈恭尹撰 郭培忠校点 11.00元</p> <p>《观众心理学》 陆一帆编著 3.80元</p> <p>《笑的心理》 潘智彪译 1.20元</p> <p>《反思和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章》
刘 嵘 著 1.90元</p> <p>《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叶汝贤 何梓焜著 2.45元</p> <p>《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刘歌德 主编 1.95元</p> <p>《资本论》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同一性
黄春生 著 1.60元</p> |
|--|---|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 政 编 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46—64 国 内 定 价：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书 号：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总98期)目 录

庆祝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领导题词

各界同贺

- 总结过去,思考未来.....张江明(6)
紧密的纽带,坚固的桥梁.....王致远(7)
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刘 嵘(9)
坚持马列 花繁果丰.....黄家驹(10)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张 磊(12)
一个老社联盟员的感怀.....蔡馥生(13)
抚今忆昔话社联.....朱杰勤(14)

专题评论

- 广东经济:90年代的严峻挑战.....梁桂全(1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 马克思新哲学体系探讨之六.....高齐云(19)
谈马克思关于两个部类生产理论.....李又华(23)

精神文明建设

- 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黄 浩(26)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作用与任务.....林子英(35)

经 济

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论思考和决策构想

- 武惠恩 毋青松 刘爱军(39)
农业投资:近几年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张 琦(47)
企业行为:动力结构与价值判断标准.....张良卫 李泽中(50)
从“拉舍尔”毛毯谈怎样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李澄海(54)
量本利分析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陈 庚(58)

国情、省情、县(市)情

谈林业如何走上新台阶

- 韶关市的基本目标.....冯灼峰 陈 光(62)

建设“生态林业县”

——始兴县的实践与设想 罗继胜 (68)

文 史

清末广东农会述论 朱 英 (71)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陈春声 (76)

历史文学的虚构 吴秀明 (81)

道家美学 杨煦生 (86)

《历代赋汇》评议 马积高 (90)

争 鸣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辨正 陈 伟 (94)

“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 程家明 (98)

学 术 报 导

广东“流民”问题突出,学者提出治理对策 本刊记者 雷比璐 (100)

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新特点 本刊通讯员 冼剑民 (101)

企 业 之 窗

“小太阳”如何升起

——顺德县乐从镇旅行袋厂艰苦创业记 本刊记者 石 成 (102)

市场疲软:促销渡淡的几点做法

——佛山市企业调查 梁灿荣 黄海宁 (104)

书 评

一部新颖的断代社会经济史

——《明清经济史》评介 黄启臣 (106)

开拓区域发展新领域

——读《德庆发展战略研究》 何湛峰 (109)

《开放经济学》评介 张炳申 (110)

书 海 酌 露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周凤章·57) 比·赤鼻·赤比(房日晰·34)

《全唐诗典故辞典》正误一例(熊清元·61) “三后”释义辨正(边家珍·49)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1,1990)

CONTENTS

- Summing up the Pas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 Zhang Jiangming (6)
- Close Ties and Solid Nexuses.....Wang Zhiyuan (7)
-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Dividing into Two and Make greater Progress..... Liu Rong (9)
- Adhere to Marxism-Leninism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 Jiaju (10)
-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Zhang Lei (12)
- Feelings of an old Member of the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Cai Fusheng (13)
- A Talk about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Zhu Jieqin (14)
- Guangdong Economy: Grim Challenges Facing the 1990's
.....Liang Guiquan (15)
- Karl Marx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 Gao Qiyun (19)
- A Talk about Marx's Theory of Two Parts of Productions
.....Li Youhua (23)
- Set up an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uang Hao (26)
- The Traits, Roles and Tasks of Building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Urban Areas..... Lin Ziyang (35)
- Pondering over the Theory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 and Its Decision-making
.....Wu Huien, Wu Qingsong & Liu Aijun (39)
- Investment on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Zhang Qi (47)
- Enterprise Conduct: Dynamic Structure and Value Judgement
.....Zhang Liangwei & Li Zezhong (50)
- How to Achieve Better Economic Results for an Enterprise: Experiences from the Production of LASHEER Acrylic Blankets
..... Li Chenghai (54)

The Effect of Quanta-Cost-Profit Analysis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Enterprises.....	Chen Geng (58)
How can Forestry Step up? —the Basic Objects of Shaoguan City	Feng Zhuofeng & Chen Guang (62)
To Build an Eco-Forestry County —Practices and Plans of Shixing County	Luo Jisheng (68)
A Description of the Peasant Association in Guangdong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Zhu Ying (71)
Function and Institution of Rural Food Storage System of Guangdong in Qing Dynasty	Chen Chunsheng (76)
Fabrication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Wu Xiuming (81)
The Aesthetics of Taoist School.....	Yang Xusheng (86)
A Comment 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Ma Jigao (90)
A Discrimination Between Social 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	Chen Wei (94)
Is Applied Philosophy Non-Philosophy?	Cheng Jiaming (98)
Scholars and Experts on the Emerging Problems of Migrant in Guangdong.....	Lei Bilu,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100)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Guangdo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Xian Jianmin,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101)
How Does LITTLE SUN Rise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 Bag Factory, Yuecong, Shunde County.....	Shi Cheng,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102)
Weak Market: Some Countermeasures —Investigation from the Enterprises in Fushan City	Liang Canrong & Huang Haining (104)
A New Book of History —Comment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Qichen (106)
Opening a New Area of Research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Book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Deqing County".....	He Zhanfeng (109)
A Comment on the OPEN ECONOMICS.....	Zhang Bingshen (110)

总结过去 思考未来

张江明

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这30年走过的路程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既有蓬勃的发展，又有如同“文革”中那样被当作是修正主义大黑窝而“砸烂”；既受到“左”的干扰，又有右的影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很需要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以便做到对的继续坚持，失误认真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使进入90年代的社科联工作更有成效，更加出色。

这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委和省府的领导下，社科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省社科联成立时，只有6个学会，现在已有80多个学会，还有11个市11个县成立社科联；会员人数从数百人发展到10万人左右；还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撰写了大批论文和著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设性意见，得到中央、省委以及各部门、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多次进行了评奖，给予鼓励；发挥了智囊和咨询的作用。但是同形势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在今后，要搞好社科联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当前尤其是认真贯彻党的十

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社科联和各个学会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广东和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展学术活动和研究。要长期地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进行探讨，出谋献策。要正确处理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认真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避免经济滑坡，保持经济上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社科联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学术活动，提高理论研讨的质量和水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努力争取某些学科成为全国中心之一。要选准、选好学术研讨的主题，进行系列讨论，既有理论，又有对策的提出；学术研讨大中小相结合，以小型多样为主，持续不断；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和效益。根据广东实际情况，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经济特区研究，港澳研究，珠江三角洲研究，华侨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孙中山研究，康有为

梁启超研究等成为全国中心之一。要重视和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争取某些学科走在全国前列中的促进作用和传播作用，并继续坚持搞好刊物的改革。

要提高学术活动的质量，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贯彻双百方针。既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又要进行创造性理论研究。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可以进行商榷，争鸣，不要无限上纲。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迎接挑战中不断发展，并居于主导地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反对僵化，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确定不同的着重点。

社科联是党和政府联系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一方面需要党和政府加强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充分发挥这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及其智囊作用，使之成为党政部门的思想库和参谋部；另一方面要加强社科联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党的十三大文件，社科联既要代表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要代表和维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具体利益，根据社会科学的特点开展活动，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而努力。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著名哲学家

紧密的纽带 坚固的桥梁

王致远

1960年广东省社科联的成立，标志着广东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省社科联成立以来的30年，是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省委领导下勤奋努力的30年，是广东社会科学工作大发展的30年。迄今，省社科联所属的学会、研究会，已从过去的6个发展为86个，学术活动遍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社会科学队伍大大增长，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某些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社科联是社会科学学会的横向联合，

是联系和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纽带，是沟通社会科学界与党的领导的桥梁。社科联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它的产生，是社会科学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50年代末、60年代初，广东社会科学界响应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历史、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语言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逐步联合起来，组成学会，蓬勃开展学术活动，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先后建立起来。当时，中央的有

关负责同志来广东，曾提出广东应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的期望与要求。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处于大学、专业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要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工作，需要动员、团结、协调和统一指导，于是，省社科联应运而生。从此，广东社会科学工作，就有组织、有计划地蓬勃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社科联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广东社会科学迎来了生动活泼的春天。

广东社科联30年来的业绩是振奋人心的。所以如此，根本的一条，是因为社科联在省委领导下，把自己办成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时时处处主动积极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社科联经常举办的各种大中小型学术讨论会，使学术界的同行有机会聚首一堂，交换意见，交流信息，切磋学问，增进友谊；社科联每年暑假，组织专家学者下乡参观访问，接触实际，联系群众，有利于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社科联出版的学术刊物《学术研究》，不仅使专家学者有了自己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争鸣的园地，而且成为扩大广东省与兄弟省、国际间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社科联在重大节日或关键时刻，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会见，聆听省的领导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指示和期望，有利于沟通上下；社科联每两年举办一次优秀学术成果评奖，既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做出贡献，又对社会科学研究方向起引导作用；社科联成立之初，正值3年经济困难时期，社科联本身虽无权无钱，也竭尽自己所能，努力做一些改善专家学者物质生

活的事情。赠送一小袋黄豆，组织一顿有肉食的午餐，今天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雪中送炭，情暖人心，使专家学者感到亲切。凡此种种，都切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需要，从而能获得他们的欢迎与支持，把社科联真正当作自己的团体。

社科联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达此目的，必须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贯彻“双百”方针不是轻而易举的，如何正确看待“双百”方针，如何引导不同意见开展争鸣，争鸣起来了，又如何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活跃思想学术；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又不伤和气、影响团结；既各抒所见，又防止门户相争。这些都是社科联在发展学术中必须掌握好的。广东省社科联可以说一成立，就是以此为自已开辟道路的。30年来，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展开争鸣，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许多专著，既活跃学术，又团结同志。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科联大力引导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结合广东实际，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广东的改革开放，特区理论与实践，精神文明建设，粤港及亚太地区关系等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均取得较大突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广东省社科联的30年，为广东社会科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预期，今后广东社会科学工作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队伍将不断发展壮大，多出成果，快出人才。社科联本身也将在工作中不断扩展组织规模和工

作规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广东省

社科联成立30周年衷心的期望和祝愿。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坚持两分法 更上一层楼

刘 嵘

在纪念省社科联30周年的日子里，想起“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的名言。我们既要充分看到，在过去的30年，科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又要清醒看到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坚持两分法，发扬成绩，正视和克服缺点，就能使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广东哲学研究工作的成绩，过去已讲了不少。现在，我想着重谈谈缺点和问题，通过风波后的反思，我认为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够；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三是，活动的圈子不大。

一、反思过去，哲学研究工作的中心，确是有了转变，即以本本为中心，以革命为中心，转变到以建设为中心，因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建设实际和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哲学问题，深入研究不够。比如说，在当今时代，在当今中国，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包括人权、人性、人道、人的价值、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同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哲学派别的根本分歧和不同的回答。国际上敌对势力授予达赖以“和平奖”，授予方励之以“人权奖”，并以“人权”“人道”作为幌子，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中国人民的权利，干涉中国内政，进行什么经济“制裁”，就是一个浅显的事例。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没有一以贯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因而对人的研究，时断时续，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片面性，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果。

二、反思过去，哲学研究工作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比较注意，因而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对国际上“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缺乏敏感。有的，表现出一种和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以致否

认哲学的党性、阶级性,以及否认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内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对政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歪曲历史,歪曲现实,鼓吹什么“酱缸文化论”,“黄色文化衰落论”,“奴才文化”和“全盘落后”等民族虚无主义;鼓吹或传播“全盘西化”,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乌托邦论”,资本主义“永生论”,两种社会制度“趋同论”等等,腐蚀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终于酿成动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教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中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回答;而且要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潮在哲学领域中的表现,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哲学基础,以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这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应有之义,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源泉。

三、反思过去,哲学研究活动范围主要在哲学界本身,圈子不大;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在广大工农兵和干部中,影响不大,特别是一些故弄玄虚、矫揉是非的名词、概念,使人们“望而生畏”,难以卒读。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毛泽东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当今正值党中央提出全党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子里,重温马克思和毛泽东这两句名言,具有特别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常委、广东社科大校长、广东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坚持马列 花繁果丰

黄家驹

广东省社科联走过了很有意义的30年。回想1960年社科联刚成立时,只有经济、哲学、教育、文学等不多的学会,现在已发展到80多个学会和拥有十万余人的庞

大的理论队伍了。同全国社会科学界一样,广东社科联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应该充分肯定,广东的理论队伍是好的,是坚持马列的,无论在探索理论,推进改革,提供科

学决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广东理论队伍的特点是思想解放，队伍团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重视同实际部门协作，关心青年理论队伍的成长。这些特点，无疑是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今后社科联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但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够，决策上的失误往往来自理论上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这种理论上的失误或叫理论“倾斜”是否都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可另作别论，然而近年来理论上的混乱应该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例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流行用三阶段（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到产品经济）取代五种生产方式的分析，这就容易只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同是商品经济的共性而忽视所有制对商品经济的决定作用，从而导致全盘照搬西方的运行机制；在所有制问题上，抛弃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必然会走到彻底改变国家所有制，全面推行股份化以至提出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结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这一特征，理论上明显向完全市场经济倾斜，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宏观失控，产业结构失衡，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重要原因。在分配理论方面，近年来出现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论述，与此同时“按资分配”、“按股分配”也热起来。此外，还有用经济多元利益主体来否定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用西方宏观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样下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会被丢掉。

由于80年代国际关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特点，提出了“再认识”的问题。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具体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这种“再认识”无疑是必要的。多数学者确实也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应防止用西方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例如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中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把西方资本主义说成社会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通过对国际关系的再认识，只讲和平与发展，不讲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只讲富国与穷国合作，不讲富国剥削穷国与富穷差别，等等。这些倾向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还要指出一点，就是我们有责任加强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青年学生振兴中华，推进改革的历史责任感，无疑是可贵的，但他们既缺乏社会实践，又缺乏马列理论。因此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ABC的启蒙教育，使他们确信只能用马列主义而不能西方一套来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华南师大党委书记、教授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张 磊

流光如驶，社联已届“而立”之年。

回首30年的路途，许多景象历历在目：广东科学馆的成立大会，学会活动的蓬勃展开，十年内乱的深重灾难，浩劫后的恢复与发展……对于一个把自己的工作与社联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科工作者，思之倍觉亲切动情。

在过去的日子里，社联做了大量的工作：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和推动学术活动，关心知识分子，为科研人员创造学习和工作条件……广大社科工作者把社联看成自己的组织，往往自豪地谈到它的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活动。

瞻望未来，我们更感到社联的任重道远。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要求社联在今后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热切希望社联的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亟待进一步加强。归根结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优势。社会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因此，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背离的。拒绝马克思主义，只会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俘虏。当然，必须摒弃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戕害）。同

时，还需吸收和借用一切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只有处在发展状态中，才能永葆青春。

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应当大力倡导。近几年来，学术界刮起了一股“不正”之风。赶时髦，看“行情”，刻意求新，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意在哗众取宠。大胆否定别人和肯定自己，一切从零开始——从我开始。颇似墙头芦苇和山间竹笋，亟缺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追源溯始，引导错误于上，“精英”鼓吹于下。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歪风。科学研究首需具有科学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导向十分重要。对于青年学者，更需善诱。

双百方针，必须进一步贯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学术民主尚待发扬。科学研究中的孰是孰非，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地讨论和争鸣来解决。压服、扣帽子无济于事，只能产生消极后果。事实证明，双百方针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途。

还希望社科研究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出版的途径能够畅通。辛辛苦苦地写出成果，却又不能出版，对于科研人员说来，哀莫大焉。

以上数端，谨寄厚望于社联。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常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一个老社联盟员的感怀

蔡馥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就是在国民经济遭到极度困难的1960年1月建立起来的。没几年,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可谓几经风浪,成长道路曲折。但经过努力和斗争,终于使这个团体生存下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经过社会科学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做出很多工作和成绩:团结了80多个学会,陆续编出《学术研究》双月刊及《内部文稿》、《广东学术通讯》,创办社会科学大学,帮助国家培养人才,经常召开有关部门各种研讨会。这种坚持马克思主义,艰苦奋斗精神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当此广东社联成立30周年的时候,瞻望国内外形势,作为30年代老社联盟员,我不禁有下列感想:

第一,重理轻文在中国可说是全国性的现象。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先后成立起来,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在科学院内设一个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等到“四人帮”被打倒后于1978年才成立。1985年上海社联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55周年纪念会,各省市新社联均派代表参加,会上要老盟员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成立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总会。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落后,

建国初期集中一部分力量搞自然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是必要的,但我们该还记得当年蒋介石的文化围剿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左联、社联、剧联、影联、教联、学联等等。因此要重视社会科学,做到文理并重。

第二,科技兴国、科技攻关,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智力投资。1985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会建议:“必须象重视经济建设那样重视教育事业”,因为教育是培养文理科技人才的先决条件。很难设想,带着占人口四分之一的文盲和半文盲可以建设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

第三,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85年邓小平同志向新老干部提一个新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结合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多写文章进行宣传;同时也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学习、捍卫和发展统一起来。在广东社联成立30周年纪念时,特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勉。

作者系30年代老社联盟员、著名经济学家、暨南大学教授

抚今忆昔话社联

朱杰勤

光阴送我，我送光阴，我是一个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转瞬间已白发盈头，年近80了。我参加的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也已有30年历史。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有关社会科学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长。解放前，广东民间学术团体寥寥无几，不相为谋。解放后，党和政府执行“双百”方针，提倡解放思想，促进学术民主，对民间学术团体加以支持和赞助。由于学会逐年增加，就有加强领导的必要，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遂告成立，使各学会在该会统一指导下，互相交流，互相照应，因而更有利于团结合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第一，创办了《学术研究》作为社会科学家争鸣的园地，得到有关的学者专家的支持，稿源畅盛，佳作如林，国内外反应良好，这个刊物迄今已出版近百期了。这是值得我们称道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本人通过批判和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和经验教训，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内，推陈出新，而成体系的。他提出封建主义必然让步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必然让步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即力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广东社联成立之初，

即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特别重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这样做，对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是大有好处，也是值得称道的。第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后，全国贯彻执行，取得巨大成就。本省社联对社会科学界，特别对所属的学会，倡导不遗余力。首先表现在社联的总体规划和有关学会的研究计划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是基本一致的。其次，我们从社联主办的《学术研究》中的论文的内容和性质可以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很注意结合广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来谈，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广东人研究广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较为方便，人地相宜，事半功倍，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

最后，我有一点建议。这几年有极少数人，鼠目寸光，不懂历史，恣意否定我国数千年伟大的民族传统和光辉的文化遗产，大倡欧洲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所以，我希望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认真剖析和批判这种观点，积极宣传祖国的优秀文化。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顾问、暨南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广东经济： 九十年代的严峻挑战

专栏评论员 梁桂全

广东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告别了辉煌的80年代，迎来了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代。

在80年代，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从1980年至1988年，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239%，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69%，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168%。国民经济成长跨过工业初兴，进入工业中兴时期，经济体制由计划产品经济模式转向计划商品经济模式；经济运行态势已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人民生活由贫困型上升到温饱型。这是广东经济迈向90年代的新基点。

进入90年代，广东经济的基本走向和前景如何？在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下，人们不无忧疑，并为治理整顿中所暴露出来的诸种矛盾深深困扰。我们认为，必须从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和总进程，认识面临矛盾的性质，从战略上把握90年代广东经济的大走向，作出创新性战略抉择。毫无疑问，当前治理整顿中所显露出来的矛盾表明，广东80年代的经济增长格局已经结束，广东经济在90年代将面临四大挑战。这些矛盾将把广东经济导入新的

成长阶段和新的增长格局。

第一，面临国内国民经济成长新格局的挑战。

80年代，广东经济是在这样一种国内经济格局中启动的：30年来，我国基本上实行重重工业、轻加工工业的产业倾斜方针，至70年代末，形成一个基础工业相对超前发展，加工工业相对滞后的经济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造成了消费资料市场的严重匮乏，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积聚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另一方面，积蓄了相对过剩的基础工业潜力，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前提。这样一种格局，使自然资源短缺但小商品经济传统根基较深的广东，可以倚借毗邻港澳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先发优势，依托国内主体市场，以加工工业为主导，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现在国内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加工工业在80年代的高速增长，已把30年积蓄起来的基础工业的潜力消耗完，出现加工工业超前发展，基础工业相对滞后的情况，这就导致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的结构性转换，国家产业政策由80年代向加工工业

倾斜转向基础工业倾斜，国民经济发展由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成长阶段过渡到以重化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成长阶段。另一方面，在不平衡规律作用下，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拉大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了强大的区域位差压力。这将导致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政策由80年代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转向向内陆地区倾斜。再一方面，随着80年代各地加工工业排浪式推进，消费资料工业相对于现有国力和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并出现结构性相对过剩，区域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一种新格局表明，80年代广东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逐步消失，广东的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成长格局已经与国内经济成长新格局相矛盾。

第二，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发展格局新调整的挑战。

进入9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至少由于下述几个方面的情况，使广东开放型经济在90年代的拓展面临严重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影响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选择：一是正在东欧发生的事态，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在90年代的政治走向复杂化并出现局部的政治冷战，由此对东西方经济交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发达国家为了争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将在90年代围绕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开展激烈的世纪之战。三是西太平洋沿岸的新兴工业国（地区），还有日本的产业正在向高技术产业过渡，传统产业外移，积累过度的资本大量外溢。这种情况虽然为我们90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是，东南亚一批发展中国

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正在作为东南亚第二批新兴工业国，抢先承接第一批新兴工业国以及日本产业外移和资本外溢的成果，成为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最直接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搞不好，我们将又一次错过机会，沦落于东南亚第二批新兴工业国之后。四是香港将面临1997年主权归属引起的经济波动。广东外贸出口中近80%是对港澳地区的，利用外资和外商来粤投资中的60%多是来自港澳地区。因此，广东外向型经济在90年代的发展将受到香港“九七问题”的严峻考验。

第三，面临改革中体制变动的挑战。经过十年改革、开放，广东经济运行已基本由原来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活动的80%以上进入市场调节范畴。但是，治理整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政府对商品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在体制、组织、手段、经验等诸方面都还很不适用，如果政府不能成功地解决商品经济的宏观的有效管理，就不可能尽快结束经济运行无序化的状态，使国民经济运行顺利地由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并有可能导致向旧体制的复归。另外，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平衡发展，广东改革的先走一步，将使广东在90年代面临局部体制与全国体制不相协调的压力，使全省战略的机动性受到牵制。

第四，面临来自自身经济成长阶段转换的挑战。80年代，是广东启动国民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农村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调整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工业化的调整，推动了经济起飞的第一次浪潮。但是，当前经济面临

的一系列矛盾表明，广东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已经结束，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广东正面临着国民经济成长的阶段转换。广东如果不能正确地作出新的战略选择，成功地完成经济成长的阶段转换，把国民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台阶，就不能摆脱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矛盾，获取战略全局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在90年代，广东经济发展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方面，旧的发展格局已结束，新的发展格局尚待开拓；另一方面，内有堵截，外有强手，双重竞争压力。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超越相连。从我国40年经济波动规律看，在90年代将可能有两个经济发展上升期，第一个将形成于90年代上半期的1992至1994年左右，第二个将出现在两个世纪之交。第一个经济上升期主要是由治理整顿期积蓄的潜力的释放推动。由于两个原因，这个经济上升期的经济回升乏力：一是这次经济回升的动力主要还是原有产业和原有市场余力的释放。产业创新因素未形成，新的市场还来不及大规模开发。二是这次经济回升仍然受到国际、国内复杂的非经济因素的压力，同时受到香港“九七问题”超前反应的冲击。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两个世纪之交出现的第二个经济回升期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它有可能因产业创新因素的大规模积累和新的市场的开发导致一种全新的发展格局。这正是广东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着眼点，并规定基本的经济走向。一是现有产业由粗放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低成本、优服务，以此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向高、新技

术产业倾斜，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90年代后期经济成长的主力军。三是市场经济以外向化为主导走向多元化。四是产业组织制度托拉斯化、集团化。五是宏观社会生产力通过科技——生产一体化走向新的变革，技术创新将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六是国民经济运行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作用的健全和发挥，走向制度化、有序化。七是区域经济梯度格局向资源型落后地区倾斜，资源导向型产业成为90年代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为了应付90年代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以变应变、多元发展、力图创新、立足领先的超前创新战略，使国民经济成长的基础由80年代的改革、开放领先优势转向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先优势。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下述主要战略对策：

第一，通过把技术进步因素大规模注入传统产业，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改善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确立传统产业的超前优势垄断，以此打破国内区域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国内市场。

第二，有选择地加快具有地方优势的高、新技术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争取在国内市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先发优势，抢占国内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并以此拓展海外市场，使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新动力，推动市场区隔升级。

第三，加速产业组织制度创新，强化企业竞争能力，确立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一是推动企业集团化或托拉斯化，二是推动生产——科技一体化。

第四，以企业托拉斯化为基础，推动

新的流通革命；改善企业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拓展的能力。

第五，加快开发资源导向型产业，使之成为90年代经济成长的新动力。由于资源导向型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相对丰富的粤北、粤西北等经济落后地区。加快资源导向型产业开发，也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第六，加快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使市场经

济运行有序化、制度化，确立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

第七，把“人才立省”作为广东9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一是利用近几年出现的人才“过剩”现象，二是动员各方面人才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开发活动。没有人才的大规模积聚和有效、高效的发挥是无法在90年代把广东经济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梯的。

责任编辑：郑英隆

※

※

※

(接110页)

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定性分析的，但作者却十分注意从开放经济运动的复杂统一体中研究量的关系，既有用函数来表示开放经济运动中不同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也有用方程或计量模型来描述开放经济运动中各种关系的量变规律。毫无疑问，这不仅有助于从量变角度揭示和把握开放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且使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加强。

再次是全书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这不仅表现在根据开放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把开放经济的产生原因、本质特征、影响因素、资源导向、开放度、区域设置、模式选择、体制运行、战略策划、结构选择、系统协调和效益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合乎逻辑地构筑在一个体系之中，相应建立了一些开放经济研究的新概念；而且表现在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富

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如开放经济的资源导向理论，经济开放度理论，开放经济系统论，开放经济效益评价体系理论以及开放经济总运行理论等都在该书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证。

当然，正因为该书具有较强的探索性，所以在各方面还不能说已趋于成熟，若干缺点也在所难免，例如，在全书体系的设计、结构的安排、观点的提炼等方面还不尽完善，有的内容略有重复；有的问题，如开放经济运动的方式等尚没有涉及或展开。这都有待于作者和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深入探索。尽管如此，该书紧密地结合对外开放的实践，对开放经济学进行了一次初步的系统研究，这将会推动我国开放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日臻完善。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马克思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新哲学体系探讨之六

高齐云

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关联的范畴，它们在实际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存在、演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哲学及其体系时，不仅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考察、阐述客体和主体，同时还考察、阐述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综观他们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论述，可以概括为相互作用的表现、相互作用的方式、相互作用的规律等主要内容。

第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主体和客体不仅相互联系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通过相互作用而演变。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是主体和客体之间进行着双向的运动。就是说，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主体虽然处于启动者和主导者的地位，但并不是只有主体向客体的运动，而是同时发生着客体向主体的运动。就生产中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来看，不仅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同时劳动对象也作用于劳动者。其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表现为它们在双向运动中发生相互适应的变化。一方面，主体要适应客体的性质和规律，去确定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目的、计划、手段、方式和改善、发展主体的活动能力、机制等；另一方面，客体要适应主体的需要和活动，去变更自己的形态以至作用。在生产中，劳动者要根据劳动对象去选择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等，而劳动对象则发生适应劳动者要求的变化。再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表现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所谓主体客体化，是主体通过实际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和要求对象化于客体之中。所谓客体主体化，是对象在相互作用中成为适应主体需要和确证主体本质的客体，甚至直接转化为主体的一部分。“在生

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①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②这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集中表现。

第二、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

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与集中表现。那么，它们是通过什么方式、途径达到这种结果呢？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看来，主体和客体是通过认知、评价、改造等方式达成这种结果的。

认知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一个层次。在认知方式中，一方面是在主体之外的东西及其活动，刺激、作用于主体，从而作为观念的要素，转移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头脑中；另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外部刺激下，展开生理的和心理的活动，对外在的东西作用于自身的信息加以接收，并且进行分析与综合、选择与加工，从而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对象、客体的观念。对于人和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这种认知方式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认知活动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作为认知对象的物质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头脑，物质的东西作用于主体，转化为观念的要素被“移入”人的头脑，而人的头脑同时对其进行加工制作，因此形成“改造过的”关于物质的东西的观念。由此可见，认知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

评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另一种形式、另一个层次。所谓评价，是主体根据客体及

其活动对自身的效用、价值关系，而作出的判断和采取的态度。在评价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以它们之间的价值关系为依据的。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④ 马克思的话表明，价值关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从主体来看，仅有主体的需要，没有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性的客体，不可能产生价值关系。从客体来看，仅有具有某种效用性的客体，没有与其相适应的主体的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价值关系。因此，价值是客体的效用性和主体的需要互相适应互相结合而产生的。以价值关系为依据的评价活动，更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客体及其效用性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主体以其需要作为尺度，去衡量客体及其效用性。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产生出一定的判断和态度，这就是评价。可见，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评价的方式较认知的方式更为深刻。

改造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又一种方式、又一个层次。所谓改造，是主体和客体因各自受对方的影响、作用，而对自身的形态、活动、机能等进行调整、改变。马克思在论述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时指出：“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⑤ 马克思的话说明，人在和外部自然相互作用时，外部自然和人自身都得到改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改变是相互作用、相互改变，而不仅仅是主体自身的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⑥ 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人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就前者来看，人之成为人，受到长期的特定的自然条件的作用，这些自然条件制约、推进着人的活动、劳动，从而引起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深刻变化。就后者来看，人的改变、发展，更直接受到社会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制约、促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认知、评价、改造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它们相互联系而构成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系统。认知方式在相互作用系统中处于较低层次，因为这种相

互作用较为表层和初级，它只涉及到对客体的客观认识和对主体的观念的影响。评价方式以认知方式为前提，它涉及到对主体的需要、利益的作用和对客体的效用的主观判断，因而在相互作用系统中处于较高层次。改造方式在相互作用系统中处于最高层次，它以认知、评价作为前提，它涉及到对主体和客体的实际的改变。只有经过认知、评价、改造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才能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等变化。

第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规律。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主体和客体运动的辩证法，一方面包括主体和客体各自的运动而导致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包括它们的相互作用必然引起的主体和客体的各自变化，这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完整内容。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就必须这样全面地去理解。

关于普遍的联系与转化。首先，是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与转化。“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⑦ 正是在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与转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社会。社会也是一个普遍联系与转化的网络。对此，马克思从横向和纵向作了论述。从横向来看，社会历史包含三个基本因素的联系。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二是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工具以及得到满足的需要又引起的新需要，三是人的增殖。“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⑧ 从纵向来看，则有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和由其决定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转化。“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⑨ 在人、社会产生后，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联系、转化，就成为社会历史中最普遍最基本最主要的联系与转化。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贯串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对立、转化，而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⑩ 可见，客体

之间的普遍联系与转化，主体之间的普遍联系与转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普遍联系与转化，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之一。

关于对立的统一。主体和客体之间又对立又统一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根本规律，因为它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与实现相互作用的根据。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首先是二者之间因差别而发生的联系和在联系中显现的差别。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⑩这就是说，不论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还是反映在主观意识中的自然界，都不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而是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使自然界可以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认识具体的自然事物的这种特性，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可见，在满足主体需要的活动中，主体和客体发生初步的相互作用，形成差别中的联系和联系中的差别，这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的最初内容和表现。但是在这种联系中，二者的差别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突出地表现为彼此的对立。对立促成主体进行改变客体的实际活动，而客体亦反作用于对方，出现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改造。在人与环境之间，是人改造环境和环境改造人的同时进行。在人与人之间，亦展开互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改造。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⑪有产阶级感到自己在对立中是被满足的，它要保持这种对立，因而力图使无产者变为更有效的剩余价值生产者。无产阶级感到自己在对立中是被毁灭的，它要消灭这种对立，因而力图使有产者也变为被剥夺者。因此，主体与客体通过由对立而引发的实际活动，使对方发生与自身要求相适应的改变，这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的进一步展开的内容和表现。主体和客体通过实际活动，使对方发生与自身要求相适应的改变，二者之间的特定的对立得到解决。然而，由于受到主体、客体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演变的具体状况的制约，这种对立的解决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并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切矛盾的全部解决。因此，主体和客体通过改变对方的实际活动而达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一切具体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演变的最后内容

和表现。

关于发展中的否定。否定是发展中的关键性环节和推动性力量，发展就是对原有的存在的否定。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⑫客体的发展、主体的发展、客体和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发展，都是否定性环节、方面、力量发挥着推进作用。这是因为在事物内部包含着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对立，它们的互相斗争互相作用，把事物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私有制中的对立时指出：“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⑬这就表明，对立内部的肯定方面，是从对立中得到满足的方面，是根本保持已有对立和事物现状的方面；而对立内部的否定方面，是从对立中受到损害的方面，是根本改变已有对立和事物现状的方面。它们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互相斗争互相作用，否定的方面克服肯定的方面，从而使事物向更高的形式转变。这就是发展中的否定，通过否定而实现的发展。然而，发展中的否定并不是简单地抛弃过去的一切。不论是人和自然还是人和人的对立统一中，都存在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一面，这就确定了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关于量和质的互相制约互相转化。在客体、主体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演变中，都存在量和质的互相制约互相转化。马克思谈到他在《资本论》第1卷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的部分，“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⑭恩格斯在其哲学著作中，也多次地揭示、阐述过量和质的转化的规律。首先，必须看到量和质的互相转化，是以量和质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为前提的。不论是主体、客体

还是二者的相互关系，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一定质的事物必定具有相应的量，在一定量的范围的事物必定具有相应的质，二者紧密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事物的量的变化必然引致质的变化，事物的质的变化也必然引致量的变化。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与本质的差别。”^①其次，必须看到量变与质变的区别以及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不同作用。量变和质变具有各自的特点，前者是缓慢的，后者是急剧的，前者是逐渐的积聚，后者是根本的转折。因此，量变在事物发展中发挥进化的作用，质变在事物发展中发挥飞跃的作用，量的积聚到一定状态就引起质的飞跃。马克思说：“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②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思想。他们认为主体、客体的区分、联系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都是以实践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发生、发展的。因此，必须考察马克思新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实践，才能对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取得完整的认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页
- ② 同①第30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 ④ 同①，第19卷，第406页
- ⑤ 同①，第23卷，第202页
- ⑥ 同①，第8卷，第43页
- ⑦ 同③，第3卷，第492页
- ⑧ 同①，第3卷，第33页
- ⑨ 同①，第3卷，第34页
- ⑩ 同①，第42卷，第120页
- ⑪ 同①，第42卷，第169页
- ⑫ 同①，第2卷，第43页
- ⑬ 同③，第1卷，第169页
- ⑭ 同①，第2卷，第43、44页
- ⑮ 同①，第31卷，第312页
- ⑯ 同③，第3卷，第166页
- ⑰ 同①，第23卷，第341—34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谈马克思关于两个部类生产理论

李又华

马克思关于两个部类生产理论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来的。它把社会物质生产的商品总量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分并阐明它们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必须有两个部类,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两部类各自内部的和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在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都得到补偿,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能持续进行和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总的比例关系。

两大部类生产及其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是社会化生产的商品经济社会都要遵循的规律和原则。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少数人占有的矛盾,使社会再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使广大劳动群众贫困化,形成两极分化。其结果,社会消费的增长常常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这必然产生经常性的经济波折和一定时期内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①可

见,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性的经济波折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盲目起作用的“社会调节”。尽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现国家一定的干预和调节,仍不可能摆脱这一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的”。^②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根本解决的固有矛盾。

马克思关于两个部类生产及其比例关系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得到越来越自觉的运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宏观管理上,使对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成为可能和必要。它体现自觉运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进行国家宏观调控,使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同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使生产各部门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达到基本平衡。我国在对马克思两个部类生产理论的具体实践中,强调农轻重生产的协

调发展,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在我国的“七五”计划中,明确要求社会总需求同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进行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人民生活逐步地提高,这是对马克思两个部类生产理论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但由于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所忽略,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经验不足,控制不力,加上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以致近些年来不断出现过高的积累和消费的膨胀,造成社会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社会总需求量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量的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些矛盾应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去理顺它、解决它。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为了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必须更加自觉遵循马克思关于两个部类生产的理论和原则;更加强调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为此,我们还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主要是:

第一、加强农轻重生产的协调发展。农轻重生产的内部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实质是社会两个部类生产的协调关系,是发展社会总供给的关键。我们国家一贯强调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并把它放到首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整个农业的发展,就没有人民生活的提高,国民经济不可能有稳固的基础,即所谓“无农不稳”。今后农业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必须深化改革,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农业的基本建设,走社会化合作经营的

道路。

轻工业主要是消费资料的加工业。轻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而且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环节。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技术改造缓慢,不少投资用于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再造技术落后的企业。今后轻工业建设,必须调整投资结构、压缩规模,努力提高经济效益,重视发展外向型企业。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没有健全的基础工业,缺乏能源、原材料的生产,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力提供工农业发展的条件。在现代科技迅速进步的情况下,我国为了逐步赶上技术先进国家,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急需的重工业建设,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严重不适应,而社会积累资金又控制不严、用之不当,拖了工农业现代化的后腿。

总之,农轻重产业的协调发展,意味着社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是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关键。目前的问题是:消费基金恶性膨胀。积累资金不能确保国家计划重点建设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这些产业的投资往往低于国家积累资金的增长水平。因此,要求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同两个部类生产的增长相适应。当前必须压缩积累规模,控制基建投资,特别是非生产性的基建投资;控制消费基金膨胀、限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使国家财政、信贷、外汇做到各自平衡,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发

展轨道。

第三、必须有相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金融业,还有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它是为社会两个部类生产服务的,它是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的重要条件。第三产业的劳动,虽不是直接生产价值,但属于追加价值。没有相应的第三产业的配合发展,社会扩大物质再生产,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科技教育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两个部类生产的

发展和两个文明的建设。至于新兴的信息、技术、劳务、金融等市场的建立和发育,也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中,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结合我国实际,灵活运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2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教局

责任编辑:郑英隆



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

黄 浩

近年来,广东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新的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上看,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得到更科学、更有效的宏观指导,从而进一步拓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使软的一手真正硬起来?用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对此进行思索,使我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一项社会大系统工程,不能光靠行政手段,而应从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出发,建立一个能够启动、调节、激励、制约的机制,靠这一机制的自我运转,进行综合治理,产生整体效应,不断提高人们的文明程度。

一、运用系统论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系统,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研究和改造一切系统客体,都要有一个从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整体的目标着眼,去认识各个局部事物的功能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再研究整体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就是系统论的运用过程。在商品经济

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系统工程,也需要运用系统方法对它进行研究,以此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是培养人——全面发展、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在文化、科学、思想、道德等各方面都应有较好的素质。而在今天,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实现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化过程。

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它的发展必然冲破一切民族的、地域的、行业的自我封闭,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卷进社会化的浪潮之中。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高度分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高度综合。对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的要素很多,其目标和任务被层层分解到许许多多的社会部门,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劳动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各个方面,溶化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环节。而社会的这些部门、领域、环节又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样,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人就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单位能够独自培养出来的,而是社会各方相互作用的

产物。

还要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益文化的传入，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这不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助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培养人的平等、民主、竞争意识和一系列的现代化观念，促进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现象，对人的发展发生不良影响。怎样限制这些消极现象，以保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这也不是哪一个部门、单位所能独自解决的，而要整个社会的协调行动，齐抓共管。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有用系统的方法把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才能保证它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才能形成大于分力之和的合力，收到事半功半之效益；反之，如果仍然囿于封闭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然是常常陷于被动的局面。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往往被那一方面的疏忽或失误所抵销。故此，我们应当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出发，研究它的结构、要素、层次，考察它的各种关系，从而提出可行、有效的对策来。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结构和要素

从上面所述，精神文明实质上是人的文明。作为社会的人，可分为个体、群体、社会（区域）三个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划分为个体文明、群体文明、社会（区域）文明，而这

三者又包含着各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科学地把握这个整体，是高屋建瓴，统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局的必要前提。

（一）微观层面——个体精神文明。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个体是群体、社会的“细胞”或基本要素，群体、社会的活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体的活力。因此，个体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那么，个体精神文明包含哪些要素呢？

一个健全、完整的人，首先是有理性的人。追求和获得知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正确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发展自身力量的前提条件。知识的表现形态主要是文化和科学。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人的实践的最终归宿，它不过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桥梁。马克思说得好：“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任何人都根据本身的需要确定对事物、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一个健全的、完整的人，也应该是具有正确价值取向的人，而人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思想、道德、纪律等。

人不但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的精神世界的非理性成份包括直觉、潜意识、情感、灵感、意志、习惯等等，而心态则是这些非理性成份的外在的综合性的反映。心态并不是一个人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实践与理智之间的通道，

是两者相互转化的中间环节。“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我们讲的身心健康的人，就包括承认他有正常的心态，而不是病态。可见，心态的培养也是培养健全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的素质不仅表现为以上种种精神状态，而且也表现为行为状态和技能状态，后者是前者的折光，甚至可以说是前者的落脚点，是精神文明的载体。人的良好的知识修养、思想道德修养以及心态修养，只有转化为良好的技能和行为，才能外化为物质文明。因此，技能和行为的训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

从上可见，个体精神文明内在地涵盖着八个方面，即：文化、科学知识、思想、道德（包括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纪律、心态、技能、行为，其中，文化科学是基础，思想道德是核心。我们要培养“四有”新人，或者说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现代劳动技能的人，具体来说就要从这八方面入手。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要求从这八个方面提高人的素质。为了有效地提高人的素质，还应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年龄、职业状况出发，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内容和方法，不能简单化，大家读一本书，念一本经。

（二）中观层面——群体精神文明。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但“鲁滨逊”式的离群索居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人总处于一定的群体之中，或区街，或企业，或村镇，或学校，或家庭，等等。群体总有一定的规范、共识、风气，

这些规范、共识、风气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大的制约、影响作用。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群体之间的竞争日趋剧烈。提高群体的素质和凝聚力，是提高群体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无论对个人的发展还是对群体自身的发展，加强群体精神文明建设越来越显得重要。这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从抓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群体精神文明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企业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把企业推向社会发展的前列，而企业的发展又取决于职工的素质。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是新时期改进企业思想工作，引导职工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树立爱厂如家的团队精神，养成良好的厂风厂纪、职业道德的新形式。企业文化的普遍开展，将大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

区街文化。区街是居民工作、生活的聚集点，是流动人口的枢纽点。开展区街文化活动，有利于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的新风尚；形成开放、创新、求实、求美的市民心态和街区新风。

乡村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尖锐起来，新台阶的文化启蒙，成为农村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发展乡村文化，就是要在广大乡村建立科普网、文化室网、广播网、发行网，开展富有民俗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和各种技能，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良好的精神条件。有的地方建立“四有”文化室，就是建设乡村文化、搞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企业文化、区街文化、乡村文化构成了群体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环节。这三个环节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企业文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改造农业文明的催化剂，对区街文化和乡村文化起着引导的作用。而区街、乡村又是企业的所在地，与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区街文化、乡村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企业文化。在区街和乡村的关系中，区街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文化无疑对乡村起着强烈的辐射作用。因此，群体精神文明建设，要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以区街文化为中介，以乡村文化为背景，使之相互促进，形成网络。

（三）宏观层面——社会精神文明。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依存的整体，环境是人化的自然，而人又是环境的产物；客体是主体的外化，而主体又是客体的生成。改造人，改造主体，总与改造环境、改造客体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精神文明包含着几对关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这两者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如我国的古代“四大发明”，就体现了这两个文明。两个文明的关系体现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精神文明的总体水平最终受物质基础的制约。但是，精神文明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只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会自然而然上去。这说明，精神文明要与物质文明相适应，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坚持“两手抓”。

精神文明内在层次和外在层次的关系。内在层次是指直接体现精神文明的思

想文化建设，具体来说是个体精神文明的八要素。外在层次主要是指人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社会风气。美化环境，种花种草，植树绿化，都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它不是直接教化，而是潜移默化。社会风气是精神文明各种要素的综合性反映，既反映出人的文明程度，又影响着人的发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社会风气可以使坏人变好，而坏的社会风气可以使好人变坏。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如何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已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

精神文明的“软件”和“硬件”的关系。

“软件”与上面讲到的内在层次是同义的。“硬件”主要指的是与“软件”建设相适应的必要的物质设施，如文化室、剧场、图书馆、博物馆、电视台等等的物质建设部分。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在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对“软件”的建设应积极去搞，放在前头，不要等到硬件建设好了才去搞。但必要的“硬件”建设也要尽可能跟上。

思想建设内在各层次的关系。如上所述，精神文明内在层次由八个子系统构成，而思想建设是核心，是统率一切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建设本身不可能是纯之又纯，而是多层次的复合体，是多样性的统一。第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道德、文化、民主法制观念等建设，都不能离开这一指导。第二，思想建设的内容，首要的是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以“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为支柱的理想教育。共产主义世界

观是最高层次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世界观，但它是起支配作用的，应教育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牢固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在现阶段，“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力量源泉，应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共同理想教育。当前，要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形成正确的、昂扬向上的社会舆论，这是搞好思想建设和理想教育的重要环节。第三，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观念，包括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基础上所由产生的商品意识、民主观、平等观在内的一些思想，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思想纽带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应加以尊重、保持和发扬。第四，把思想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上面，既要适应，又要服务，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第五，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但要以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使之成为思想建设的载体。这样，我们的精神文明，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既富有我们民族传统，又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文明。

从上可见，个体——群体——社会构成了精神文明的微观——中观——宏观三大层面，而每一层面又包含着若干的小更层面或子系统。由此构成了复杂的、开放的、相关的、运动的有机体。个体精神文明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基石。因为系统的要

素——个体精神如果不是活跃的、健全的，那么系统的总体功能就要衰竭，民族精神就要萎缩。群体是个体与社会的中介。群体精神文明，既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推动力，也是个体精神文明的直接辐射点。而社会是个体、群体的集合物，是个体、群体存在和发展的大环境。正如系统的整体质决定、制约着要素的个别质，社会精神文明的性质决定、制约着个体、群体的精神文明的性质。因此，在宏观上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树立社会新风尚，从而优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关系，是搞好个体、群体精神文明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社会精神文明能否与个体、群体精神文明统一、如何统一，又决定着精神文明总系统的性质和发展状况。在私有制产生以前，社会（群体）与个体是统一的，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这种统一是以贫乏为基础的统一，无论人的个性，还是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都是贫乏的。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社会文明产生和发展起来。但这种文明是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来实现的。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对立，社会、群体、个体又统一起来，但这不是贫乏的统一，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个人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丰富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但他们又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揭示了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为我们正确处理个体、群体、社会精神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宏观指导。我们要在实践中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结构和要素的内在联系统筹全局工作，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运行机制

剖析精神文明的要素和结构，是对精神文明系统的静态认识，如要从动态上加以把握，必须研究它的运行机制。如果说，对结构和要素的把握主要在于理论认识上的意义的话，那么，对运行机制的把握则主要在于具体操作的意义。

所谓运行机制，是指复杂的有机系统存在、运动、发展所依赖的因素的总和。它反映该系统存在、运动、发展的规律，是该系统内在结构的功能的发挥并完善化的保证。它具有稳态性、自组织性、相关性等特点。

在社会生活中，某种机制的建立，意味着某个领域或某个系统的自我运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形成。我国正处在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大转变时期，各种机制的建立尤为迫切。现在我们不是强调要建立企业机制、市场机制等等吗？那么，精神文明应不应该有个机制呢？我想，也应该有。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启动、自我调节、自我激励、自我制约的机制，而光靠临时性的行政手段、突击措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应该建立怎么样的机制呢？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系统的性质和结构来看，似乎可以包括这样几个子系统：

（一）启动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广线长。唯其如此，需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包括党、政、军、群、企所有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启动、协调的组织网络，可以叫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或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它的主要功能是：制定统一规划（包括长、中、短期规划），组织重要活动，协调各方力量，督促规划的落实，使精神文明建设形成既有专门机构负责，又能发挥各方力量、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新格局。实践证明，成立这种机构很有必要。否则，缺乏这样一个核心启动机构，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往往很难落到实处。

（二）灌输系统。

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单向、直接传授。作为思想教育的原则，灌输历来为革命导师所肯定。列宁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毛泽东也说过：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不但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一切知识，都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这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的无限过程。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本能”的人变为“社会”的人，无不需要有一个灌输过程。显然，灌输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灌输系统不可缺少。这个系统包括几个小的子系统，首先是学校教育（包括各级党校）系统。学校教育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科学性、系统性，对人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生观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

的心灵是不是健全，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至关重要，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党员中的领导骨干，则要定期到党校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要把学校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此外，学习班、报告会等，也带有灌输的功能。

（三）传播系统。

就是通过新闻和其他传播媒介、工具、手段，把我们需要的思想、社会信息传播出去，让群众去思考、选择、接受，以达到影响、教育群众的目的。传播和灌输不一样，它不是硬性要人接受，其功能在于影响，也就是通过提供各种信息，造成舆论，激发受众自我分析、自我综合、自我筛选信息的主观能动性，并择其善者而从之。虽然它基本上也是单向的，而且要实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但对受众来说，它少带强制性，而有更灵活的选择性。当今，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使知识传授和思想教化极大地突破学校教育的局限。我们要逐渐建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的传播体系，把社会各层次的人们纳入受影响的范围。这个传播系统应该包括新闻、出版、广播（有线和无线）、电视、电影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各有所长，互为补充，都要大力扶持，不可偏废。

（四）疏导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的疏导原则建立在人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人类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人具有个性、理智、意志、情趣追求等自我意识的要素，因而具有自我认识、自我调节、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自我教育

的能力，这是人的本质力量。一切外来信息的刺激，只有通过自我意识这个中介，转化为自我教育的内在要求，才能渗透并积淀在人的意识系统之中。因此，疏导与灌输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法。所谓疏导，一是具有顺向性，也就是因势利导，顺着对象的思想，循循善诱，而不是硬堵；二是具有平等性，也就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摆在同等位置上，不以势压人，而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因此，疏导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疏导系统包含着以下几个子系统：表彰系统，主要就是表彰先进，激扬正气。宣泄系统，就是让群众把自己的思想郁结，闷在心的话，包括牢骚话通过一定的渠道宣泄出来，然后加以引导。咨询系统，通过间接咨询或者直接咨询，沟通心理，传播知识。

（五）陶冶系统。

主要是通过文图书画、文体活动等，来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收润物细无声之功效。也就是使人们在美的欣赏、美的实践、美的创造中实现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升华，从而成为知识丰富、思想高尚、身心健康的新人。陶冶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愉悦性等特点，没有理论灌输那种晦涩艰辛之感，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兴趣，产生良好的影响。当然，陶冶系统功能的发挥要与灌输、疏导等系统结合起来。一个人如没有经过知识的灌输，那么就很难有鉴赏美、创造美的兴趣和能力。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

（六）参与系统。

就是让群众自觉参与各种活动，进行自我教育。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这种主体地位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的参与，政治活动的参与，而且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参与之所以能收到促进人们自我教育的效果，是因为人们在参与过程中，角色发生了变换，由已往的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由单纯的执行者变为实践者、决策者，由外观者变为群体的一员，于是萌生出一种责任感、自豪感和群体的认同感，从而自觉地遵从群体的规范，调整自身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参与的程度不同，人们思想变化的程度也不同。从目前看，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参与的形式有：群众自学、自娱活动，对话、辩论、评议等双向多边的交流活动。

（七）竞争系统。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建设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也必须引进竞争机制。虽然精神文明领域的竞争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竞争，它不表现为明显的、直接的优胜劣汰，但仍有先进与落后、光荣与羞耻的区别，从而对个体和群体形成一种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压力就能转变为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内在动力。因此，开展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引导，而且这种引导不是以教育者的面孔出现的。几年来，广东创造出不少竞争的好形式，如知识竞赛、评议大事、评选“合格工人”、评选“文明公民”和创建文明单位竞赛，等等。要使精神文明建设的竞争活动扎实地开展下去，一是要把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二是要把竞争贯穿始终，根据优胜劣汰的原

则，及时调整先进单位，如发现不再具备文明单位条件的，要取消称号；三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崇尚文明、赶追文明的风尚。

（八）抑控系统。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由此诱发精神领域的消极现象的产生。对这些消极现象虽然不可能完全根除，但必须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所以，建立抑控系统，加强管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用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是行政抑控。此外，要特别强调立法抑控和经济手段的抑控，亦即通过制定法律和经济政策来实行管理调控。如何把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完善抑控系统的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精神文明的抑控系统还包括组织和队伍的建设。要建立以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为龙头，包括工商、公安、海关、税收、广播电视、文化等职能部门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管理网络。同时，要建立群众的自治组织，使群众做到自学、自娱、自乐、自教、自管，充分发挥它们在改造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

（九）信息反馈系统。

信息反馈是系统有序运行的保证。整个系统在运行中的信息，以及环境影响系统的信息都必须通过反馈机制迅速地传输到系统的控制中心，以便作为控制中心修正决策和作出新决策的依据，使系统的运行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反馈不全和失真，将使指挥和控制失灵。在精神文明机制运转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依据社会舆论、社

会思潮的信息制定决策，而且要把决策的信息传输出去，以指导工作，影响群众；还要追踪调查和反馈关于决策实施的情况，看哪些东西有效，哪些无效，经过分析、判断，找出手段与目标的误差，修正启动计划或重订启动计划，使之以最经济、最可靠地逼近既定目标。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健全的、高效的循环系统。可见，信息反馈系统是精神文明系统中的十分重要的“软件”。建立和健全精神文明信息反馈网络，要靠办不同层次的“点”，靠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具备条件时可以成立“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综合、传输、反馈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的基地。

必须指出，精神文明的运转机制是一个整体，任何一种机制的运用都必须与其他机制相结合，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范英

書海酌蠹

比·赤鼻·赤比

房日晰

《搜神记·三王墓》：“莫邪子名赤比，后壮。”徐震堃《汉魏六朝小说选》断句为“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以后许多选本都因袭了这一错误。（如吴组湘等《历代小说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他们释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对此，予窃有疑焉。

首先，训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均通，但揆之前后文义，似无急切等待之意；且“比后”接连，行文不免累赘；何以名赤，义亦未详。总之，这样断句，释意总觉滞碍。

其次，《孝子传》云：“眉间赤，名赤鼻。”（《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列异志·三王家》云：“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鲁迅历史小说《铸剑》主人公作“眉间尺”，盖额阔鼻赤，是为异像。比与鼻音同，这是《孝子传》、《列异志》、《搜神记》三书记录同一民间事时所出现的差异。

第三，比同“皮”。《左传》庄公十年：“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杜预注：“皋比，虎皮。”赤比意谓面皮赤红，盖谓性格刚烈也。古典小说写刚烈之人，往往是赤面；旧戏曲中脸谱中红脸，也象征刚烈。红面人性格刚烈，来自民间，意亦甚古。赤比刚烈，不惜自刎以报父仇。此或即《搜神记》不作“赤鼻”而改用“赤比”的缘故。

总之，我以为“赤比”作“赤鼻”或“赤皮”解，于义为长。所谓“莫邪子名赤，比后壮。”盖注家不明本意而破读也。

“书海酌蠹”责任编辑 刘斯翰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 作用与任务

林子英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决定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涵义和特点

1. 城市精神文明的涵义

所谓城市精神文明，指的是生活在城市区域的人们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它是城市市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城市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为城市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城市市民的道德标准、文化素质以及整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等等。城市精神文明是随着城市的出现而产生，它的发展也是受着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

城市的出现，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还是人类社会区分野蛮和文明两个不同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①“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②这说明，城市和文明是密切相联系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文明。城市一经诞生，它就以其较之农村更为优越的生产条件、经济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加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并在此基础上，使城市精神文明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它不仅积累和创造着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而且代表着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正如列

宁所指出的，城市发展了人类文化，这是“充满朝气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的历史功绩。”③

2. 城市精神文明的特点

一般说来，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可大体分为城市精神文明与农村精神文明两大类。这两部分精神文明既有其相同的共性，同时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城市精神文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 集中性。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城市精神文明的首要特点，在于集中性。

首先，城市是各种文化、科技设施的集中之地。城市是生产力发达、经济繁荣的区域，这种状况势必导致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凡是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科技等设施都集中在城市或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当今的国际城市巴黎，不仅拥有370多座剧院、80个博物馆、170个大型图书馆、200家出版社等设施，而且还掌握着全法国70—80%的报纸。我国也不例外，我国97%的高等院校都设在城市。就以北京为例，北京拥有高等院校5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7.5%。其中重点大学22所，占全国重点大学总数的25%。除此以外，城市还普遍拥有门类齐全的科研机构，拥有从低层到高层，从专业到业余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及拥有图书馆、报刊、广播电视、剧院、医院、体育场、公园等一整套人们发展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文化设施，从而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城市是各类人才云集之地。集中的教育、文化、科技设施，必然相应地集中了大量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据1983年的统计，在全国286个城市中，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95.0%，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占全国的72.4%，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占全国的80.6%，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占全国的75.5%。与此同时，这些城市拥有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59.2%，卫生技术人员占全国的62.4%。难怪人们称城市为创造精神财富的摇篮，人类智力密集的宝库。

(2) 先进性。城市精神文明还具有先进性的特点。城市精神文明先进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物质生产的先进性决定了城市精神文明的先进性。城市所集中的各种教育、文化设施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还表现在质上。也就是说，城市所拥有的往往是该国家或该地区，在现阶段最为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等设施。这些设施不仅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审美情趣等。马克思说过，“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④从而使城市精神文明始终位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前列。

其次，城市以其地利优势，使城市精神文明具有先进性。与农村相比，城市往往占据了气候良好、交通便利、通讯发达等天时、地利优势。也正是这种优势，使城市成为了教育、科技、文化等交流和传播的最佳场所。事实证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科技、文化等的交流与传播是必不可少的。而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输入和输出。因此，通过城市可以接收大量准确而有用的信息，取天下之宝，为我之所用，从而使城市精神文明得到不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正是城市精神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城市精神文明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的原因之一。

其三，城市精神文明代表着整个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城市作为人才荟萃之地，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高尚的情操也必然首先地、集

中地在城市表现出来，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人们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准。另一方面，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⑤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作为人类进步的产物，它也就毫无疑问地成为广大农村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将来阶级差别的消失，城乡差别的消除，也只能经过高度的城市化才能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差别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全社会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城市精神文明作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代表着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

(3) 整体性。由于人口和工业、商业、学校等单位的高度集中，因而也就使城市成为一个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有机整体。各种各样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制约、错综复杂。这种状况，决定了城市精神文明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首先，城市是由不同利益的人群所组成的。城市中，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这些群体之间，既有其共同的根本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特点，而这些不同的利益和特点，必然会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其次，城市是信息渠道众多的网络体系，大量信息从各种渠道涌入城市，影响着市民的思想，使市民的思想表现得更为复杂，更为多层次性。有些思想通过城市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在城市里以及向城市外迅速的扩散开来，成为一股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潮。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了城市精神文明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整体，其各要素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从而显示出其整体功能。

(4) 辐射性。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可以说是点与面的关系。农村是城市的基础，而城市却以其辐射性的特点，发挥着以点带面的作用。在城市生产的大量物质产品流入农村的同时，城市人们的思想情操、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管理方法以至生活方式等也随之向农村渗透，并对农村原有的思想观念、文化结构、生活习惯等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精神文明正是通过这种辐射性，体现着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地位，并因此而吸引和促进农村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

二、城市精神文明的作用

城市精神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城市精

神文明在社会精神文明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1. 城市精神文明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城市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热衷于依据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办事，在思想上未能充分认识到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在行动上则看不到城市的先进性，而主张实行工业建设村落化；并把大量的城市人口赶往农村，企图通过抑制城市发展，降低城市水平的做法，来拉平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30多年来没有切实把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纳入到近代科学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了对城市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了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导思想。我国现有职工数1.3亿，他们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少保守思想的阶级，同时也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导力量。

其次，城市精神文明的发展决定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城市精神文明不仅代表着农村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且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如何，也直接决定着农村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恩格斯说过：“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⑥因此，城市精神文明的状况，往往直接体现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传统和气质，成为该国家或区域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城市精神文明所起的这种主导作用，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传播引导和榜样示范等途径来吸引和帮助农村精神文明沿着正确的轨道而顺利发展。

2. 城市精神文明的推动作用

首先，推动着人们进行观念更新。城市以它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并拥有众多的信息渠道和手段等优势，为人们的观念更新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中不难发现，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时效观念、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人才观念以及法制观念等等，总是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对农村发生很大的影响。

其次，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农村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物力支持和智力帮助。例如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星火计划”，以一些“短、平、快”的科技项目为“星火”，通过示范和推广，已在广大城乡形成了燎原之势。城里的科技人员，采用技术下乡，智力支边等形式，在发挥其专长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科学技术的展发。

其三，推动着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体现着人的精神风貌。一般说来，一种新的、科学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往往起源于城市，并由此向广大农村逐步推开，最后引起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三、现阶段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1. 提高市民素质

提高人的素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而对于城市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市民的素质。这是因为，市民是构成城市的主体，市民的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公共秩序、社会风尚和两个文明的发展。

首先，必须重视提高市民的思想素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向前发展，在思想道德方面，对市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近几年来，在我国广泛开展的建设文明城市的活动，对于提高市民的思想素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建设文明城市的实质，就是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市民在摒弃旧传统、坏习惯的同时，在城市建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例如，广州市在建设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就于1985年10月修订和公布了《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公约对广州市民作出了“热爱祖国，美化广州；以礼待人，不讲脏话；邻里团结，家庭和睦；移风易俗，计划生育；助人为乐，敬老尊师爱幼；遵守法纪，不搞迷信赌博；讲究卫生，不乱丢乱吐；绿化环境，植树种花护鸟；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自尊自爱、维护国格人格”等10项明确规定，使之成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与此同时，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军民共建、厂街共

建、校街共建、干群共建和警民共建等活动形式，也是有利于市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的。还有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也有效地增强了市民的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然而我们在总结上述经验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依然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吸收各国优秀的精神产品的同时，西方各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也会乘机而入，对城市的市民，尤其是对开放城市的市民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广州市某区曾对青年职工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应怎样渡过”的调查。在收回的888份问卷中，有32.8%认为是“努力工作多赚钱”；同意“有钱就享受”的人也占了41.7%；而认为要“为祖国多作贡献”的人却只有19%。这说明金钱万能、享乐第一的思想，正在侵蚀着市民的头脑。还有在城市街头曾经出现过的杀人凶手在数百名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而英雄、勇士血洒街头却无人救援的现象，也反复地告诫着人们，提高市民的思想素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同时，在城市还应特别重视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城市中各行各业门类齐全，对不同行业提出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例如，建立文明礼貌，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建立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医务道德；建立热情友好，不卑不亢的导游道德；建立情操高尚，台风正派的文艺道德和建立秉公执法、依法办事的公安、司法道德等等。以此树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建立起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其次，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是根本。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市民的文化素质与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很不相适应的。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教育事业仍然相当落后，在全国7个计划单列的城市中，广州的教育质量倒数第一。1986年广州市的小学、初中升学率分别只有77.31%和48.71%。城市教育的这种状况，不能不直接影响着市民的文化素质。同时，在文化、科技设施方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国家“六五”计划规定，要“基本上做到市市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然而，到1985年底止，全国仍有40%的市没有博物馆，有850个县没有图书馆，

还有两个省甚至没有省级图书馆。而广州市则成为全国唯一没有专门少年儿童图书馆和独立建制的区一级图书馆的大城市。在广州市平均每1075人才有一个阅览座位，藏书总册数在全国11个大城市中排行第8。教育经费、文化事业经费严重短缺。目前，广州市一年的文化事业经费只有7百万元左右，仅相当于平均每个市民买一张戏票的钱。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了提高市民文化素质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2. 完善市容管理

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的面貌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一个城市的交通是否便利，环境是否干净优美，人们是否文明礼貌，公共秩序是否井井有条等等，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水平和市民的精神风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所谓“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指导下，忽视了城市的环境美化，忽视了市容管理的完善，城市中出现的“脏、乱、差”现象，影响了市民的工作和学习，甚至败坏了城市的声誉。目前，我们已经从深刻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市容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同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据1986年的统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总面积为16.5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绿化覆盖率达20%的城市，从1931年的37个上升为45个，人均占有公共绿地3平米的城市也从1931年的75个，上升为82个。广州市市区的覆盖率已达29%，人均占有公共绿地为6平方米。并先后新建和扩建了草暖公园、星海公园等50多个公园和风景游览点。这对于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美化市容，为城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完善市容管理的任务依然是长期的、繁重的。除了各级领导重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外，还必须注意从提高市民的素质入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5卷第132页

④ 同②第46卷（上）第494页

⑤ 同②第46卷（上）第480页

⑥ 同②第7卷第387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英

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论思考和决策构想

武惠恩 毋青松 刘爱军

我们从工作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强烈感到,我国农业经历十年改革,制约生产力再提高的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二个十年,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决策思想和工作重点要实行战略性推进——以生产力要素革命为主线,推动农业上新台阶。

古今中外生产力发展史表明,
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资料性能,
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导

我们党经过近40年经验积累和付出沉重代价,到“十三大”摒弃了“生产关系标准”,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历史性飞跃。但是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生产力?这显然就需研究并依据生产力的运动规律来决策。而我们过去对生产力规律形成了不少片面的理论观念,有些仍以“惯性”不自觉地存在于决策思维之中,尤其有三种观念需要转变。

一、要依据生产力的实质来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发展生产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不能只求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提高

1. 究竟怎样才叫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力表现在量与质两个方面,其实质是体现为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度量这种能力高低的综合表现,是看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能生产出多少使用价值,主要是看劳动生产

率。衡量生产力发达与否,当然也要看产品的数量规模,但根本检验尺度是看效率高。1986年我国的粮、棉、肉、蛋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①但并不表明生产力是世界第一流水平。

2. 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本质表现,正在于效率低下并且提高缓慢,而这正是农业徘徊、农产品供求紧张、农民富裕程度不高和剪刀差难以消除的深层根源。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尖锐指出:目前“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我国1987年每一务农劳力(已转入非农产业但仍兼营农业的8100万劳力除外)平均生产粮食1311公斤,肉类72公斤,比汉朝时期劳均1000公斤粮食略高些,仅为美国1986年相应指标的1.13%和0.87%;劳均创产值1514.6元,仅为1986年国营工业劳均产值1.55万元的10.2%,仅为美国农业劳均产值5.53万美元的1.38%,比发展中国家平均的915美元也低16.4%,^②这就决定了即使把农产品价格和产值利润率调得再高,除农民自己消费外能提供的剩余产品量、务农盈利的绝对值、农民的富裕程度,也只能是低水平。如果离开这方面的分析判断形势,就模糊了对农业症结问题的揭示。

3. 这就表明,必须把提高农业的效率

列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提高农产品价格虽是必要的，但更应把降低价值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治本措施。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不断降低价值，从而不断降低价格，使使用价值不断增多的过程，这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物质内容。我国也须走这条路子。但在改革前，我们误把产量的增加等同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甚至不惜以增大耗费来换取产量的膨胀，结果是给生产力带来恶性破坏；而改革以来，有一种意见，仍片面得失于产量的增减，以此作为评判生产力发展与否的主要依据；在制定战略目标和农业发展规划中，仍是只提数量指标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等效益指标。

二、要依据生产力的运动规律发展生产力，弄清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不同作用，不能夸大劳动者因素作用而忽视物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

1. 劳动者不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实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种实物形态因素和渗入前者的科技、管理、信息等知识形态因素的结合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史表明，劳动者的状况和劳动积极性的高低，虽对生产力有重大影响，但并不能使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发生质的变化。原始人迫于生存驱使劳动积极性很高，但使用着原始劳动资料，生产力只能是极低水平；奴隶制下的奴隶劳动积极性极低，但由于劳动资料的进步生产力却提高了；资本主义中的雇佣工人劳动热情应比自耕农、小业主要低，但生产力却比前者高得不可比拟。

2. 劳动资料集中体现着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水平，是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

的指示器。由原始经济时代到古代、近代、现代生产力的历次大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马克思有一科学分析：“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③可以说，有什么水平的劳动资料，才会有什么水平的生产力。

3. 劳动资料的改进，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古今中外生产力发展史，展示了生产力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从劳动资料的改进开始的，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的，归根结底，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资料水平，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导，起着决定性作用。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不仅能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性能和劳动者素质都发生质的变化，而且可使三者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更佳组合，这种关系和作用，可用有的学者提出的下列图式示意：

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象) × 科学技术。从中可看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乘数作用，表现为“第一生产力”。

4. 但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并夸大了劳动者特别是劳动积极性的作用，“第一生产力”没有放在第一位，决定性因素没有摆在决定性位置，误以为只要有了人的积极性，即使用毛驴和扁担，也会创造出发展生产力的奇迹来。近年来面对农业徘徊的困境，有一种意见，仍是把如何诱发农民的积极性看成决定手段，以为再给农民几颗“长效定心丸”，给予永佃权，甚至土地私有化，就可产生神奇的功效。这当然

会有一些作用，但如果没有物质技术因素的巨大提高，生产力还不可能发展到新的水平。温故而可知新，回顾建国初单干时期，农民不仅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和销售自主权，还有土地所有权，其自主权和积极性都可谓高矣，但为什么生产力仍是低水平！

三、发展生产力必须采用两类手段，不能以生产关系的革命混同和代替生产力自身的革命，不能夸大前者作用而忽视后者作用

1. 发展生产力要两类手段双管齐下。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要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一是要使各要素实现优化组合，二是要提高各要素。

2. 生产力各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再生产中各要素经过重新组合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组合方式，就体现着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承包、租赁等也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人们的地位和关系，从而也就决定了分配形式；从再生产过程看，也就是各要素从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上进行转换实现重新组合，这种转换方式，也就体现为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生产关系。所以实现优化组合，就需调整变革好生产关系（当然组合方式不是全等于也不是全部体现为生产关系）。

3. 提高生产力各要素，使其发生量的增长和质的变革，其中质的重大变革就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革命可简称为生产力革命。中世纪手工业生产力发展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进行了工业革命、电力、电子等革命才实现的；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为现代农业生产力，主要是进

行了生产力要素的三大革命——农业的生物革命、化学革命、动力革命才实现的。

4. 生产力发展史表明，变革生产关系，并不能代替生产力自身的变革。优化的组合方式、优越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产生四种作用：一是可使各要素现有功能充分发挥；二是可使再生产顺利进行；三是可形成乘数效益（如马克思分析的协作可提高生产力）；四是可形成一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和有利于各要素再提高的机制和条件。所以变革生产关系当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一定条件下还可产生决定作用。但是，第一，这绝不是发展生产力的唯一手段和全部内容；第二，也不是在普遍情况下都可产生决定作用；因为变革生产关系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生产力的再提高，还必须通过生产力各要素自身的改进更新才能实现，也就是还必须再进行生产力要素的变革，而在大量情况下这正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

考察外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不是同时进行了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素两方面的变革，美、日等国显示得很清晰，这里主要思考一下匈牙利的经历。匈从1968年实行“新经济体制”正式开始农业改革，经过十年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1977年时人均占有的谷物、肉、蛋、菜、果均居经互会诸国之首，由匮乏变为出口，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超过苏联接近法国。劳动力人均生产的谷物、肉、蛋、奶分别是我国十年后1987年的9.1倍、17.6倍、128倍、47.7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进行了经济体制、购销、价格等体制改革，不少内容与我国近十年改革相类似，

而与我国不同的是还大搞了农业生产力的三大革命，农业、畜牧业实现了良种化，化肥十年增长四倍，拖拉机动力翻了一番，谷物生产全部工序机械化，畜禽饲养实现了工厂化，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④

5. 但在改革前，我国有一种浓厚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观念，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误以为只要调整好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会自然发展起来。二是误以为生产关系形态越高级，生产力发展就会越快，醉心于不断升级的生产关系大革命，把这奉为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手段和万能灵药，而对于生产力自身的革命，却缺乏认识。三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组合方式的选择，对农业生产新机制形成起推动作用，特别是能够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资料水平，但过去的体制和旧观念影响，没有把农业的技术进步摆到应有的位置。

6. 农村改革以来这种思维的影响仍然存在。开始时以调整“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为突破口，收到了显著成效。本来这只是“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的效果。其主要效用是调动了劳动者因素中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从而又使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多年形成的潜能集中释放，使生产力的数量规模有补偿性增长；但这些生产关系的改革本身并不等于也并没有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在质上有新的飞跃，所以生产力的质和发展水平也没有提高。但随之形成了一种“一包定天下”的片面的经验，又一次忽视了生产力要素的革命，当粮食产量出现徘徊以后，还只在“一定30年”、“完善大包干”等生产关系中

寻对策、寄希望，仍然没有把生产力要素的更新提高做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我国似有一种“偏爱”生产关系革命而忽视生产力革命的思维传统，究其渊由，和固守老祖宗理论缺乏创新意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时面临的历史任务，首先是推翻旧的生产关系，所以致力于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强调了变革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而当我们推翻了旧的生产关系后，本应致力于研究生产力及其运动规律——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生产力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但却仍然一再把变革生产关系奉为主要手段。而且过去30年的这些片面理论和办法又成了一种“经验”；在改革开始时，我们搞生产关系的改革初战告捷，这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经验”，仍难以从“偏爱”生产关系的狭窄圈子中跳出来。

分析农业生产力的现状及动态， 也尖锐表明提高物质技术要素是 攀登新台阶的决定因素

一、虽经十年改革，农业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仍无实质性提高，某些方面甚至退化

1. 部分地区农业劳动者弱化——劳动者因素又体现在数量、素质、积极性三方面。总体特征是数量过剩、素质不高。动态变化是在一批非农产业发达的乡村，农民务农兴趣淡化、劳力弱化，出现了老年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

2. 部分劳动资料退化——农业劳动资料主要由三种系列构成：包括水利、植保器械等生产工具系列；农油、农电等能

源系列；温室、大棚、圈舍、储仓等生产建筑物系列。总体特征是装备落后，数量短缺。动态趋势是部分重要劳动资料退化。水利设施有1/3以上老化和损坏，1987年有效灌溉面积比1980年减少1000多万亩。农机总动力增长不少，1987年达2483.6亿瓦，但大部分是“农转非”，且因油、电严重不足，估算用于农业作业的只有1/3。1987年机耕面积比1980年减少6800万亩，占总耕地的10%，机播占14.5%，机收才6.3%。⑤由于地块分割过碎，使原有的一批大型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闲置，人拉耒等沉重低效劳动重新大量出现，古老型装备（扁担、箩筐、锄头、木犁）仍是主体工具。山西省社科院在昔阳县调查，现在仍普遍使用的15种农具，40%是创制于一千多年前的铁器时期，33.3%创于两千年前的青铜器时期，26.7%创于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⑥塑膜保护地栽培，被誉为白色革命。晋城市的沁水县1986年覆盖玉米、小麦谷1万亩，增产幅度高达130%和140%。1987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覆盖栽培粮食作物1826万亩均收显效，其中594万亩玉米亩均增产180公斤，⑦确是有效的增产措施。但农用膜产量1984年26.6万吨，1985年减为18.8万吨。⑧

3. 主要劳动对象恶化——农业劳动对象主要由四种系列构成：耕地、林地、草地；种子、种畜、种禽；农药、肥料；饲料。总体特征是数量不足、性能低下，动态趋势是劳动资料的退化又导致了耕地性能的恶化。不仅人均耕地到本世纪末将减为1.08亩，而且排灌设施损坏，机耕变为牛耕、人耕，其后果不仅是降低了劳动

生产率，还导致了活土层变薄、土壤结构破坏、抗灾能力减弱等恶化性惩罚，中低产田占到2/3。我国粮食作物对路优种少、更新换代慢、混杂退化严重，畜禽优种覆盖率仅有10%。1985年配合饲料生产了145万吨，只及美、苏的1.8%和2%，而且70%质量低劣。化肥量少质差利用率低，70%是发达国家已淘汰的低浓度的低效肥，利用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农药产量连年下降，“五五”期间年均49万吨（100%有效成份），“六五”降为36.46万吨，1987年又减为26万吨，1989年计划只安排20万吨，多种病虫害大面积发生，每年因之损失粮食约为总产的10%，达800亿斤之巨，损失棉花为20%，因病死猪为存栏的10%（世界平均为3%），死家禽20%，死羊8%。⑨

4. 组合方式质态优化和量态劣化——两层经营体制下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在生产要素的质态（属性）组合上是优化组合，这是十年改革的突出成果，也将是我国国情下长期适用的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组织方式。但从各要素的量态组合、空间（地域）组合上看，则是明显的劣化组合，由于人多地少和平均承包，形成了户均只有6.7亩且割裂为9—10块的格局，这种畸形的数量匹配，造成了四种不利后果：一是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原有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二是妨碍着先进工具的使用，又导致了耕地性能的退化；三是狭小的规模使其在主体上只能是农业式的自然经济，缺乏追求商品经济效益的动力和压力；第四，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得用先进装备和技术改造农业既无主观动力又无客观条件。从这

方面看确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我们不能离开我国这种特定的数量特征，笼统地讲什么发达国家也是家庭经营，需知法国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耕地规模是382.5亩，爱尔兰是387.5亩，西德260亩，荷兰217.5亩，丹麦482亩，欧洲共同体平均204亩。可以断言，如果我国这种使用原始农具手工耕作的、十分狭小的吃饭农业状态长期不变，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必然长期滞留在落后状态。对于家庭承包体制，既要肯定其历史功效，也要看到其发展中的局限性，要保持其优化的质态组合，但又要逐步改变其劣化的量态组合，实践已证明的成功办法，就是逐步转变为家庭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并不是否定和改变了家庭承包制，而正是家庭承包制的完善和提高，并不是否定了前段的改革成果，而正是改革的前进和深化。

从再生产过程中的转换方式看，几年来在农产品销售、农资供应、价格等环节实行了以双轨体制为中心的不少改革，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看是成效不大，仍存在着三大问题，即农资匮乏、农产品价格扭曲、商品流通机制发育不良，这使生产力各要素物质的替换与价值的补偿都遇到诸多困难，难以顺利实现重新组合，更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重新组合。

二、生产力中物质、技术因素的“徘徊”，才是导致农业徘徊的主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农民热情不高是形成徘徊的主要原因，在一部分非农产业发达的乡村，农民务农热情减退、耕作简化，当然是这些地区农业徘徊的一大原因，但在全国大多数乡村，仍是以农业为主要收入门路的，即使是“无奈”

或“被迫”，家庭承包制仍然产生着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效用，全国性的争购直至不惜以高价大量购买假化肥、假农药、假优种，就是有力的佐证！这难道能怨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是个物质能量的转换过程，包括活劳动形态和物质技术形态的投入和转换。我国1976—1985十年的实践表明，粮食产量增加与化肥、农机、农电、农油投入的增加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⑩而近几年，我国的农用工业却处于徘徊甚至萎缩，导致了生产力中物质技术要素的“徘徊”和部分退化，这才是导致徘徊的主因。

三、实现农业的发展目标，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中物质技术的巨大提高

全国粮食总产到本世纪末需由4亿吨增加到5亿吨，即使粮田面积能保持不减少，按占用面积亩产需达450公斤以上，按播种面积亩产需由1987年的235公斤提高到300公斤。1986年，只有少数农业发达国家英、日、南朝鲜、法、西德、东德、匈、丹麦亩产才超过300公斤。^⑪我国当然也有此潜力，但除了要使农民有积极性以外，还必须使物质装备和相应的技术手段有突破性提高。农业部分析，每形成1000亿斤粮食增产能力，约需增加标肥1500万吨、农机5000万马力、农电130亿度、柴油130万吨。^⑫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研究测算，本世纪末达到5亿吨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发展指标，化肥用量需达3265万吨（折纯量），比1987年生产的1703万吨增长91.7%，而且氮磷钾比例需由1986年的1:0.2:0.002改为1:0.5:0.25，即需大量新建磷、钾

肥工业，靠此约可增产粮食10%即400亿公斤；需再大面积更换良种两次，靠此可增加产量10—20%即600亿公斤左右；仅此两项就可增产1000亿公斤，当然还必须相应地加强植保、保证排灌、精耕细作，农机总动力需由1987年的3.36亿马力增加至5亿马力，增长48.8%，农电需由659亿度增至919亿度，增长39%，农药需由26.3万吨增到45万吨，增长73%。我们分析如果地膜覆盖粮田能达到1亿亩，亩增150公斤是有可能的，即可增产150亿公斤。但需供应塑膜80万吨。^⑥总之，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技术要素的变化，即使农民有再高的积极性，生产力也绝难上升到新水平。

把家庭农场技术改造作为第二个十年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

一、把家庭农场技术改造作为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期战略目标

(1) 下决心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我国农业第一个十年改革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果，是找到并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再实现技术改造；应作为第二个十年的战略主题。力争经过十年，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农业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不仅是打破徘徊态势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2) 实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农业生产力的生物革命、化学革命、动力革命；而要开展技术改造，就必须使劳动者有此主观热情和客观条件，这就需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组合方式、转换方式。综合起来，要以大规模的技术

改造为主线，同步带动集约农业、规模农业、商品农业的实质性发育，这应作为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期战略目标。

二、发挥农业技术改造政策作用

从改革角度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培育形成农业技术改造的有效运行机制和社会条件。最主要的政府行为，是要象推行承包制那样，由中央制定全局性系列化的农业技术改造政策、法规和措施。

1. 形成先进技术常为农业服务机制。目前的突出问题是，虽然农业科研、教育力量比较雄厚，但不负担技术推广任务；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十分薄弱。推广体系是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必不可少的桥梁，要下决心改变上述畸形状况：

(1) 对现行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脱节的体制改造为三结合体制。除了实行已出台的“两个放活”、组织科技人员承包科技推广项目等改革政策外，建议把这种行为普遍化、制度化。在每一农业院校、农业科研机构都设立技术推广系（部），采用轮换形式组织专家教授到农村进行技术推广，同时承担教学、科研和推广三项任务，这就需要在机构设置、经费、组织形式等进行大的改革。

(2) 由国家负责强化乡（镇）级技术推广机构。在我国农民技术素质普遍低的状况下，农民自己的技术研究及推广组织要扶持。同时，每个乡镇都要设立“官办”的综合性农林牧水推广机构，正式列为国家事业编制系列，这样才能打开农业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之路，才可改变农业技术人员既短缺又浪费状态。

2. 农民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只有把科学技术变成农民的经济活动，才能变为

生产力。针对我国的农情特点，要分类采取措施：

(1) 在以狭小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区，还不可能迅速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所以重点是推行小规模耕地上的技术密集加劳动密集的园艺农业、覆盖农业、立体农业模式的集约化经营技术。

(2) 在非农产业较为发达的乡村，要果断出台促进农业家庭规模经营的政策。这应确定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战略方向。党中央(1987)5号文件中指出的“长期从事别的职业，自己不耕种土地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原则上应把承包地交回集体，或经集体同意后转包他人”的政策要进一步明朗化，并进一步充实。

3. 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改变农具的落后状态。

目前我国本来薄弱的农用工业又呈萎缩趋势，成为严重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大因素，这种局面如不改变，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在我国工业体系已相当雄厚的今天，发展这些普遍技术的农用工业，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并制定

发展农用工业的产业政策。

- ① 1988年《中国农业年鉴》，肉类产量中不包括禽肉。
- ② 根据1988年《中国农业年鉴》198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世界农业》1989年2—3期资料计算。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4页。
- ④ 主要参考中国农科院情报所编《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和《中国和国外农牧渔业经济统计资料及其对比》。
- ⑤ 1988年《中国农业年鉴》。
- ⑥ 《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2期。
- ⑦ 1988年《中国农业年鉴》。
- ⑧ 主要参考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农牧情报研究》“农业技术改造”专辑。
- ⑨ 主要参考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农牧情报研究》“农业技术改造”专辑。
- ⑩ 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农牧情报研究》“农业技术改造”专辑。
- ⑪ 1988年《中国农业年鉴》。
- ⑫ 《了望》1987年22期。
- ⑬ 主要参考《2000年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问题研究》。

作者单位：山西省晋城市农村经济委员会

责任编辑：黄振荣



农业投资:

近几年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张琦

如果说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1984年以前的农村经济增长是在农业投资上诱导和驱动的结果,那么,1985年的粮食大减产和当前农业出现的严重萎缩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投资上的减少和农户投资结构上的大偏转。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增加农业投资和改造农户投入结构就成为振兴农业的重要课题。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农业投资出现许多新变化,最明显的有三个特点:

一、投资主体的结构转换。在土地联产承包制之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是以农村集体的身份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 and 不完全性的经营者为中心、以国家的身份也就是间接的投资经营者和不完全的生产者为指导的双重结构。在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投资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迁,特点是:(1)国家投资比重锐减;(2)集体投资主体身份地位下降;(3)农民投资主体身份确立,并且投资主体的数量多,呈一种分散式的独立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主体结构上的变异,尤其是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丧失,集体投资的辅导地位成为一种虚假空壳,使得农业投资急剧地演化为近似于农户单元的主体结构。这种单元结构,一方面,充分地调动了农民作为投资主体与直接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使得多年淤积的能量得到巨大的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农业的停滞僵化局面,农业呈高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正是这种新的投资主体结构上的变异,使得农户单元投资主体结构在发展方向、规模、项目确定等各方面出现了一种盲目性、自发性和难以避免的波动性。事实上,农业市场是一种变动周期较长而又容易变动的模糊市场,透明的部分

常常是市场的黄昏。农民投资主体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是难以获得全面系统的市场信息,只能以模糊行为对待模糊市场,从而也就难以适应市场波动性变化的特点和抵消市场本身的一些负效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宏观指导与服务体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交替融合的混合经济中更是如此。

二、投资导向的偏转。(1)是投资导向上非农化趋势。其原因是:第一,从整个农村宏观角度来讲,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整个农村的劳动力出现剩余,农民财产权利与身份自由的部分解放,农民有可能在其自身从事农业生产之后,从事其它产业。第二,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性,明显的季节性与区域性,时间上的部分闲置性,必然以非农产业化为补充。第三,工农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和工农产品效益“缺口”上的极变化,在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下,必然造就农民投资主体追求工业服务业利润与效益的动机。

(2)农业投资,尤其在土地投资上的短期化。表现在:投入农家肥料与化学肥料并不考虑土壤改良;投入土地的劳动下降;农业科学技术投入不足,机械化工具使用率下降;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尤其是水利渠道等无人问津。

造成投资短期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现实的压力,农民资金不足,生产力落后。其二是主观原因,除了农民自身素质差、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管理落后外,还有政策上的人为约束因素。我国现时的农村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种平均承包下的分散经营,在实行这一制度

改革初期，曾规定以十五年为限，现在已经接近十五年，面临政策的转换，这样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不可能是一种长期性投资，而只能是短期化行为。同时这一制度也不能对农民投资主体产生规范化的约束与调控。

农民非农产业投资短期化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非农产业投资得不到政策上的优惠，诸如原材料供应与产品的销售，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培备等等，都处于劣势。再加上现时的通货膨胀现实与国家的收紧银根、优化结构措施，农民非农产业经营的国家非计划性，自然以短期化行为去适应。

(8) 农业投资的兼业化复归。兼业化在我国现时农村中可以说是一种绝对主导行为，因为政策上的偏向与外部环境之恶化及其内部制度上的不完善性，兼业化成为农民投资主体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兼业化，才能减少农业经营的风险和可能性损失，形成与他业的利益互补；才能减少二元结构政策造成的利益损失。

三、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倾向扭曲与错位。建国40年来，我国的产业投资政策一直采取以工业为重心的“倾斜性”政策，农业处于倾斜天平的低准位置，而在农业内部又倾斜向种植业，在种植业中又以倾斜粮食生产为重心，这就形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宏观上的倾斜与农业部门上倾斜的多层次扭曲结构。虽然这种倾斜扭曲结构在改革中得到一定的改观，但是由于农业超前改革的超前效益，又使这一倾斜战略在农业超常规增长的成就中复归。事实上，近几年来对农业的投资是逐年在减少。在复归之同时，又出现了国家投资与农村现实生产不协调的错位现象，即农业投资渠道没有根据新的农户投资主体新型的经济关系进行转换，表现在，我国现时的粮食收购是通过各级粮站来完成的，农民交售粮食与粮站直接发生经济关系，而农业投资是通过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渠道与农民间接发生经济关系，这样，间接发生经济关系过程中的中介组织的层层挪用，使得留给农民的就所剩无几了。事实上，农业投资在改革之前通过政府行政渠道逐级下拨是与改革前的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农民主体的确立，农业投资的主渠道也应随之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的现实并未发生。其结果必然导致农业投资的虚假与流失，农民主体的利益受损，农业生产下降。

近几年农业投资的主要问题是：

首先，农业投资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

第二，多重投资系统的结构断链：(1)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的持续性、系统性断链。(2)地方财政投入与集体积累能力的削弱、甚至消亡同区域农业基础强化所需资金的断链。(3)农民在投资结构上的偏转与农业生产结构平衡上的断链。(4)农民财产权利与身份自由的断链。这四重结构性断链，使得农业投资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农业投资机制更加脆弱，投资主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第三，宏观投资结构上的畸形。表现在：(1)有形投资的结构性偏差形成扭曲结构，无形投资的有减无增构成经济发展新约束。(2)有形积累每况愈下，无形积累空幻虚假，矛盾重重。在这里，最为根本的硬约束是，无形投资与无形积累上的缺口。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农业的最基本投资，没有人的素质提高，任何其它投资都将降效或失效。因此，这一结构问题又是农业发展的潜在“陷阱”。

第四，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农业利益的大量流失或被掠夺。事实上，投资可分为明投资与暗投资，明投资就是财政投资和积累投资，暗投资就是通过价格提高实现的间接的农业投资与积累。而我国目前明投资在减少，暗投资呈负效应，二者共同作用，构成了农业投资的“负效应循环”。

笔者认为，改变农业经济发展的徘徊局面，要寻求新的农业投资机制良性生长点与契机，建造新的农业投资机制，构成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由于农业投资机制的形成，并不只是直接投资本身的经济问题，价格体系、国家税收、财政预算与平衡都是农业投资不可缺少的。当前除了从宏观上强化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份额，改变我国近几年来对农业投资减少的弊端外，重在优化政策，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土地制度创新：土地是农业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土地制度的创新，将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不完备性和不彻底性以及实践中的短期性，已经构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将现行土地使用权个体化改变为土地所有权的个体社会化，才能使农民及其他经营主体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保证农业投资的永续性、高效性

及农业投资机制的良性生长点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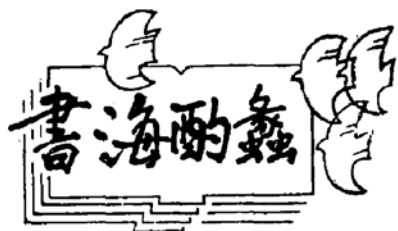
第二，是价格体系创新。我国现行价格体制不合理与市场要素发育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经济利益外流和农业投资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放开农产品市场，让农产品与工业产品在商品经济市场中平等竞争，是解决农业投资不足的出路之一。

第三，投资结构的重新转换。我国农业投资结构与投资导向上的非农化趋势，投资短期化行为，以及有形投资与无形投资、有形积累与无形积累比例的畸形化，需要有投资结构的重大转换。使投资结构转换到农业之中，转换到无形投资与无形积累之中，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农业投资主体。在有形投资与有形积累中增加基础建设比例，增加农业后劲。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之投资也应成

为农业投资的重点。

第四，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优化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与行为功能，增加地方投资的积累；其二是加强集体合作和经济社区功能。我国在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集体组织名存实亡，其职能完全软化，乡村在农业投资中既不是主体，也不是监督调控机构，这是农户投资盲目浮动、短期化掠夺经营和资源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功能，形成农业投资的联合体，是改变农业投资分散分布、实力薄弱、竞争不强局面的基本手段，同时是农业投资机制完善的组织保证。

作者单位：西北农业大学农经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三后”释义辨正

边家珍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在”，集才智于一身。有了他们，所以尧舜“既遵道而得路”（“既”字值得玩味）。紧接着屈原就设问道：为什么桀纣狂妄偏邪以至于穷蹙窘步呢？原因在于党人偷乐，佞臣陪道，致使政道“幽昧以险隘”。历来注家多将“既遵道而得路”与后面的诗句分开来讲，不妥。我们认为这段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尧舜之所以圣大光明，遵道得路，是因有三后辅佐；桀纣之所以猖狂邪乱，寸步难行，是因佞臣小人结党营私，苟且偷安之故。由此看来，“三后”指尧舜之臣。《尚书·吕刑》谓“……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因此，蒋骥释“三后”为伯夷、禹、稷，与屈子文意相合，是比较恰当的。

企业行为：动力结构与价值判断标准

张良卫 李泽中

与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相适应，企业财产(关系)的运动和操作，亦即企业经济运作或运行，乃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并以企业行为作为自己过程的集中表现。企业动力与目标、企业行为、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企业行为

所谓企业行为，是指企业在其经济活动中，在有关人、财、物、产、销等各方面活动的经济决策中，所具有的、以统计上的大数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倾向。^①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它实质上是企业由一定外部经济环境的刺激结构和内部动力结构交互作用所制约、为实现一定的经营目标所作出的规则性反应。企业的经营目标，决定着企业经济运行的方向，制约着企业在可支配收入的分配、生产经营规模、生产要素配置等各方面的选择。尤其是在企业具有了一定的经营决策权后，它将决定企业在供产销各项活动中的状态，形成劳动力和资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实际分布。因此，企业经营目标这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至于企业对一定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动力交互作用的反应方式，则决定着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有效

性。在企业的经营环境中，企业面对着各种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面对着各种生产要素不同的分配手段和供给渠道(或配置方式)。对这些不同的信号和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内部动力结构系统的驱动下，企业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从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必然是有规则的，它是企业的一定外部经济环境刺激和内部动力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

二、企业动力机制与结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财产关系是企业内部动力机制(亦或简称动力)的决定性因素。按照经济利益原则，企业内部动力机制的形成，根源于企业对自身可能利益的追求。而企业自身的可能利益，除了外部经济环境的一定刺激和约束外，则是由企业财产关系所决定的。企业财产关系决定了企业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从而，决定了企业自身的可能利益，由此也就成为企业动力机制和结构的决定因素。

在社会主义企业不同的财产关系下，

企业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和结构。其一是行政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在传统的国家所有制高度集中计划的直接控制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二是利润动力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各国体制改革中，试图使之成为企业的主导动力机制的形式，它的形成，在客观上要求有很强的企业财产独立性约束和制衡职工收入最大化的企业财产风险责任约束。其三是收入动力机制。这是一种争取本企业职工实际收入最大化的动力机制。改革中的我国企业，这种动力机制目前居优先地位，对企业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它是企业财产具有某种程度独立性，但又缺乏风险性和责任性有力约束的产物。其四是事业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维持自己的地位，争取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它在各种经济体制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些。^②而且，体制类型的不同，形成发展资金的来源也有所区别，产生的后果也不同。其五是营利发展动力机制，它是事业动力机制中，对企业最具压力和动力的一种，它的发展基金仅限于靠营利的自我积累和在完全承担风险责任的情况下借贷或向社会筹集。在我们看来，企业改革应该使它成为企业的主导动力机制。除此之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所有制的不完全性，劳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谋生动机则是一种基本的动力机制。在不同的企业动力结构中，它都处于基础的地位。在大多数状态下，企业经济运行和企业行为，是多种动力机制形成的动力结构系统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成为企业事业上的经营目标，决定着企业的经济运行和行为。

三、企业行为价值判断标准

企业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归结为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判断问题。企业行为价值判断标准，也就归结为企业行为合理化的标准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时期，企业行为的评价标准，都曾有过不同的理论假说，提出过不同的企业行为模式。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自亚当·斯密以来，一向认为企业可以用一套成本收益计划来刻划，企业的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张伯伦和罗宾逊应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边际分析工具作出了新的尝试。在他们的厂商理论中明确指出，应当以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作为企业行为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利润最大化企业行为模式。^③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假说漏掉了许多重要因素。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认为，利润最大化忽略了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和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没有考虑到企业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因此，实用价值较差。他提出，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应该用“有限的合理性原则”和“满意的利润”，来取代利润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行为的假设，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企业）里尤其应如此。^④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他的《厂商行为、价值与增长》一书^⑤中，则提出了一个以在最小利润限额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假设，作为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这一般被认为是寡头垄断下企业行为的典型。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里斯则认为，应以增长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马里斯增长最大化企业

行为模式。他认为，企业为了避免被吞并，求得生存和发展，可能是增长最大化的追求者。在他看来，每个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和帐面价格之间都有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叫做估价率，它的高低反映了企业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帐面价格之间的一致性。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是按照经理的效用函数，以较高的增长率和相应的较低估价率为目标的^⑥。然而，同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在他的著作《随机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⑦中，则倡导应以效用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

在传统体制下，长期以来都是以最大化地完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要求，作为评价企业活动成效的标准。这样，既限制了企业活动的范围和空间，又引致了一系列变异的企业行为。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究竟应选择什么标准来评价企业行为呢？首先，显然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经济理论中评价企业行为的标准，其次，也不能简单地从微观层次上评价企业行为的合理与否。微观层次上的企业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表现为统计规律倾向的企业行为，都有其形成的原因，它总是某种体制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是在赖以生存的微观基础上，适应体制和环境的规则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总是合理的。最后，当我们评价企业行为时，我们所依据的还不应是企业行为的某种规范性要求（如“为社会生产”的要求），而应是这一行为的宏观后果。所以，所谓企业行为是否合理，乃是企业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宏观后果。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

反过来对它的微观基础、所处环境和体制进行评价。

判断企业行为的宏观后果，主要有三项评价标准：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发展。从而，我们认为，合理的企业行为，至少应满足以下三项基本约束：

第一、企业要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目标，即要有一个合理的、以某种动力机制为主导的企业动力结构。从宏观上看，企业的经济目标，除了应实现最大盈利外，还必须有利于宏观的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变动。

第二、企业要有一个合理的行为视野和“透视度”，能够兼顾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合理地使用“替代原理”，不超越合理的替代界限。马歇尔在分析企业行为时，提出了“替代原理”：就生产者 and 经营者的知识、经营能力和需要所及，他们在每一场合都会选用那些最适合、最利于他们的生产要素，所选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替代它们的任何其它一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总和；每当企业发觉情况并不如此，一般来说，总会设法进行调整。^⑧而资源是稀缺的，在这方面使用多了，在其他方面的使用就会减少。在所能支配资源一定条件下，企业不可能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目标。这就有个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合理替代的问题，有个合理地使用“替代原理”、不超越合理的“替代界限”的问题。不仅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在维修与更新之间、在消费与积累之间、在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之间等许多方面，也都有个合理的“替代界限”问题。只有在微观的企业行为上有合理的“替代行为”，在宏观上才能有资源的优化

配置。从而，合理的企业行为应有利于实现宏观上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宏观上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第三、企业要有一个对调节信号的合理反应方式，能够对各种信号作出适度有效的经济反应。也就是说，对应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调节手段，应具有可调节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经济调节机制在企业行为上的可调性，重要的不是企业是否作出反应，而是在于企业的反应是否“适

度”，反应结果能否与调节手段的“调效指标”要求相接近，其误差能否落在“有效误差区域”之内，能否为调节手段实现宏观经济调节目标提供微观基础。譬如，在价格机制调节市场供求时，企业须能够对价格信号作出积极合理的反应，适当地增减对市场的供给或需求；在以货币供应手段调节经济活动总规模时，企业必须能够根据资金供应的变化，作出适度有效的生产经营安排，适当地增减生产经营的规模。

①② 参张少杰：《经济运行与经济调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参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6月版。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 参西蒙：《经济学中的决策理论与行为科学》，《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6月号。

⑤ Baumol, 《Business Behavior, Value and Grow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⑥ 参Marri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Landon, Macmillan, 1964年。

⑦ 参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 Managerial Objectives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world, 1934.

⑧ 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从“拉舍尔”毛毯谈怎样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李澄海

我厂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纺织印染综合性企业。1980年建厂至今，已经向国家奉献了多件丰厚的礼物：广东省第一条晴纶提花毛毯、晴纶簇绒毛毯；中国第一条“拉舍尔”毛毯生产线；中国第一条单层“拉舍尔”毛毯生产线；中国第一条棉型“拉舍尔”毛毯。

1989年产值达3.5亿元，税利3800万元，创汇650万美元，198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0万元，目前全厂有职工2900人，下设6个分厂，总面积9.8万平方米，主要设备410台套，固定资产超亿元。

几年来，我厂在中纺部、国家经委和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厂干部职工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和上级下达的任务，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达到先进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1985—1987年连续被评为广东省先进企业和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主要产品“拉舍尔”毛毯被评为中纺部“三大支柱”创新奖和优质产品奖，1987年获全国最受消费者满意产品奖。1988年8月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和国家二级企业。

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工作的核心，没有经济效益的企业就根本没有生命力。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要在服从国家和服从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在自我不断发展中，自我改造，自我积累，努力争取以较少投入获得更多的盈利，从而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 李澄海是鹤山纺织总厂厂长。198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的光荣称号、广东省劳动模范、全国纺织系统优秀企业家。

一、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开发竞争力强、见效快、效益高的新产品

我厂原是一间“三老二差”（即厂内设备老化、工艺老化、产品老化，经济效益差、竞争力差）的小型机修厂，有职工120人，1980年产值仅33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我们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了4000锭精纺及染整设备，生产膨体晴纶毛线。投产半年即达到设计能力，当年实现产值1500万元，获税利430万元，一年半后便全部偿还了港商的设备投资，使一个陷于绝境的厂起死回生。事实使我们看到：依靠技术进步，开拓新产品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此为转机，我们制定了投产一项，在建两项，规划三项的连绵不断的产品创新决策。1982年，我们看准广东省晴纶提花毛毯仍是空白这个信息，利用第一阶段所引进剩余的设备，补充了国内气流纺织机、簇绒机等设备，采用“填平补齐”的方式，建成了年产15万条晴纶提花毛毯及簇绒毛毯生产线，从而结束了广东省毛毯生产线空白的历史，提花毛毯投放市场后十分畅销，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不久，化纤产品在国际市场出现饱和状态，市场需求量下降，当时厂里有关人员了解到“拉舍尔”经编毛毯在世界上只有西德和日本等少数国家能生产，是毛毯行列中的佼佼者。但鹤山县是一个穷县，一个穷县要生产世界一流产品，困难很大，但我们勇于担风险和压力。决定从日本引进年产40万条“拉舍尔”经编毛毯生产线，1984年4月试产成功，生产出全国第一张“拉舍尔”经编毛毯，质量达到日本同类产品水平，年产值达5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畅销市场。

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市场变幻莫测，产品竞争，价格竞争，信息竞争，

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引进新设备，开拓新产品，企业才能中兴。1984年9月，继续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7200锭羊毛粗纺生产线，第一期2400锭于1985年5月投产，第二期2200锭于1986年10月投产，第三期引进2600锭羊毛粗纺生产线，于1988年2月投产，产值稳定上升，产品畅销市场。1987年引进6台剑杆织机及后整理设备，每年可生产宽幅提花毛毯12万条，创产值约600万元。1987至1988年引进了宽幅“拉舍尔”毛毯印花生产线及后整理加工线和国内购进7台经编机，印花、织造整理的能力翻了一番，促进了出口能力。该生产线与1988年引进的国外及国内12台长毛绒经编机配套，使我厂成为拥有15台长短毛绒经编机、两条印花生产线和后整理加工线，年产超过100万条的“拉舍尔”毛毯生产能力，如果正常投入生产，每年将增加产值9000万元。1988年引进了英国簇绒机，可使簇绒毛毯产量增加30万条，增产值1000万元/年；1988年12月，5000吨/年晴纶毛条生产线也将投产，可得效益8000万元/年，该工程从签合同至投产仅用9个月时间，这是我厂建厂以来最高效率的引进工作。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切实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贤才出，国将昌”。（北宋张载语）作为一个企业，要创造高效率、高效益，首要的条件就是选贤任能，就是“选能而位之，择善而从之”。企业要发展，要适应市场的竞争就要有一个“智囊团”。它内含的智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有管理人才，有工程技术人才，有经营、审计等方面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有科学文化知识，有开拓精神，有善于经营管理的经济头脑的骨干班子。也只有这样，才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跟上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的新形势。过去，那种“事必躬亲”，只强调“身先士卒”而不知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型干部，已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需要了。开放、改革以来，我厂由一个小型的机修厂一跃成为东南亚较大型的毛纺织企业，正是靠大胆地起用了一批有文化、有技术、有管理才干的青年人，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开拓精神。

我厂绝大部分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西德等工业发达国家引进的，还得要靠有技术的人才去消化、吸收和创新。1980年我们得知日本消费

者特别推崇的单层双面起绒“拉舍尔”，但技术输出时，日方拒绝提供此类技术。为了突破这个难关，厂领导和工艺技术人员根据双层起绒的特点，从织物结构和印染工艺上采取一系列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单层“拉舍尔”毛毯，又一次填补国内空白，产品返销日本，使日本和世界纺织界刮目相看。该产品自投放市场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年增产值2300多万元。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市场同行业水平。

1986年10月，我们组织科技人员攻关，研制成棉型“拉舍尔”毛毯，又一次填补国内的空白。这种棉型“拉舍尔”毛毯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良好的性能获得好评。1987年，工艺技术人员还试制出用国产染料代替外国染料，每年为厂节省外汇70多万元。1988年初被视为总厂支柱之一的经编“拉舍尔”印花机发生故障，如等日本派人来修理要等16天，但我厂工程技术人员集思广益，终于用国产元件装配在控制电路上，前后只用了46小时，使10800条“拉舍尔”和9300条簇绒毯按时出厂，为厂挽回经济损失76万元。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要使企业充满活力，就必须生产适销对路的一代产品，试制有前途的一代产品，研制具有时代水平的一代产品，构思未来的一代产品。1988年初，厂工艺技术人员群策群力，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研制成质量较高的宽幅薄型羊毛素毯，填补了广东省的空白，增强了产品的创汇能力，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这一产品荣获广东省优秀产品奖。

我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企业的活力，取决于它的应变能力，它的加快周转的能力和它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的素质。只有依靠各方面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发展、开拓，才能实现经济上的腾飞，归根一句话就是“人才出效益”。

三、从单纯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

企业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应当看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还有企业的应变能力，产品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归结起来就是企业如何由单纯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型转到面向社会、随行就市以销定产、有市场效益的生产经营型的企业。这样，企业一定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

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来提高经济效益。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开发期、成熟期、高峰期和衰落期。因此，企业一定要有战略观念，风险观念，有力战群雄，自立于国内和国际市场之林的能力，把工作重点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加强产品、技术、人才、管理、市场开发工作，把企业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处理好，使企业不断开拓前进。企业要提高效益还必须树立市场观念，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企业要完成自己的经营目标，就必须经常研究市场需要和市场的变化，保证企业产品适销对路并且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市场竞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一项新产品畅销之时，也不能高枕无忧，不思进取。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居安思危，高瞻远瞩”，力求在高水平上保持创新应变、竞争的能力。

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还要增强用户观念。商品生产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实际上是为满足用户的需要，为用户提供最优良的产品和服务，真正将企业办成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社会主义企业。我厂从1980年办厂，当时只有一种产品，但时过一年，竞争十分激烈，投产时可销2.6万元/吨的晴纶纱，到1982年跌到1.6万元/吨，整个厂的经济效益明显降低了。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不进则退。厂方作出应变决策，迅速更新产品，不仅上了全省空白的晴纶提花毯，跟着还上了全国空白的拉舍尔毯、簇绒印花毯等十多个品种，以大量创新产品适应了市场需要。由于品种多、花色好，质量高，而且保证优质服务，使企业的效益大幅度递增。

四、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必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富创造力并且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积极性越高，生产潜力也挖掘越深，随之这个企业的效益就越高。因此，企业必须充分重视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应该懂得如何去引导职工将“自我”价值与企业的目标融为一体，使广大职工树立以厂为家，树立厂荣我荣、厂衰我耻的主人翁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广大职工才能忘我劳动，忘我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我厂一向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将“爱厂、求实、创新、讲效益、讲贡

献”的企业文化精神与工人阶级觉悟、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使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标准。同时，我厂还十分重视改善企业的物质条件，尽可能美化企业的厂容厂貌。企业的工作环境、报酬、生活福利待遇等方面，都应尽力使工人感到宽舒、丰厚、优越、有奔头，在可能条件下尽量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要在完成上缴国家税利和集体改造积累的基础上尽量满足职工的需求。在劳动和分配制度上还实行集体计件工资，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由于平时比较重视职工的生活改善，每年都建三至五幢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职工的子女就业、读书、病痛、婚事，工厂都给以关心和资助。因此，整个厂充满互敬互爱、互助的好风气，广大工人深切地感受到工厂大家庭的幸福和温暖，从而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的干劲，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五、要提高企业效益，还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搞活企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价格体系的改革的深入，市场的需求、国家的调控机制发生了变化，工厂的原材料、设备、辅料、备件及一切的消耗品，价格也大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靠什么来提高效益？只能靠政策，靠企业自身的经营机制的改革，把竞争机制引入到企业管理中，向管理要效益，实行全面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我厂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整个产品成本1988与1987年同期对比，升幅估计在30%以上。然而，我厂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是6%的升幅，而整个厂的税利却要比上年递增25.7%。面对这样的经济收支差额，我厂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坚持集体计件工资的基础上，实行全厂六大经济指标的层层承包，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个人对班组进行承包，班组对车间承包，车间对分厂承包，分厂对总厂承包；全厂实行经济效益与税利挂钩，总厂牵头与财政承包，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保。此外，各分厂均加强对车间管理，分别开展创建双文明班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合理化建议、岗位操作练兵、QC等活动，坚持抓好质量管理和设备管理，各班组内部还采取多种多样承包责任制，大胆改进工艺流程，逐步采用国产原料，把

发掘生产能力落实到每个机台，从而使全厂由上到下出现一个新的好势头，职工们积极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高产、优质、低耗、生产挖潜的活动，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持续发展的后劲和更大的活力。

目前，我厂已拥有1.2万锭精纺、7200锭粗纺、200头气流纺设备和晴纶或羊毛提花、簇绒印

花、拉舍尔三条毛毯生产线。最近，市场出现疲软，我们通过合理调整产品结构，抓质量，降消耗，使产品价格降中呈稳，1989年销售超3亿元，比去年净增一亿元。

作者单位：鹤山纺织总厂

责任编辑：石成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

周凤章

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第一五〇——一五一页记载了李白天宝十三年春夏之间的交游事迹，谓“李白本年五十四岁。春游金陵，与江宁令杨利物同游玄武湖，有诗纪之。五月到扬州，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

这段记载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

首先，李白“五月到扬州，与魏万相遇”，就是明显错误的。熊氏只抓住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五月造我语”一句认定是年五月是魏万初访李白的的时间，并推论李白“五月到扬州”。其实，这里“五月”犹言数月，王琦说：“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佻儻人’是其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王琦《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下注)是正确的。由于此诗未能提供答案，应该再读一读当事人魏万赠李白诗，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对此说得十分确定：“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参证李白赠诗之小序，所转述魏万行踪正与相合。由此判断，李白并非“五月到扬州”，而是春天已在扬州，并于此时与魏万相遇的。

其次，李白也不是先会见杨利物而后与魏万相遇的，而是恰恰相反。关于这一点，只消把李白此期间写给魏、杨的诗文放在一起阅读即可找出答案。《李太白全集》共录赠魏诗1首，赠杨诗3首、赞1篇，这些诗文的时间线索清晰可见：《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曰：“回桡楚江滨，挥策扬子津……吾友杨子云，弦歌播清芬。虽为江宁宰，好与山公群。乘兴但一往，且知我爱君”是说李白与魏万广陵相遇后不久，就接到了故人江宁令杨利物寄给他的诗，向他表示了相邀的美意(“弦歌播清芬”)，于是携魏万前往。接着，《新林浦阻风寄友人》(一本作《金陵阻风雪书怀寄杨江宁》)则曰：“潮水定可信，天风难与期。清晨西北转，薄暮东南吹。以此难挂席，佳期益可思”，是说舟行至新林浦，天不作美，滞留半道，未能如期赴约。一本又有“使索金陵书，又叨贤宰知。弦歌止过客，惠化闻京师”四句，可见李白耽擱于路途的原因，杨很快就知道了，并派人专程持书赴金陵，候门等待李白的答复。后来，李白终于到达江宁，杨在北湖(即今玄武湖)设宴洗尘，李白这才写了《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同时作有《江宁杨利物画赞》。此间李白来往于金陵、江宁两地，直到夏末秋初之际才离开，写下了《宿白雉州寄杨江宁》作别。

量本利分析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

陈 庚

量本利(CVP)分析,是当代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意味着现代管理科学对会计系统的渗透。量本利分析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实践中,以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技术为基础,从传统的财务会计中分离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它对传统财务会计所收集、整理的有关数据进行改造,立足于为企业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对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它通过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进行科学处理,对生产经营各方面可供采取的有关方案和可能取得的经济效果,事先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比较,以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作出正确的判断,选取最优方案。显然,以量本利分析为中心内容的管理会计,实际上是一种会计与管理的结合,它比传统的财务会计履行着更为广泛的职能。

量本利分析产生、形成和发展于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它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已广泛应用。1988年,我们把量本利分析应用于广东省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的会计管理实践,利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和技术指导该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努力为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该厂之所以能在1988年一年内扭转连续6年严重亏损的局面,与利用量本利分析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是分不开的。

量本利即产量、成本和利润。量本利分析的基本点就是揭示产量、成本、利润之间的依存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测定影响企业经营效果的各种主要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相关程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以求得最优方案,从而为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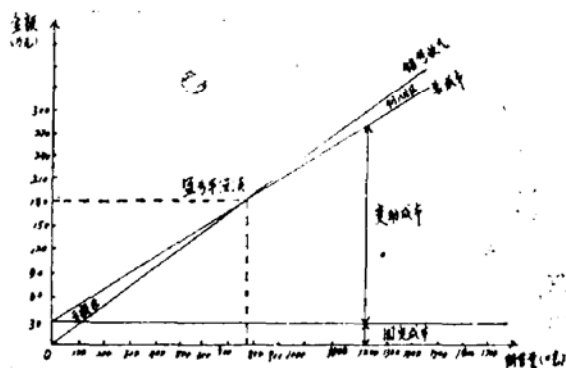
产量和成本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利润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利润看成是产量和成本的函数,也就是 $F(P) = (C, V)$ 。问题是,产量的变化、成本的变化以及产量和成本的综合变化对利润的影响到底是在什么条件下,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起作用的呢?它们之间能否建立一个确定的模型?量本利分析正是以这一系列问题为出发点,对传统财务会计的成本概念进行改造,赋予其以新的涵义。我们知道,传统的财务会计对产品成本的分类方法,是将成本按三个主要项目,即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和间接费用(或制造费用)进行归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其他分类的基础。它可以反映产品成本的构成,便于成本考核以及分析成本升降的原因,但却无从揭示产量、成本和利润的动态联系,无法进行定量分析。量本利分析着重从成本的性态(特性)的角度认识成本,也就是考察成本的变化与产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研究成本对产量的依存性,进行成本性态的分析,从量上具体掌握成本与产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为此,它把在一定的产(销)量范围内,其总额不随产(销)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费用称为固定成本,固定成本总额对产量而言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单位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却是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呈反向变化,在固定成本总额不变的前提下,产量越大,则单位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越小,反之则越大。同时,量本利分析把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其总额随产(销)量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化的生产费用称为变动成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产量越高,则变动成本总额也越大,反之则越小;另一方面,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则是相对固定的,不直接受产量的影响。此外,量本利分析还把一些属于部分变动、部分固定的混合成本称为半变动成本。这类成本,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随着产量

的变动而成比例地变动，而是一种既固定又变动的成本，它往往有一个初始量，类似固定成本；在这个初始量的基础上，产量增加了，成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随之增加，因而又类似于变动成本。通过把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半变动成本，并通过一些数学方法（如极差法、回归分析法等）把半变动成本（混合成本）分解归结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这样，产量、成本和利润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便被勾勒出来了。在这一基础上，给出产量、成本、利润三者关系的数学模型，即可为生产经营管理寻求最优决策方案。

量本利分析的基本模式是盈亏平衡点（或称保本点、盈亏临界点）模型，它是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来源于这一模型的建立和求解，这一模型还涉及产品销售单价、销售收入等因素。在这一模型中，边际利润（或称边际贡献）和单位边际利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边际利润所指的，是产品销售收入与变动成本之间的差额，即 $\text{边际利润} = \text{产品销售收入} - \text{变动成本（总额）} = \text{销售单位} \times \text{销售量（产销相符时的产量）} - \text{变动成本（总额）}$ ；而单位边际利润则是指产品销售单价和单位变动成本的差额，即 $\text{单位边际利润} = \text{产品销售单价} - \text{单位变动成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若产品销售单价高于单位变动成本，则 $\text{单位边际利润} = \text{销售单价} - \text{单位变动成本} > 0$ ，表明产品销售单价（或销售收入）除了可以补偿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或变动成本总额）外，尚有一部分可以继续补偿固定成本。如果这一部分不足以完全补偿固定成本，即 $\text{销售收入} < \text{变动成本} + \text{固定成本}$ ，或 $\text{销售收入} - \text{变动成本} < \text{固定成本}$ ，也就是产品的销售收入比产品的全部成本还要低时，企业就出现亏损；当边际利润刚好可以全部补偿固定成本，即 $\text{边际利润} = \text{固定成本}$ ，或 $\text{边际利润} - \text{固定成本} = 0$ ，也就是销售收入与产品全部成本相等时，企业利润 = 0，企业处于不盈不亏状况；当 $\text{边际利润} > \text{固定成本}$ ，即 $\text{边际利润} - \text{固定成本} > 0$ ，也就是销售收入大于产品全部成本时，企业就出现盈利。很明显，企业利润是产品销售收入（在销售单价不变时为销售量，在产销相符时也为产量）的函数。量本利分析的全部焦点就在于揭示当企业利润 = 0 时的销售收入（或销售量，产量），从量上确定当销售收入（销售量、产量）处于什么值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亏损，或盈利。也就是确定受产（销）

量影响的企业生产经营的盈亏临界点。

利用盈亏平衡点模型，可以使企业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通过对产品销售量（产量）和成本相互关系的分析，明确企业的经营效果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知道企业怎样会出现亏损，而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盈利，从而确定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应采取的措施。在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我们通过利用盈亏平衡点模型对其生产经营状况进行分析。1988年上半年，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的有关生产经营指标是：全厂总产量1200吨，平均销售单价为2500元/吨，全部商品产品总成本280万元，其中固定成本30万元。据此，我们会出该厂上半年的盈亏平衡点图：



该厂1988年上半年的总成本为280万元，固定成本30万元，则 $\text{变动成本} = \text{总成本} - \text{固定成本} = 280 - 30 = 250$ 万元，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 \frac{\text{变动成本总额}}{\text{总产量（销量）}} = \frac{250 \text{ 万元}}{1200 \text{ 吨}} = 0.2083$ 万元/吨，单位边际利润 = 产品销售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2500 - 2083 = 417$ (元/吨)。如上图，则盈亏平衡点时的产量（销售量）

$= \frac{\text{固定成本}}{\text{销售单价} - \text{单位变动成本}} = \frac{\text{固定成本}}{\text{单位边际利润}} = \frac{300000}{417} = 719$ 吨，即当该厂的产（销）量为719吨时，企业利润 = 0，企业处于保本状况；当产（销）量 < 719吨时，企业出现亏损；当产（销）量 > 719吨时，企业出现盈利。而且，产（销）量越大，则利润越高。

从上述盈亏平衡点模型中，企业管理部门和

管理人员得以明白，下半年的经营目标是不断拓展市场，尽一切努力提高产品销售量，以求得最大的利润。因为现有产（销）量远远小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容量，为此，企业作出的决策是：供销人员加强产品推销工作，下半年实现销售量（产量）2000吨，实现销售收入500万元；在控制产品单位变动成本不得超过上半年水平的同时，竭力把全厂的固定费用控制在35万元以下。根据上述决策，我们根据量本利分析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分析、预测下半年的经营效果；假定下半年的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同上半年，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固定成本为35万元，则：

目标利润 = 目标销售量 × (销售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固定费用 = 2000 × (2500 - 2083) - 350000 = 484000元。

量本利分析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不仅可以从整体上评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从宏观上把握企业的现实状况和经营目标。同时，也可以在局部的、具体的经营行为中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并有助于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将企业的总体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对象上，使各部门、各车间或是各品种的目标协调配合，以最大限度获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整体效果。

在对亏损产品的处理问题上，我们应用量本利分析，将亏损产品以及与之有关的产品数据资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建立数学模型，求得最优解答，避免了因直观对待问题可能造成的决策失误。

在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葱油美味饼干亏本似乎是众人公认的事实，不少人主张应予淘汰，立即停止生产，以减少亏损。为此，我们收集整理了有关数据，并按量本利分析的模型进行改造如下：

饼干车间现生产红梅、菠萝蛋、葱油美味、苏打四个主要品种饼干，其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现有产（销）量、市场容量为：

品种	销售单价 (元/吨)	单位变动 成本(元 /吨)	现有产 (销)量 (吨)	市场容量 (吨)
红梅	3000	2600	500	500
菠萝蛋	3600	3100	200	200
葱油美味	3400	3250	200	500
苏打	3400	3100	100	100

现有产（销）量远远小于该车间的生产能力，而饼干车间分摊的全厂固定成本为20万元。显然，按现有产（销）量所实现的销售收入，各品种应分摊的固定成本为：

红梅饼干共92592元，每吨185元

菠萝蛋饼干共44444元，每吨222元

葱油美味饼干共42000元，每吨210元

苏打饼干共21000元，每吨210元

各产品的单位利润为产品销售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单位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

红梅饼干 $3000 - (2600 + 185) = 215$ 元/吨 > 0

菠萝蛋饼干 $3600 - (3100 + 222)$

$= 278$ 元/吨 > 0

葱油美味饼干 $3400 - (3250 + 210)$

$= -60$ 元/吨 < 0

苏打饼干 $3400 - (3250 + 210) = 90$ 元/吨 > 0

显然，葱油美味饼干为亏损产品，每吨亏损60元，按现有产（销）量计共亏损 $60 \times 200 = 12000$ 元。如果单纯地从这一点出发直观地看问题，就会错误地认为，葱油美味饼干产（销）量越大，则亏损越大；产（销）量越小，则亏损也就越小，而停止生产，就不会出现亏损。从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出发，无疑会作出淘汰该品种的错误决策。但是，从量本利的角度看，各品种的单位边际利润为：

红梅饼干 $3000 - 2600 = 400$ 元/吨

菠萝蛋饼干 $3600 - 3100 = 500$ 元/吨

葱油美味饼干 $3400 - 3250 = 150$ 元/吨

苏打饼干 $3400 - 3100 = 300$ 元/吨

尽管葱油美味饼干的单位边际利润较其他三个品种小，但它毕竟为150元，仍然是正数。虽然它不足以完全补偿单位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但毕竟起了补偿作用。按现有产（销）量，该品种提供的边际利润为 $150 \times 200 = 30000$ 元，若停止该品种的生产，则上述边际利润无法实现，而该品种按现有产（销）量所分摊的42000元固定成本无从补偿，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品种上，引起其他品种固定成本负担的加重，甚至导致亏损。因此，停止该产品的生产，不但不能避免所谓的12000元亏损，而且会带来42000元的更大亏损。

相反，在其他品种的市场容量已趋向极限，而该品种的市场潜力和生产能力潜力还很大的情况下，应该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当该产品的产

(销)量 = $\frac{\text{固定费用}}{\text{单位边际利润}} = \frac{42000}{150} = 280$ 吨时，虚

亏就会变成保本；当产（销）量超过280吨时，就会出现盈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依据，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才是真正可靠的。

根据量本利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新产品开发及其所涉及的产品定价、市场投放量和目标利润的分析和预测，同样可以使我们在众多方案中作出最佳选择。1989年，该厂作出开发豆奶项目的决策。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上已经有几个厂家的同类产品激烈角逐，其出厂价从每瓶0.38元到0.40元不等。根据供销部门的市场调查，只要本厂的豆奶质量不比市场上现有产品差，那么，在不同的价格下，本厂的产品就可以不同程度地占有市场。当每瓶豆奶定价为0.40元时，月可销售60万瓶；价为0.39元时，可销85万瓶；价为0.38元时，可销90万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制订何种价格，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呢？

根据试产过程中获得的资料，豆奶车间所分摊的固定成本为50000元，每瓶豆奶的单位变动成本为0.30元，因此，三种价格方案的目标利润分别为：

方案一：目标利润 = 目标销售量 × (销售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固定成本 = 600000 × (0.40 - 0.30) - 50000 = 10000元；

方案二：目标利润 = 850000 × (0.39 - 0.30) - 50000 = 26500元；

方案三：目标利润 = 900000 × (0.38 - 0.30) - 50000 = 22000元。

在上述三个方案中，显然，方案二的目标利润为最大，为此，该厂将新投放市场的豆奶定价为0.39元/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量本利分析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随着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和外部市场竞争条件的不断变化，愈益重要。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在于经营，而经营的成败则在于决策，量本利分析无疑是经营决策科学化的基本手段，它的推广和应用，对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决策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
责任编辑：黄振荣

書海酌量

《全唐诗典故辞典》正误一例

熊清元

《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775页，“刘桢沈痼（刘桢病）”条。所注〔出典〕云：“《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粲与……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干清玄体道，六行备修，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

按，注误。《魏书·王粲传》所云“干”者，指徐干，非刘桢公干。原文前半传王粲，接着交待王粲与徐、陈、阮、应、刘五人“并见友善”，以为过渡。下面依次介绍说，“干”如何，“琳”如何，“瑀”如何，“瑒、桢”如何。五人均称其名，所以“干”，一定是指徐干，不可能是刘桢。退一步说，即使以字称刘桢，亦当称“公干”而不当称“干”。弄明白了这一点，裴松之引注之《先贤行状》同样是指徐干，不是指刘桢，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因有此一误，其〔释义〕一项亦随之有误。〔释义〕云：“刘桢字公干，曾任曹操属吏，有文才，曾因患病不能就任新职。后因用作卧病的典故。”据现有材料，刘桢并无“因患病不能就任新职”之事。《文选》卷二十三载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是唯一言及刘桢病的文字，但也只言其卧病漳滨，不能随曹丕出征的悲伤。

实际上，“刘桢沈痼”条是应与368页“公干病”条合并的。“刘桢沈痼”之“沈痼”即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二：“余婴沈痼疾”之“沈痼”。“刘桢沈痼”即是“公干病”。此《辞典》在“公干病”条引刘桢此诗以为出典，而在“刘桢沈痼”条反而不以之为出典，应属疏误。

编者按：下面两篇文章，均谈林业建设问题，有调查，有分析，有新的科学眼光，对人们或许有启发。我们希望今后多发点这样的文章，少来点闭门造车的宏论，使国情研究真正做到符合国情。

谈林业如何走上新台阶

——韶关市的基本目标

冯灼锋 陈光

林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观念上要跳出单一的木材生产的框框，树立新的林业效益观。林业的效益是多重的。从层次上分，有直接效益、间接效益、边际效益。从效益类型上分，主要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荒山基本消灭之后，林业要上新台阶，就必须用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培育出高质量的森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以其丰富的木材和林产品推动着经济的向前发展。这后一点，对韶关市意义更为重大。韶关是多山地区，全市宜林山地达209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5%，可以说，韶关经济的发展不但要靠工业，而且要靠林业。为此，我们设想，林业上新台阶，可以确立如下四个基本目标，这就是：林相林种树种结构科学化，林业生产基地化，林业经营商品化和林政管理法规化。

一、林相林种树种结构科学化

林相，是森林的外貌。林种树种，是森林树木的种类。林相林种树种结构的科学化，要求不同种类的森林树木，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均匀的分布，从而构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呈现出层次丰富、生机勃勃的林相，产生较好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我市林业生产实际上走过一条违背客观自然规律的非科学化的道路，致使林相恶化，林种树种结构严重失衡。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阔叶林（包括阔针混交林，下同）大幅度减少，纯针叶林占林分总面积的比例高达61.3%；在未成林的新造林中，针叶林的比例更高达90%。二是天然林大幅度减少，目前天然林仅占有林面积的37%。三是用材林片面发展，其他各林种的总和占森林的比例仅20%左右。失衡的林相林种，大大降低了森林的生态保护功能。在南雄县，水土流失面积达38.2万亩。每年被冲走泥沙达282万吨。该县河流年径流量亦从50年代的57.35立方米/秒减少到60年代以后的43立方米/秒。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也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下降。许多珍贵的经济动物数量锐减，有的濒临灭绝。50、60年代，韶关地区每年尚能收购黄獐皮6万多张，杂狸皮10万张，穿山甲鳞片100担以上，现在这些东西已十分罕见。许多中药材的收购量也大幅度减少。尤其严重的是，森林遭受破坏还造成了地力下降，水、旱灾

害濒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事实，即近几年林业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的生态有了好转。以武江河为例，该河80年代后期（1986~1988）的平均年径流量已达49亿立方米，接近了50年代后期（1956~1958）的水平（平均52亿立方米）。尤为可喜的是，该河枯水期的月最小平均流量增加了34.6%，从23.1立方米/秒增加到31.1立方米/秒；而洪水期的最大平均流量则减少了35.2%，从428.3立方米/秒减少到406立方米/秒，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对农业的危害。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林相林种树种结构科学化，才能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为此，必须针对我市森林的缺陷，调整好三个重大的比例关系：

一是阔叶林和针叶林的比例关系。阔叶林树种繁多，呈多层林相结构，具有最佳生态功能。据测定，阔叶林平均每亩蓄水量可达240立方米，比针叶林高一倍。42万亩阔叶林蓄水就相当于一个库容1亿立方的大型水库。阔叶林营养元素归还率为针叶林的17.9倍，能有效地提高地力。阔叶林虫灾少，火灾少，又是飞禽走兽生息繁殖的良好场所。因此，要恢复阔叶林在我市森林中的主体地位，使所占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60%以上。

二是天然林和人工林的比例关系。这是与上个问题相联系的问题。因为天然林是天然起源的林分，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我市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条件下，森林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终将形成常绿阔叶林。人工林是人工起源的林分，是人工选择的结晶。由于长期以来造林以取得木

材为主要目标，因此人工林实际上成了用材林、针叶林。它能直接满足人们对木材的需要，具有生长快、价值高的特点，但林相和功能都无法与天然林相比，而且还要花费较大的投资。因此，通过扩大天然林来提高阔叶林在森林中的比例，无疑是一条花工少、投资省的路子。这里的关键是人工林要从过去广种薄收式的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式的集约经营转变，极大地提高人工林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为社会提供木材等林产品的人工林的面积就可以大大缩减，多数的山林（包括过去营造的相当部分的人工林）就有可能作为起防护作用的天然林长期全封起来，实行只封不砍（或弱度择伐）的方针，逐步形成天然林自然生态系统为主的与人工林人工生态系统相容互补的新格局。具体来说，人工林应该选择较好条件的一、二类立地营造成速生丰产林，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木材和其它林产品的需求。全市宜林地中这两类立地约占1/3（700万亩左右），其余2/3都可以调整为主要起生态保护作用的天然林。

三是人工林内部的比例关系。主要纠正长期形成的用材林单一发展的畸形结构。直至近几年，这方面情况仍是相当严重的。仅以1987年为例，该年造林种果117.89万亩。其中用材林91.55万亩，占82.8%，而经济林（含水果、茶叶等）仅26.34万亩，占17.2%。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今后应大力营造经济林，发展果品、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的生产。我们设想，这一调整的远期目标，经济林在人工林中的比例，以提高到50%左右为宜。即经济林与用材林均为350万亩左右的规模。如果经济林的平均亩产值达到

1000元,总产值就是35亿元。另一半350万亩的速生丰产用材林,长成后实行有计划的周期轮伐(以20年为一个轮伐期),每年可生产相当于现在四倍多的规格材,即245万立方米(按年生产长量1立方米,出材率0.7计算),以每方500元计算,也价值12.25亿元。

二、林业生产基地化

建立林业生产基地的目的,就是将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组织成集中的大规模的生产,实现规模效益,从而大大提高林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山地产出率。

林业生产基地化,并不要求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林产品都建立生产基地,因为必定有些拾遗补缺的小量零星产品要采取分散生产的形式;但对于主要的大宗的林产品,则必须通过生产基地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计划化、规模化、高效化,使基地生产成为林业生产的主体。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对我市始兴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的框算,基地化生产的规模效益是非常显著的。该基地规划建成年限20年,总投资0.78亿元,总产值可达18.94亿元,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为12.24亿元,总纯利润达6.73亿元。平均每公顷每年实现纯利1121元,而每公顷的总投资只2600元,平均每年仅130元;与工业性投资相比,效益并不差。

目前,我市林业生产基地化建设尚比较落后。有的名曰基地,诸如多少多少万亩的松香基地、毛竹基地、水果基地,等等,实际上是同类生产面积的简单相加,并没有多少具体内容。这样的“基地”,尽管面积较大,也仍然是分散的小生产,不可能起到对生产的集中作用,当然也就无法产生

规模效益。我们讲的生产基地,应当是一种生产集中化的经营形式。基地内部各生产点之间是有机的联合或结合,并形成最佳效益的生产经营规模。基地执行统一的生产计划,统一提供各种服务,如资金服务、技术服务、销售服务等等。这就比分散的小生产更有利于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产品市场的开拓,有效地降低管理费用和生产成本,取得规模效益。在我市林业生产基地化的过程中,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选准基地产品。我国是森林贫乏国家,木材严重短缺。据统计,目前全国人均木材消费量仅0.05立方米,相当于苏联的1/8,日本的1/20,美国的1/30。预测全国到2000年的木材需要量将达2.67亿立方米,而产量最多只能达到2.11亿立方米,缺口5600万立方米。因此,加速和扩大木材的生产仍然是我们林业基地建设的重点和基础。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单一出卖原木的状况,要通过办基地来促加工,建立一批与本市工业配套的优质家具用材基地、造纸用材基地、三板(刨花板、胶合板、纤维板)用材基地。原木生产也要适应市场需求,建立一批长大材基地。

与此同时,要大办经济林基地。经济林产品种类繁多,市场需求复杂,变化大,要立足于建立本地特色,把那些市场需求大,有发展潜力又独具特色的品种列入基地建设。这样突出特点,更有利于创造名牌,提高竞争力。目前,这方面的问题较多。如水果,全市40多万亩水果中,柑桔橙占了七成以上,且基本上没有名优品种,体现不出粤北山区的特点和优势。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多

的经验，今后还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总之要在形成自己特色方面下功夫。

2. 搞好区域分工。由于各地条件的差异，不但社会经济条件有差异，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差异，如南部的新丰县就比北部的乐昌县年平均气温高 0.7°C ，降雨量多400毫米；西部的乳源平均海拔比中部的曲江县高150至500米，因此，基地建设只有根据不同区域进行合理的分工，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各县如能根据本地特点，集中发展一两个优势项目，已很可观。

3. 坚持适度规模。生产基地要有规模，但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超过了市场容量，产品就没有销路；规模超过了财力许可，就不可能实行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经营；过大的经营规模，还往往会增加管理费用，导致效益下降。因此，林业生产基地的建设，规模要适度。要把能否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单位产品成本最低）作为规模是否适当的标准。那种不顾成本，只图形式的作法，必须坚决杜绝。

生产基地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单一种植基地要逐步向种植加工一条龙，林工商一体化的综合生产基地过渡。或依厂建林，或依林建厂，或通过各种横向联合形式将空间上分隔的林业基地与加工企业联结起来。加工企业从实现利润中提取一部分支持林业基地的建设；而林业基地又严格按照加工需要，安排林业生产的品种、数量、规格，为加工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优质原材料，从而把林业生产基地建设提高到新的阶段。

三、林业经营商品化

林业经营商品化的目标，是要创造更

高的经济效益。为此要在林业经营中树立起竞争的观念、效率的观念、盈利的观念，努力把更多的林产品转化为商品，把低值的商品转化为高值的商品。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乱砍滥伐？我们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商品经济。我们搞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竞争是计划指导下的竞争，盈利是法律约束下的盈利，因此，它与乱砍滥伐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效益高了，就可以少砍树，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森林，维护生态平衡。

当前，我市林业经营的商品化程度很低，突出表现为粗放经营和单一木材经营的格局。粗放经营，造成了山地产出率极低，去年全市平均山地亩产值（包括木材、水果、茶叶等）仅5.81元，相当于零点零几方木材或十多斤柑桔的价值。而单一经营则形成加工业严重滞后的状况。据统计，1987年，我市竹材木材采运业产值0.4亿元，占全省的38.5%，而木材加工业及竹藤棕草制品业产值仅0.17亿元，占全省的3.9%；家具制造业产值0.3亿元，仅占全省的3.8%；造纸及纸制品业0.41亿元，仅占全省的3%。其他林副产品加工业的情况，同样十分落后，全市没有一间较大型的现代化果品加工厂。结果，本市生产的大量果品要远销到佛山、广州、湖南、江西等地加工。仅南雄县一个小小的界址乡，前年销到江西省的半成品李坯，就达34吨。这样经营林业，不可能创造出高的经济效益，为此，就必须促进经营的商品化，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单一经营为多种经营。为此必须认真抓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1. 开展综合利用。

首先，在进入工业加工之前，就应考虑综合利用。比如山花多的地方，可以发展养蜂，采集蜂蜜和花粉，发展营养食品。有些树木，具有多种用途，如黑荆，树干是优良的薪炭及造纸用材，树皮又是优质的拷胶原料（含单宁高达42.8—49.6%）；松树树干是很好的木材，松脂又是宝贵的化工原料，搞综合利用，一亩松树长大后先割上十年松脂再砍伐木材，比单纯砍伐木材可增值5000多元。林产品在进入加工之后，综合利用更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因此，木材和林副产品的加工，特别是深度加工，应该成为综合利用的重点。我们恰恰在这方面重视不够。目前我市食品、饮料工业，林产化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木材加工虽然引进了先进设备新办了刨花板、胶合板、纤维板等现代化企业，使单一出卖原木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大量木材采伐和加工后的剩余物、废弃物也得到了利用，但后续产品的加工配套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一个大有潜力而极待研究的课题。总之，只有在加工业上有新的突破，林业的经济效益才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创造名优产品。我市林产品尽管种类繁多，但真正在市场上叫得响，影响大的名优产品并不多。即如质优价昂的白毛尖茶，在全国茶叶家族中仍排不上号；北江香菇历史上很有名气，但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却呈下降趋势；三华李、南华李50年代还在香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60年代以来，已被美国、泰国、台湾产品挤出市场；柑桔橙是我市水果的主体，占全市水果总面积的62%，但能出口的名优品种却拿不出来。因此，创造名

优产品，已经是林业经营能否商品化的一个关键。

创造名优产品，根本出路在于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使产品质量真正达到“优”的标准。但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不能忽视宣传的作用。优质产品要出名，还要靠宣传。不宣传，质量再好，鲜为人知，同样不能迅速打开市场，形成拳头。因此，有商品经济头脑的人，都十分重视产品的宣传，将它作为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应该看到，珠江三角洲许多产品的销售量之所以能急剧增长，除产品本身的质量好外，不能不归功于他们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有效的宣传活动。如果我们既改进了技术，又重视了宣传，那么，名优产品的创造，将不是办不到的。

3. 开拓新的商品生产资源。就是对一部分经济价值高而市场需求量又大的野生资源，通过人工选择和培育，成为新的可大规模生产的商品资源。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华猕猴桃值得我市高度重视。猕猴桃目前在香港以及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很风行，消费量日增。无论在街头果摊还是超级市场，都可以看到有猕猴桃出售。仅以联邦德国为例，人口不到6000万，1988年进口猕猴桃价值达2.21亿马克，比上年增长了19%。猕猴桃营养丰富，含维生素C十倍于柑桔，国际市场上售价昂贵。在香港，每个（100—120克）6港元；在联邦德国，每个0.3—0.4马克。十几年来全世界猕猴桃生产发展迅速。到1984年，美、日、意、法、新西兰等九个主要生产国种植面积已达2.35万公顷（折合35.23万亩），总产达8000万公斤。我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国，然

而许多人对这种大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水果还一无所知，人工栽培猕猴桃还是近10年的事，发展较慢。目前仅达4万亩，年产200多万公斤，但已显示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从1986年起，钓鱼台国宾馆已用国产猕猴桃代替了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湖北、陕西的鲜果在新加坡、香港也很畅销。我市猕猴桃资源丰富，发展猕猴桃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交通、出口条件比内地更为有利。我市乐昌县于1985年开始试验人工培植猕猴桃，并获成功。有的株产高达80斤，以此计算，亩产可达3000多斤。其选育出的“大源一号”品质全省第一，维生素C含量已超过猕猴桃王国新西兰的王牌品种“海沃德”。我们要抓住时机，发挥优势，加快猕猴桃开发和商品化生产的步伐。还有一种植物栀子，是常用中药。现我市利民制药厂已能够从中提取分离出纯度极高的 α -藏花素，制成天然黄色素产品。由于它对人体无任何毒害，因而将逐步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化学食物色素。尽管目前栀子色素因成本过高，价格太贵，在国际市场尚未打开的情况下，生产发展仍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它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应该继续进行研究。总之，开拓新的商品生产资源是大胆的创新，我们很有可能从这里找到独具特色的林业经济发展的新路。

4. 发展外向型林业经济。京广铁路将我市与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联结起来，因此，发展外向型的林业经济，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发展林业出口生产，路子是很多的，关键首先要树立信心，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翁源县铁龙林场利用本地劳力和资源，引进外地技术，发展藤

竹工艺品编织业，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年产值37万元，创汇10万美元。铁龙勇于开拓外贸市场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发展林业外向型经济过程中，要坚持多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坚持高、中、低档产品一齐上。要积极发展高档商品的生产，同时也不放弃中、低档商品的市场。特别是在那些基础较为薄弱的乡镇，只能从中、低档起步，逐步向高档发展。力争到本世纪末，使我市林产品创汇在全市创汇总额中的比重，从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5%以上。

四、林政管理法规化

林政管理法规化，即是要把整个林业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实行以法治林。

(一) 严格贯彻执行《森林法》。《森林法》是保护森林的根本大法，是管理法规化的核心。要把《森林法》贯彻落实到林业工作的各个方面，使《森林法》的原则和精神深入人心，人人爱林护林，一切损林毁林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惩处。为此，还应该根据不同林种的特点，制订出一些更加具体的管理条例。如用材林与防护林，中幼林与成熟林，全封山的林与半封山的林，松林与杉林，药材林与水果林等，都应该有些特殊的管理条例和措施。乡规民约是农民自立的“法规”，由于它与当地群众的文化习俗、思想水平相适应，因而也具有极大的约束力，起着其他法规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法规化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把《森林法》落实到每一个村、组。

(二) 实行指令性的林业生产计划。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经验表明，在我国木材资源严重短

缺的条件下，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乱砍滥伐往往更容易发生。因此，必须从总体上把林业生产纳入全面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并从法律上加以保证。即要对林业计划立法，使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历届政府都必须依法执行。使不但林业的社会效益按计划实现，林业的经济效益也要按计划实现；每年育多少苗，种多少树，砍多少木，加工什么产品都严格按计划执行，绝对保证林业资源的消耗量和生长量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

（三）林业政策要法规化。林业开发

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政策必须长期稳定。为保证做到这点，必须将政策与立法结合，一些基本政策可以交付人大，以法规、条例形式颁布，使历届政府都要执行，避免政府行为的短期化。

（四）强化护林专业队伍，以适应管理法规化的要求，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这支队伍，包括在人数上、素质上、装备上进一步加强和优化。

作者单位：中共韶关市委

责任编辑：石成

建设“生态林业县”

——始兴县的实践与设想

罗继胜

始兴县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林业用地254万亩，占全县土地的78.4%。到目前为止，有林地面积214.7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7.3%。1989年，一些教授、专家、学者考察和研究了始兴的林业现状后，提出了“建设始兴生态林业县”的构想；从1990年起，用20年时间，全县林业建设要达到初级阶段生态林业县的标准。即通过对现有森林调整改造，发展林产工业，优化自然环境，使森林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林业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

这一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始兴林业建设将向生态化、集约化、基地化、高效化发展，成为始兴始兴的基本道路。为此，必须做到“二个转变，三个突破”：

（一）在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转变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的观念，把建设“生态林业”作为今后长期的指导思想。

林业是维系陆地生态平衡的主体。培育和保护好森林资源，对保护和提高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关系重大。同时，林木又是经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在进入商品流通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森林这种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于一身的优点，是大农业中其它种植业所没有的。而且就其两者比较，生态效益远远高于经济效益。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抓林业建设时，指导思想上忽视了生态效益，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树种结构和林种结构，使整个林业建设存在着几重几轻的现象：即是重砍轻造，重用材林轻其它林，在用

材林中又重针叶林轻阔叶林，重砍树卖木轻综合利用。出现了一是针、阔叶林分布不均匀，在部分乡（镇）尤为突出。始兴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按自然规律应以阔叶林为主。就全县总体来说，阔、针叶林比例较为合理，目前达到1：0.91。但分布不够平衡，在一些乡（镇）比例严重失调。二是林种结构比例失调。全县用材林面积占81%，防护林占15%，其它经济林、特种用途林、薪炭林合起来只有4%。三是综合开发、加工能力弱，整个林业产值只有3851万元。只占全县工农业产值的11.4%。前年全县亩平山地产出只有30多元。四是中幼林增多。据1988年统计，全县中幼林面积就有157.4万亩，占成林面积的81.9%，由于中幼林多，亩平蓄积只有4.34m³。全县虽然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都名列全省前茅，但整个生态环境改善不够显著。县内几条河流仍没有恢复解放初期的流量，旱、涝、风、山火等灾害时有发生。近几年松毛虫、竹蝗为害甚烈，水土流失在部分乡（镇）尚未根治等等。

（二）转变林业的经营方式。长期以来，全县林业建设的模式是围绕抓用材林为中心，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绝大部分林地都作为用材林基地来建设。这种做法，致使全县绝大部分山地处于超负荷使用中，造成严重的林种比例失调。

要使始兴的林业经营有新的发展，必须对整个林业进行重新分工和调整好林种结构，并要采取集约经营的手段，扩大速生丰产林。具体应从如下方面入手：首先是将现有森林资源重新规划成三大块，即商品林、公益林和多功能林，按照这三大块去培育好森林资源。其次，分阶段逐步调整好五大类林种的结构，重点是要降低用材林和提高防护林的比例。第三，营造速生丰产林，强化集约经营。林业经营方式能否突破，营造速生丰产林是关键，也是能否把始兴林业建成生态林业的关键措施。实践证明，由于我们过去忽视营造速生丰产林，造林占用林地多，林木生长周期长，使全县林地亩平蓄积低，并影响了其它林种的稳定发展。

（三）山地开发要有新的突破，实现资源深度加工，综合立体开发。

始兴森林资源丰富，是最大的优势。按目前的水平计算，全县农村人平山地13.8亩，人平拥有活立木蓄积51.5m³，这个水平在全省是较高的。但始兴的经济仍很落后，全县的工农业总产

值、地方财政收入和群众生活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造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的深度开发加工和山地开发利用的水平低。这说明，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林区这几年的实践也证明，如果林区的资源不能通过开发加工转化为经济优势，广大林农没有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要想使林农不乱砍乱伐是很难做到的，建设生态林业县也就没有经济基础，整个构想就可能落空，也失去了其意义。根据始兴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业上和农业开发上两头突破，齐头并进。

工业上，总的目标应是力争近期内形成“围绕林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林业”的经济格局，彻底扭转资源利用率低，经济效益不高，无力投资造林的局面。具体是要建成几个林木加工系列：1.造纸工业系列。2.松香生产系列。3.人造板、家具制造系列。4.根据始兴水电、矿产资源丰富的情况，通过进一步开发水电资源，以现有铁合金厂为基础，在增加电力自给的前提下，建成水电、矿产冶炼系列。这些系列建成后，将彻底扭转始兴解放几十年来资源利用率低的局面，使森林资源的培育、综合加工进入良性循环。

农业上，总的目标应是搞好立体开发，提高山地产出，建立“长、中、短”结合的综合开发体系，增加林区收入。围绕这个目标，应重点抓好水果、“两香”（即香菇、松香）、“南药”的种植开发，并开辟野生动物的驯服养殖业，开辟新的致富门路。

上述设想如果实现，全县的经济将会出现新的转机，资源优势就可以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在林业的经营管理上有新的突破，建立起适应建设生态林业县要求的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1. 走联合道路，调动多方面、多层次的积极性，促进林业建设。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林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动，一次是给林农划分责任山、自留山，一次是放开南方集体林区的木材经营。后来，我们通过摸索总结，在木材经销、加工、砍伐、造林等方面，逐步由过去那种分户、多家、零星、分散经营管理走向联合经营管理。联合经营管理是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按照新的林业经营模式，林业将分为商品、生态、多功能三大林业，生态林业和多功能林业是不准砍伐或弱度间伐的，商品林业一个突出特点是要高投入和要求较高的技术，

农户单家独户是无力经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联合办场来解决。其次是由于林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长、投资风险大、获得效益慢的特点。这几年，虽然划分了“两山”，但林农造林、护林的积极性并不高，并没有收到责任田那样的效果，也要靠办联合林场去解决。再次是按照规模经济和山林经营的特点，都要求实行一定规模的经营，但在划分“两山”时，是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分山分岭，造成一户人家有好几个山头，一个山头十几户人家，既不利于砍伐，也不利于造林，更不利于管护。而要调整，难度很大，稍有不当地可能导致乱砍滥伐。因此妥善的办法是通过办联合林场逐步解决。

2. 建立托拉斯式的林业产业集团，把资源培育、管护和深度加工统一起来，适应建设生态林业县的需要。林业产业是一个内部结构紧密、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系统。但目前我国都人为地把之分割开来。森林培育属农业，森林砍伐属重工业，木材加工属轻工业。实践证明，一个系统分为三块，“种树的不加工，加工的不种树”，造成投资与得益相互脱节，矛盾不少，不利于林业建设。为改变这种状况，今后要进行这几方面的改革：一是建立联合紧密型的林业集团公司，把现有的森林资源加工企业和林业部门统一起来，使资源培育、管护、供应和加工协调统一。二是根据林业建设发展需要，全面征收育林资金。凡是和林业紧密依存的企业、行业部门都要按一定比例缴纳育林资金，以增加对林业的投入。三是企业按丰产林标准建立基地，使森林资源的培育加工基地化、集约化、系列化，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四是对林业产值、效益的计算与统计方

法要科学，真正体现林业的重要地位。

调整好林业的生产关系，改革现有的经营管理形式，使之符合全县林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是建设生态林业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们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逐步实施，深化改革。

(五) 在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要有新的突破，采用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

在制约山区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中，管理落后，技术落后，科技人才缺乏，劳动力素质差是主要的因素。因此，如不把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科技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摆到重要位置，建设始兴生态林业县的构想就落空。丰富的资源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实现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建设生态林业县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技术。而始兴目前科技人才缺乏，使这一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要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两条腿走路”。依靠县外的科技人员、专家、教授、学者，同他们加强联系，借助他们的力量推进生态林业县的建设，这是一条很主要的途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实施建设生态林业县的规划，采取优惠政策，做好有关人才的引进和本县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培养的规划，并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的人才，建立和健全起县级科研网络，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确保生态林业县的建成。

作者单位：中共始兴县委

责任编辑：郑英隆

清末广东农会述论

朱 英

清末，广东省垣及许多州县城镇成立了名曰农务总会、农务分会和分所的社会团体。这些农会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无人注意，对其作一概述，以助广东地方史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

清末广东农会是社会形势发展的产物。20世纪初，清政府打出“新政”旗帜，振兴工商，奖励实业，同时仍注重发展农业，认为“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①为此，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措施，而倡导成立农会，即是其内容之一。1906年，农工商部提出在各省组合农会。次年10月，颁行《农会简明章程》，强调：“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②该章程规定：各省省城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广东各地纷纷响应。1908年初，嘉应州和防城县等农务分会宣告成立，1909年香山县农务分会由广东商务总会呈文农工商部获准成立，同年10月6日，农工商部札委广东农

务总会总理梁庆桂、协理卢乃潼上任，标志着广东农务总会正式诞生。实际上，在此之前数月，广东农务总会已开展了一些活动，据护理两广总督8月23日咨农工商部文称：“伏查粤东地狭人稠，本地出产不敷，民食恒恃外来接济，近年偏灾屡告，民气凋残，薪桂米珠，闾阎困苦尤甚，失时不治，将酿为厉阶……农务总会为全省分会机关，不速成立，则声气隔阂，而运转不灵，当又敦劝近省绅民，刻期组织兴办，随由广东自治研究社绅联合同志，筹集捐款，稟设农务总会，并先在城内狗头山辟试验场，延聘场师，分区布种。”^③除成立了广东农务总会外，另在各地设农务分会43所，农务分所18个。^④有确切记载的为：成立州县农务分会的1908年有嘉应州和防城县，1909年有香山、英德、惠来、合浦、海康、鹤山、平远、镇平、钦州、仁化，1910年有广宁、陵水、长宁、博罗、曲江和四会；成立乡镇农务分所的，1909年有香山的隆都、古镇、安州、大黄圃、港口、西海十八沙龙洞、东海十六沙（不详年份）和新会的大滘、礼乐，1910年有香山的阔县。

(二)

需要探讨的是，清末广东农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首先应该说明，这些组织虽然是在清政府农工商部及广东地方官府倡饬之下成立的，但它并非官方机构，而是属于民间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们有其自订的章程，宗旨非常明确，组织制度也比较完备。不论农务总会还是农务分会和分所，领导人均由各农会以投票方式推举。议董或董事在会员中推选，总理、协理则于议董中推选，最后才报农工商部审批“札委”，而非由其事先指定，与清政府自上而下任命官办机构的主事官吏有着明显不同。

从经费来看，也主要由各农会自行筹措，并不依赖于官府拨款。一般来说，各农会经费来源之大宗，是会员缴纳的会费。广东农务总会规定：经费由“会员担任，定为捐款，以维善举”。捐款10元以上为寻常会员，20元以上为创办会员，100元以上为特别会员，“有慨捐巨款者，亦极欢迎”，^⑤但“捐助与否，各听其便，不加勒派”。^⑥分所与分会大致相同，“长年经费皆由会员、会友担任”。有的“公定每份收会底银五元，其家产丰厚、农业广大者，自可多认，由会友互相劝勉，踊跃捐助，所收款项存于殷实银号，或当押生息，只用利息，不动会本。”^⑦

根据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章程规定：各地创办农会，可禀请地方官府酌量拨给公款。揆诸他省农会，可以发现确有不少曾得到官府资助。例如福建农务总会创办时，即请由农工商部拨助银140两。湖北农务总会也曾由官钱局拨给开办费2000两。^⑧广东的农务总会和分会则均未得到官款资助，相比之下其民办性质更为

突出。

其次，清末广东农会虽名曰农务总会或分会，但并非真正的农民组织。

农务总会设在省城广州，乡村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加入。同时，参加农务总会除必须缴纳10元以上入会费外，每年还要定期缴纳会员费，一般农民也难以负担。出面禀请创办农务总会的是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立之后总理由自治研究社社长梁庆桂兼任，协理卢乃潼是自治研究社核心成员，连会所也设在自治研究社内。因此，广东农务总会实际上系由自治研究社控制和领导。其章程也称：“本会由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附设”。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一个以实现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是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派士绅。梁庆桂等人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即曾参加改良运动，还有不少毕业于国内外新式学堂。^⑨据此可以说，广东农务总会是当地资产阶级化新派士绅领导的、附属自治研究社的外围社团组织。

农务分会虽设于各州县，但对会员资格也有许多限制，农民同样难以厕身其间。如1908年6月成立的防城县农务分会，拥有会员29人，几乎全都身兼各种功名或职衔，其中五品军功衔11人，拔补把总4人，六品军功、县丞衔、从九职衔、州刺、都司翎顶衔、监翎补用从九品、廪生、选用县丞等，各有一、二人不等。^⑩身兼这些功名职衔者，显然是当地的士绅名流，不可能是一般的农民。同年成立的嘉应州农务分会，会员总数为21人，也分别兼有附生、监生至蓝翎五品顶戴等不同的功名职衔。个别农务分会成员中虽然有“业农”者，但也为数很少，不占主导地

位。如香山闾县农务分会有会员190人，成份比较复杂，其社会身份标明“职商”者有11人，教育会成员5人，新式学堂教员、毕业生等数人，“业农”身份者约占1/7，而且其是否真正的农民也很值得怀疑。当时，地主参加农会其身份也视为“业农”。

至于会董或董事等农会上层成员，更都是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士绅名流和工商各界人士，无一普通农民。几乎所有农会（包括分所）都根据农工商部奏定章程的规定，指明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有资格当选为会董或董事：“一、创办农业卓著成效者，或研究农学能发明新理者；二、在该地方富有田业，为一方巨擘者；三、或该地方土著，或游宦流寓该地方已届五年，熟悉情形，年在三旬以外者；四、其人品声望为该处士民推重居多数者，平昔顾全公益勇于为义者。”^⑩毫无疑问，一般农民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从总体上看，清末广东农会是以工商业者和新派士绅为主体所组成和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

还应该指出，清末广东农会中的士绅的阶级属性大都已开始发生变化，所以它与旧式士大夫的结社有着本质区别，具有明显的近代社团性质。如广东农务总会规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总、协理和会董，总、协理作为会中主要领导人，不得独断擅行，所有要事均须经40名议员议决通过后由总、协理和会董督促执行，年终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将全年所办之事择要提议，品评成绩，布告会众；有的农务分会也在章程中明确指出：“农会事权虽得总理、会董作主，仍须务求众情允洽，遇有增改一切章程、筹措经费等事，议定权

限，必要会董过半签允，并报部核准，方可准行。”^⑪还有的规定：遇有重要事件须由会员共同商讨，“概从多数决议，总以顺与情，治舆论为断。”^⑫这些都表明，清末广东农会既非以家族血缘关系联系而成，也不是由少数人专权独断，而是以多数成员的意见为准，集体形成决议，共同监督施行。因此，应视其为新式近代民间社团。

（三）

清末广东农会虽非农民组织，但其宗旨则为推动农业发展，在各农会章程中，有的直接指明“以推广农务、考究种植，使本处区域内物产日繁、地无遗利为宗旨”；^⑬有的强调从联结团体的角度推动农业发展，“以互结团体，共图公益为宗旨”；还有的表示举凡“农务范围以内之事，无论如何困难，均宜坚忍为之，而尤以固结团体，化融私见，总期区域内物产日繁、地无遗利为宗旨。”^⑭广东农务总会则标明：“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宗旨”。其章程第二节对此加以解释说：“实业之事，农工商矿以及医学皆在其内，本会务求普及，以开实业之先声，而导国民之智识。唯是入手办法必有阶级，循序推广方见实效，本会务求实践，以为粤民之倡，拟先从农务一部分入手。诚见夫农业为原料之基本，凡百工之制造，商贾之营运，皆于农业求之。农业改良，工商各业于焉涨盛，必然之理也。”显而易见，农务总会同样旨在发展农业，而且对发展农业的作用有更高的认识，视之为振兴实业的基础。

广东农会的具体活动内容非常广泛，凡涉及农业者几乎无所不包，择其要者有：创办农业试验场，改良农产品。广东农

务总会筹办之际即设立了试验场，“农田蚕桑、森林园圃、畜牧渔业、垦荒水利以及农具肥料、气候土壤、去害培植”等等，均聘定农师先在试验场试行，如“试验有得”，即通告各分会，“或寄种子，或示新法，务使同享利权，以广农业。”^⑧一些分会也“垦辟荒地，租赁田园，讲求培植，作为试验场所”。^⑨通过这种措施培养新品种，研究新方法，以促农业之发展。

兴农学，启农智。农学不讲，一直被视为中国农业衰败的原因之一。广东许多农会成立之后，即将提倡农学、创办农业学堂作为重要的实践活动。有的“购备农学新书，以资研究，并聘演说员数人分区演说农学大意，以期开通风气，逐渐改良”。同时还要求会员“均应集思广益，务期劝导农民，以增开智识为进行之方针”，^⑩有的“筹资派人专司农学，毕业后分教乡人”；有的表示“如有阐明农学、创制农具、改良农产、编译农书者，即由分会迳报总会，并报县转禀劝业道核明，酌予给奖，以示鼓励。”^⑪创办农业学堂也被列为各个农会拟办项目，只是由于经费限制，而实际兴办不多。但有的农会采取了其他类似措施，如广东农务总会在1911年4月建成农务讲习所，延聘教员讲授农学知识。^⑫

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垦开旷荒地”，“兴濬水利”，是各农会发展农业的两项主要措施。有的具体规定：“无论官荒民荒，有主无主，均须由各该乡董事会同会员，至各村社协同副董事，带同业主查明，分别地段，用官定弓步丈量。田壤沙壤，按亩数多少，山地按段数宽长，注明四至界址，划清界限，逐一标识，详细列

册，报由分会缴县备案，以便查考。”^⑬有的大力倡导绅民垦荒，凡有“自愿垦辟者，报由本分会代禀地方官，准其开垦。所有请示保护或设法赞助，本分会力任赞成。”^⑭在鼓励垦荒的同时，农会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宜，“随时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劝令凿井、修筑坡塘、兴建渠道等在各地展开，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开展农业调查。许多农会设置调查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调查的内容包括本农会境内土质物产、农产品种植、新理新法等，其目的在于“合力考究，设法改良”。有关春稔秋收情形和米谷粮食市价以及旱涝荒歉各灾等，各分会也随时列表呈报总会和地方官，以备查考，并协助赈灾救灾，有的农务分会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调查区域内气候之调和与否，地质之肥瘠如何，农产之良窳如何，每年各种收入之丰歉及其原因如何，并每年有无新出种植，皆宜列表详告省垣总会，以备考核。”^⑮

保护农民利益。在这方面，农务分会和分所作了大量工作。各分会所属境内农民，如被劫窃、扰害，可赴分会禀告，由分会商请地方官派勇缉拿凶手，以除民害而卫农业。农户间发生农事纠葛，可诉诸农会，“由农会集众秉公调处”。此外凡有一切改良和兴利除弊事宜，农户可提请农会设法整顿。

除上所述，清末广东农会的活动还有“劝办森林”、“推广蚕桑”、“改良农器及肥料”、“驱除虫害”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推动清末广东农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受到农民的欢迎。

- ①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8，实业一，第11241、11247页。
- ② 《农工商部奏筹办农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苏州市档案馆藏。
- ③ 《护理两广总督胡咨农工商部文》，宣统元年七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未注出处者，均为该馆藏档。
- ⑤⑩ 《广东农务总会章程》。
- ⑥ 《曲江县农务分会章程》、《鹤山县农务分会章程》。
- ⑦ 《香山县港口安平农务分所简明章程》。
- ⑧ 《商务官报》宣统元年第三十二期，“公族”。
- ⑨ 贺跃夫：《清末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 ⑩ 《广东防城县农务分会总理会员衔名表》。
- ⑪⑮⑳ 《嘉应州农务分会试办章程》。
- ⑫ 《海康县农务分会章程》。
- ⑬ 《曲江县农务分会章程》。
- ⑭ 《防城县农务分会章程》。
- ⑰ 《合浦县农务分会简章》。
- ⑱⑳ 《仁化县农务分会简章》。
- ⑲ 《长宁县农务分会简明章程》。
- ⑳ 《两广官报》，第1期，实业，第1页。
- ㉑ 《平远县农务分会章程》。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陈春声

常平仓和社仓是清代前期广东储粮备荒的两种主要形式。社仓设立于乡村墟镇，较之设立于县城的常平仓，对农村社会的作用更为直接。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广东社仓建立发展、仓改管理和仓储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组织与社会功能。

一、清代广东社仓的建立与发展

一般认为，南宋乾道四年朱熹在其家乡建宁崇安县借用本府常平米设置社仓之举，为社仓制度建立之始。不过，朱子所订的社仓法，实际上是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建立的义仓制度和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变通和发展。明代广东各府州均设社仓，后毁于明末战乱。

清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设立社仓。但广东社会长期动荡，顺康年间只有翁源、阳山、兴宁、龙门等少数县份设过社仓或义仓。康熙廿九年常平仓在全省普遍建立，但若仅有常平仓，“偶遇旱涝，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雍正元年胤禛下令再次议定社仓事例，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要求各“督抚速同司道府等官确商妥议，务得安民经久之法”。^①次年又复准社仓的劝捐、收息和管理之法。由于这两个谕旨，除惠州、潮州二府的大多数州县在雍正元年就建立社仓外，广东大多数府州在雍正二年都有了社仓之设。只有清远、长乐和香山等县的社仓是雍正三年才建立的。当然，就一县的范围而言，各乡社仓的建立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以恩平县为例：

“雍正二年知县王树元奉行劝捐社谷，设立大田、莲塘、尖石、镇安屯四社。六年改并鹿冈、区村、关村三社。乾隆九年社正梁锡尚捐修附城社仓一间，又捐建三间；旧驿村监生冯文辉等捐建仓廩一间，另设旧驿社仓。

十一年添设泾竹头村社仓一所，拨关村社谷分贮。十八年热水村生员吴舍所捐书馆一间为社仓；立热水社，拨鹿冈社谷分贮；鹿冈社正吴矩准捐书馆一间为社仓；区村东闸民冯泰南捐瓦屋一间为社仓；区村西闸民捐伊祖何冈主旧祠一间为社仓；关村社正伍成岳将祖尝公地一区捐建社仓一间；南塘村民莫昭彦捐砖屋一间为社仓，拨何冈、泾竹二处社谷分贮。二十五年沙地村贡生吴元端捐建仓廩一座；禄家充民郑三铭捐建仓廩一座。自后各社归并，连续立尖石村一间，共仓七处。”^②

可见，该县社仓的建立和调整经历了长达三十六年的过程。许多州县都有类似情况。

仓谷来源是社仓建立的首要问题。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所定社仓条约对此有两条规定：（1）“无论绅衿贡监人等概照田亩捐积，大约每亩不过岁捐一升”；（2）“捐谷照常之外，如有好义多捐者听，若数人或一人能捐建仓房者，本都院并道府给匾旌门。”^③把派捐和捐输作为社仓积谷的两大来源。在社仓草创阶段，尤以派捐作为聚积仓谷的主要手段。例如，和平县知县张象乾就“躬自下乡劝输，……自城及乡，某有余力可捐，某诚谨可任，某某应捐若干，某某应设仓于家，皆亲自指画，人不敢违”，^④这种派捐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其它州县的情况也大多如此。

清代广东社仓建立后，出现了三十年左右的停滞期。大多数州县的社仓积谷三十年不变，澄海、揭阳、保昌、开平等县的积谷反而有所减少。例如澄海县雍正二年社仓积谷2057石，乾隆初年仅剩969石，减少了52.9%。乾隆中叶以后，广东社仓重新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全省社仓额谷数由180,696石

增加到551,272石,增加了将近两倍。其中潮州府由11,398石跃升到113,237石,增加了893.4%;雷州府由1,425石增加到11,997石,增幅为741.7%。其余府州也大多增长一倍以上。这种情况是由于乾隆中叶广东社仓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引起的。

首先是仓廩的修建和总仓的设立。雍正二年年希尧规定“凡镇市围寨有烟户数百家,则立为一社,近镇市零星烟户可令附入。或乡村有数十家者,可数村合为一社。如有巨族户口繁盛者,可一姓二姓及素相亲爱者听其自为一社”。^⑤结果,社仓设立比较分散。例如,揭阳县社谷2351石,分贮73所社仓,每仓平均32.2石;^⑥和平县建仓102所,贮谷13,000余石,平均每仓仅127石;^⑦保昌县的1641石社谷分藏27仓,仓均只有60.8石。^⑧由于仓储分散,未能专门建筑仓房,“其谷俱散贮社正副家,或贮祠庙公所”。结果难于监察管理,积谷容易散失,所谓“有谷无仓,分贮社正副之家,出纳之间,虚实难稽。且家有兴废,亦非可久之模”。^⑨乾隆十年前,这种局面逐步改变,各地官员、士绅开始在县城和大的墟镇捐建仓房。前引恩平县的材料表明,该县社仓仓廩都在乾隆九年后才建设起来,特别是乾隆十八年,该年份士民捐建的仓廩就有6座。乾隆廿五年督抚奏准“社仓星散难查,檄各州县归并总仓”,各州县建总仓几所到十几所不等。前述和平县102仓归并为总仓9座,^⑩保昌27仓也合并为捕属、红梅、平田和百顺四属总仓。^⑪这一变化有利于防止仓谷散失。

其次,乾隆廿五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重新确定社仓收息之例,仓谷借贷每石收息一斗,改变了以前先是收息不一后又停收息谷的情况,无疑对以后社仓积谷的迅速增加起了积极作用。

最后,乾隆以后派捐基本停止,士民捐输成为社仓积谷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引恩平县社仓的材料就反映了这一变化。仓谷捐输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义。

二、社谷捐输的社会意义

捐输带有报效的性质。从名义上说,捐输社仓谷是由于传统的“保乡”、“睦族”观念,系一种无偿捐献。但实质上这是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一种交易,捐输者可由此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优免特权。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已议定直省社仓劝输之例,“凡富民能捐谷五石,免本身一年杂

项差徭;多捐一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绅衿能捐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六十石,知府给匾;捐八十石,本道给匾;捐二百石,督抚给匾。其富民好义,比绅衿多捐二十石者,亦照绅衿例第次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咨部给以顶带荣身。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役”。^⑫雍正二年又规定,“若奉公乐善,捐至十石以上,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奖以匾额;五十石以上,递加奖励。其好善不倦,年久数多,捐至三四百石者,该督抚奏闻,给以八品顶带”。^⑬乾隆三年再次议准:“社仓捐至三百石者,给以八品顶戴;四百石以上者,给以七品顶戴”。^⑭

清代常平仓以捐纳监生谷作为其最重要的仓谷来源。^⑮与之相比,社仓谷捐输具有明显的特点:(1)常平捐监者必须是生员、俊秀,而捐输社谷的既可是“绅衿”,也可是没有功名的“富民”,而且雍正二年后对两者的奖励不加区别。(2)常平捐纳仅捐监一途,捐输社谷则有各种途径,捐输者因捐输量不同,可得到从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役直至七品顶带等各种优免和地位。(3)捐纳监生事例由朝廷决定;而捐输社谷的决定权由州县官员掌握;(4)每次常平捐纳,各州县都有定额限制;而捐输社仓谷则没有限额。上述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社谷捐输的社会意义。

以捐纳监谷作为常平仓谷的主要来源,除了解决清代地方财政的困难局面外,更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为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条上升到较高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渠道,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但是,由于捐监制度的种种限制,许多未取得生员资格或财力有限的人无法得到好处,还有一些低层士绅可能因时间和名额限制失去利用该途径的机会。捐输社仓谷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新的上升机会。社谷捐输制度更灵活、方便,可作多种选择,而且这种财富与权力地位的交易是在“急公好义”的美誉下进行的,较之有“鬻爵”之嫌的捐纳更合乎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规范,因而很受地主、商人的欢迎。略举数例如下:

(澄海县)“许廷奎,字璧园,下外人。性慕义,生平以伍恤为念。雍正癸卯社仓初设,奎首捐粟以为众倡”。^⑯

(博罗县)“韩准,生员。乐施与,遗命其子监生韩桐捐社仓谷百石”。^⑰

(顺德县)“吴国璋,字景文。……乾隆壬戌

谷贵，出所有减价平粟，设社仓，捐谷积贮”。^①

若通过捐输得到顶戴，就可取得某种准官僚的资格，具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从而对地方社会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对许多士绅来说，捐输社仓谷往往只是毕生谋求乡族社会控制权活动的一个部分。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香山县小榄乡贡生何圣强的生活史。康熙五十二年饥荒，何圣强捐米300石赈济。雍正元年青黄不接，又捐米500石分赈。次年一人捐谷500石建立香山司属社仓（设于小榄）。雍正四年、五年各捐米710石和575石分赈贫艰。雍正六年经督抚会题，奉旨给以八品顶带。雍正七年再捐义田60亩于族内，租谷用于族内孤寡养口和收贮备荒。雍正十年又捐棺木、买地亩、立义塚，收敛通乡贫尸和暴露白骨掩埋，地方官再次给匾奖赏。到雍正十一年捐米626石分赈大、小榄两乡四十一堡贫民，经两乡地堡联名上呈，最后得到七品顶带。死后，其事迹被载入县志和府志。他所在的何氏宗族是小榄地方有名的三大姓之一，何圣强的上述活动，不仅为宗族带来了荣誉，无疑也提高了他本人和在宗族在基层社会中的威望和影响力。雍正十一年上呈恳请为他加品给坊的40个地堡中，包括了何、李、麦、萧、梁、高、黎、冯、张、蔡、罗、伍、刘、谭、陈、谈、章等十七姓。

三、社仓的管理及其特点

按规定，每个社仓设社正、副各一人，由每社绅衿里耆公议老成殷实之人充任。每年青黄不接时借贷社谷，秋后还仓。借贷对象严格限于“诚朴力田者”，技艺、佣工、商贾、贸易、无籍人等，还有胥役、营兵均不许借贷。这既是出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也是为了防止秋后无从催补，谷本无归。同时，土豪地棍若有冒名营私、博强抑勒者，许社正、副稟官严究。

仓谷借贷的“加息”是社仓管理的重要问题。康熙十八年曾有春借秋还，每石加息一斗的规定。^②雍正二年又规定，“凡借本谷一石，冬闲收息二斗，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祇以加一行息”。^③但同年广东社仓条约只是规定：“每石加息，不许过一斗”，^④结果有的州县每石加息一斗，也有的州县从不加息。乾隆二年署广东巡抚王夔又奏请停收息谷，仅在丰收之年每石收耗谷三升。结果，“仓廩损坏，随时粘补，势所不免，而经费无资，办理掣肘”，^⑤而且“社正副枵腹办公，殷实谨厚者趋而避之，无

赖之徒冒充侵蚀”，弊端丛生。乾隆廿五年户部复准广东社仓仍行收息之例，^⑥次年颁布的社仓“画一条例”对此作了统一规定：“每石加息一斗，查明收成分数，分别收免”，息谷一半入仓，另一半用于各项仓储管理费用。^⑦乾隆中叶之后广东社仓积谷迅速增加，与此有直接关系。例如，乾隆廿五年至卅四年间，大埔县3303石社仓谷共收息入仓1725石，九年增加了52.2%；^⑧丰顺县乾隆廿五年社仓积谷1663石，以后24年间收息入仓3004石，增长了180.6%。^⑨

不过，对社仓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以额谷最多的道光早期为例，当时广东社仓积谷551,272石，平均出借率约为60%，即全省每年借贷社谷330,763石。其时广东约21,558,000人，以人年均消费粮食4石计，则每年需要粮食88,985,600石。社仓借贷量只占其2.48%。就是与青黄不接的三、四、五三个月17,246,400石的需求量相比，社仓可供借贷量也只占1.92%。若考虑到嘉庆以后普遍存在的社仓缺额情况，这一比例还要更小。所以，我们认为社仓的功能主要表明在社会方面。

与常平仓相比，清代广东社仓有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社仓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关系更为直接。常平仓设于县城，乡村居民往往因路远而难以到县城采米；而社仓设于乡村，由士绅直接管理，农民到社仓领谷较为便捷。而且，常平仓以平粟为主，在市场上购粮的农村居民为数不会太多；社仓谷主要用于借贷，“所借贷者又专属于农”，^⑩直接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

第二，社仓具有更强的自我繁殖能力。清中叶广东每石常平仓谷粟之间可盈余0.014两银子，为当时米价的2%；而社仓借贷利率为10%，其中一半用于仓储管理，尚有息谷5%入仓，比常平仓高了1.5倍。

社仓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在于其性质方面。常平仓完全归官方所有，政府对常平仓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社仓则不同，清代广东社仓一直为官绅合办。

四、官府和士绅在社仓管理中的作用

社仓建立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共同起作用的过程。社仓建立后，其基本管理原则也是“官设民稽”，官府和士绅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对社仓的管理和控制，主要是由州县官

员完成的。

首先，州县官员对社仓管理人员的任免有较大的决定权。社正、副由绅衿里耆公议产生，但必须“报县存案”，而且常常由州县官员决定。社仓建立之初，归善知县孔能宽就亲自下乡“选股实诚朴之人为社副二长。”^②前述和平知县张象乾也是对“诚谨可任”者“亲自指画，人不敢违”。社正、社副若有“作弊徇情，虚收、挪移、捏借等事，许同社士民禀县查定，另外遴委。”^③乾隆卅八年大埔知县“王亦新查确各社仓谷亏缺”，就“将社、副革除，追缴谷价”。^④

其次，州县官员对社仓运作负有监督之责。清政府规定“每社设用印官簿二本，一社长收执，一缴州县存查。登载数目，毋得互异。其州县一本，夏则五月中缴，至秋领出；冬则十月中缴，至来年领出，不许延误，至生弊窦。每次事毕，社长、本县各将总额申报上司”。^⑤道光以前每隔若干年就对社仓进行一次清查。每年春天借贷前要申报地方官，遇灾赈济更是“非禀官不能开发”。关于社仓运作和管理的规定，也都由官府制定。

再次，州县官府实际上拥有社仓谷的最终所有权。乾隆中叶以后各次社仓清查案内，缺额仓谷全都追索折价银，贮于县、府、道库或藩库。一些州县甚至把社仓管理权收归官府，略举数例如下：

广宁县“社仓在城内，乾隆十九年建造，三间，将社谷移贮，归县掌管”；^⑥

和平县乾隆五十九年“奉文，四间社仓仍归常平仓”；^⑦

高要县“旧有社仓三处，……其一乾隆二十一年以同知废署改建，嘉庆四年改今名（肇丰仓——引者），七年隶县”。^⑧

值得注意的还有巡检司的作用。乾隆廿五年归并各乡社仓建立的总仓实际上大多设在巡检所在的县，许多还以巡检司定名。如连州就有捕属、朱冈司属和屋宇同属三座社仓，香山县社仓有捕属、香山司、贵圃司和贵梁司等四座。巡检司官员往往作为官府的代 表直接参与社仓管理，《保昌县志》就有“社仓设于各乡，借还甚便，而各乡巡司董其事”的记载。乾隆年间佛山多次发社仓谷救荒，先后任五斗口巡检司巡检的王棠、郑道源和柳因材都作为官府代表，对主持其事的士绅进行监督并维持秩序。巡检还协助社正、社

副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广东社仓条约就规定：“如有强借及不肯还仓者，社正副禀巡司究追”。^⑨

士绅阶层（特别是低层士绅）在社仓运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社正、社副是社仓的直接管理者。充当社正、副者，可免除杂派差役，“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令按年给奖。如果十年无过，该督抚题请，给以八品顶带。”^⑩他们在社仓借贷时对农民有很大权力：“临放时愿借者先报社长，计口给拨，交纳时社长先行示期，依限完纳。”^⑪而且“凡州县官员只听稽查，不许干预，如有折勒挪借，强行聚卖侵蚀等事，许社长呈告上司，据实题参”。^⑫

当然，在社仓管理中起作用的士绅远不只是社正、社副。地方上的绅衿里耆不仅对社正、副有推举和弹劾的权利，而且也参与社仓的管理。乾隆廿五年广东巡抚托恩多就规定：“出借社谷，原应取得然后给领，凡各族正、族副、约正、党正等将应借人户知会社长。收交之期，着落催缴。”^⑬而且，有的社仓是以宗族为单位建立的，如兴宁县官联刘氏宗族就有本族社仓，积谷一百五十石。^⑭这种族内社仓自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族正、族长等宗族领导人的控制。此外，地方上为社仓事务与官府交涉时，往往采取士绅联名具禀的方式。如佛山社仓的多次赈济都由当地乡正、监生、举人、职员、生员、耆民等联名具禀，赈后买补仓谷时也经多人具结。^⑮

士绅阶层作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中介，一方面协助政府控制地方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在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中，不同士绅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社正、社副只是士绅控制网中的一员。雍正初年任和平知县的王植就详细描述了当时农村社会的这种控制体系：

“查和邑各乡，立保长、甲长以察奸歹；设练总、练勇以资守御；有约正、老农以为劝课；而墟市则有墟长，以统墟甲；民间推乡老以及族长；社仓有正、副之名，公事合衿耆之论，称曰‘老大’。其名或不尽在富，要皆公正勤慎，始于地方有益。”^⑯

如果思比较官府和士绅在社仓管理中何者作用更为重要，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国家政权在承认士绅统治乡族社会的合法性时，可在不同的士绅或士绅集团中进行选择，但官府对基层社

会的控制，归根结底只能通过士绅阶层才能实现。反之亦然，虽然作为整体的士绅阶层总是掌握着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权，但具体实现某些社会控制功能的士绅或士绅集团的合法性，却必须来自政府的授权或认可。为了叙述方便，以上的讨论偏重于结构性的、共时态的分析，而实际上社仓管理却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的过程，官府和士绅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是变动不居的。开平县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雍正二年奉行劝捐社仓，绅士人民报捐谷五千四百一十九石三斗七升九合，历年借收息谷二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零六勺，原贮各社自行经理。乾隆五年洪潦涨发，各社仓廩坍塌。乾隆十七年贡生张翮飞、谭蕃益以修仓费用浩繁，议建总仓，分贮县城、沙冈二处，自愿承充社长管理。四十三年，举关峻发充县城社正，陈润洵沙冈社正。是年岁歉，照例详请出借一次。嗣后春借秋还之例，并不举行。皆因乡民住居辽远，跋涉需费，不肯借领。贫民居多有借无还，社正日形赔累。五十一年陈润、关峻发先后呈退，

无人接充。嘉庆元年知县荆璽详准将社谷拨归常平仓内暂行收贮。五年钦奉谕旨，社仓谷石仍听民间自行办理，不必官吏经手。七年县民谭廷标等赴省呈请将社仓谷拨还各社经理，以便还借。十七年知县龚颯详准。十九年知县伊云崧按照原续报捐及收存息谷数目拨回各里社长经理，书差不得稽查滋扰，立碑明伦堂。”^②

可见，对这样一个历时近百年的复杂变化过程，不管是单方面强调官府还是士绅的作用，都有片面和简单化之嫌。

乾隆末年开，广东社仓制度逐步瓦解，道光时许多地方社仓积谷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定额。咸丰四年开始的红巾军起义和咸丰六年英法联军的侵略，促使了社仓制度的最后解体，常平仓的崩溃也在这时发生。与之相应的是义仓的兴起。义仓完全由士绅自办，只设于一乡一族之中，经营方式更为灵活，有更强的自我增殖能力。这一过程反映了王朝后期基层社会控制权逐渐下移，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② 道光《恩平县志》卷5，社仓。

③④⑤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乾隆、嘉庆《和平县志》卷2，社仓，事纪；卷6，风俗。

⑥ 雍正《揭阳县志》卷2，公署。

⑧⑩ 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16，积贮。

⑬⑭⑮⑯ 雍正《大清会典》卷39，积贮。

⑰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93，积储。

⑱ 参见拙作《清代广东常平仓谷来源考》，《广东史志》1988年第三期。

⑲ 雍正《澄海县志》卷9，义行。

⑳ 乾隆《博罗县志》卷12，人物二。

㉑ 乾隆《广州府志》卷41，义行。

㉒⑲ 同治、民国《大埔县志》卷8，卷7。

㉓ 光绪《丰顺县志》卷2。

㉔ 嘉庆《潮阳县志》卷8，社仓。

㉕⑳ 乾隆、道光《肇庆府志》卷6，仓监；卷5，廩署。

㉖ 兴宁《刘氏族谱》艺文。

㉗ 参见《佛镇义仓总录》卷3。

㉘ 道光《开平县志》卷4，建置。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历史文学的虚构

吴秀明

一

题材的自然属性对一般虚构性作品具有同样对应式的潜在影响，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世界模式化的表现，它是一个特定生活题材抽象而又具象的存在形态。历史文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它对历史原型有某种特定的指谓性，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不能象虚构性作品那样将原生对象完全撇置一边不管。

历史文学的题材对象是一个优势和局限兼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它的原型属性中有着为一般虚构性作品所没有的因题材对象知名度高和经受时间反复冶炼铸就的先预性强、哲理值重的特长。“譬如我们大家都知道项羽是一个粗猛的英雄，有了这一个先入观念在脑里，然后再去看小说，那么不必细细的描写，作者就能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①黑格尔从使用材料“记忆性”的角度，对此曾作过深入的解释。他说：历史文学以记忆性历史素材为描写对象，使它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为虚构性现实题材所没有的先天优越之处，“这就是由记忆而跳开现时的直接性，就可以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②“记忆本身就在人物性格、事件和动作上面蒙上一层普遍性的障纱，把外在

的偶然的个别细节遮掩起来”。^③

与此相反相成而又不可分割的另一面，是它的超稳定性和受制性。因题材为世人所熟悉，并且经过历史的反复冲刷，它在给作家的创作一种先天的成功度的同时，它所涵积的具有特定指意的哲理含义也必然使他们的艺术虚构和创造多了一道限制的障碍，不能与人们熟知的历史图象距离太远。因而，历史文学创作很容易形成一种滞重凝固的艺术框架和创作、接受过程中的惰性思想。比方说曹操这个形象，郭沫若在《蔡文姬》中把他塑造成“红脸”贤相。就历史真实而言，这个案翻得对，但是大多数读者对此却不买账。除了艺术描写中某些分寸失当的因素外，这与人们心目中先有一个“白脸”奸臣曹操的心理定势很有关系。历史文学题材对象的优长和短缺是集于一身的。

艺术创作，从某种意义讲就是题材自然形态受动与能动的有机统一。作家接受历史的馈赠，从中获取丰腴的历史生活原汁以铸就自己的美学品格。司各特取材苏格兰的历史小说有难以掩饰的思想艺术缺陷，但却赢得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题材进行抽象与具象处理时，大量化进了原生

态的美质，如苏格兰山地特有的风光景色、民族习俗、宗教迷信、衣冠服饰等等。相反的是菲尔丁、华尔蒲尔等哥特式作家，滥施现代的生活情调和款式，对生活题材的原生美采取非常任意的态度，结果正如乔治·森茨白瑞所指出的，“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各具才能，其中一两位甚至有小天才，但所有这些作家都在一个严峻的难题——即时代错误——上跌了跤。”④贞德是法国杰出的民族英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时所表现的坚贞的勇气和恸人的悲哀，触动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心。可惜的是，席勒在《贞德》一剧中竟然去虚构贞德逃出英军阵地，最后为祖国战死沙场这样的结局，给这部可望达到“第一流的美”的剧作抹上了虚伪、做作的痕迹，造成了思想和艺术价值不应有的损害。看来，有时候的确是“事实胜于虚构，真实生活中的传奇最好，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人们在奇特、诱人的环境中的感觉、行为、言论，其结果就会比那些精心虚构的东西更生动、更响亮、热情奔放。”⑤

然而，历史文学毕竟是艺术创造，从历史的原生美到“第二自然”的成品，其间有质的差异。在实际创作中，贞德这样的题材毕竟是很少见的，大量的创作都要经过重新组构。即便是贞德这类“雄伟壮丽”的原型对象，也不是照实临摹就可成功的，它还有一个如斯太尔夫人所说的“心灵的天籁”的作用问题。由此而论，接纳题材对象的原生美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就多少带有些受制、被动的成分。只有根据艺术可然性必然性的规律进行自我调节，才能使题材对象具有最能体现个性

光彩的美学适应性。

就题材属性的整体而言，不管是超越时序、超越史实或是超越内容，超越对于题材对象本质化的实现都具有同等意义。不过相比之下，在题材局限性方面的超越作用更大。《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面临的题材势能是不相上下的，但两者最后成品的艺术生命价值却有很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位作者对题材的局限性态度不同：冯梦龙对历史原生素材只是简单地照实敷衍；而罗贯中却看到了原型对象的种种先天不足，有选择有增删地作了审美超越的处理。如张飞鞭督邮的情节，在历史上原为刘备所作，小说为了突出张飞的粗猛性格，有意把它移到张飞头上。黑格尔在谈历史文学题材属性时只看到它的优势而忽略了它的局限，这是他的一个失察。其实，局限的存在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能否做到象莱辛所说的并不满足于把可信心建立在历史权威上，而致力于人物性格、情感的刻画和因果链的显示，从审美的层次上达到与题材对象的异质同构，真正使自己的创作步入质的规定性和美的普遍性和谐统一的境地。

二

历史文学的本体描写也不同于一般虚构性作品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

虚构性作品不以史实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要素；其基本艺术手段排除载体的指谓价值。它只求合乎情理逻辑，而不顾及原生对象原有的属性和特性。作家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假定性故事情节的叙述，其艺术转化纯粹是一种“职业的文学技巧”。历史文学则不同，它的形象本体结构有史实因素的参与。作家不

是单纯使用创造性想象，而要艺术地把史实融为作品内容的有机要素。这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审美过程。一味地非史和对史采取主观随意的态度的作法，都有悖于历史文学的品格，是历史文学作家之大忌。清代学者金丰在阐述他的“虚实结合”主张时指出，历史文学的艺术描写虽“不必尽出于实”，但对主要历史人物思想性格如岳飞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的把握，则要尊重历史真实。他认为：“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⑥金丰的论述已接触到了历史文学的属性和个性的实质，比之毛宗岗建立在文史不分观念上的所谓“据实指陈”、“真而可考”的说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同金圣叹颇有非历史文学个性说味道的“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⑦之类的议论相比，也切实具体得多了。狄德罗说：“悲剧作家从历史中借过来的众所周知的部分，使得他想象出来的东西也被观众当作历史事实而接受了。”^⑧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道理，历史文学才能使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艺术错觉：“这是真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硬要用虚构性文学的尺度将它“统一”掉。

强调史实性因素的参预，绝非必然要阻遏历史文学作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招致精神创造力的麻痹和萎缩。其理由是：

（一）史家的记载总是包含着不确定和模糊的成分，为作家的创造留下广阔的回旋余地。（二）即使面对同一题材对象，由于各人的理解认识不同，选材的角度、采用的形式和手法有别，也可各自作出见仁见智的处理。文学史上同是取材于凯撒、

拿破仑史事的有莎士比亚《左利乌斯·凯撒》和肖伯纳《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雨果《悲惨世界》、司汤达《巴马修道院》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差异悬殊却都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这就是很好的实证。

应当看到，同样是循守着历史文学本体描写的特性，有的作品写得“从心所欲不逾矩”，富有美学意蕴，而有的作品则写得拘谨僵固、枯燥乏味。这里的分野，从创作论来看，涉及到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问题，从接受美学来看，涉及到艺术中介和契合点问题，从发生学来看，涉及到认知结构的同化和调节问题。但说到底，是用“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史实对象、史实因素，将它搬到作品中来，还是用“美”的观点来观照史实对象，使它自然地为作品的艺术肌体所融化吸收，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托尔斯泰说得好：史学家和艺术家在反映历史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对于史学家来说，英雄是指他有助于实现不论怎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意义上说的；而对于艺术家，则要就这种人物跟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协调性而论，那么这样的人物不能也不应当是英雄，而应该是人。”^⑨可见，历史文学的艺术描写，关键并不在于引进了史实，而在于作者是否站在美学制高点上俯视它，是否诗意地加以展示，象巴尔扎克所说的“添上小说家的才具、强大的创造力、细节的精确性、对感情的深刻体会等等”。^⑩

三

历史文学语体形式与一般纯虚构作品的不同，首先在于语义的指称功能。虚构性作品创造的是一个假定的自足世界，作者往往要让作品同现实的指称对象尽量脱

离联系，使之溶化在意味的整体之中，以便读者有效地把握和体验其中“虚构的”审美涵意。历史文学的语言，由于对史实有一定指谓性的属性，除了非指称性语言外，本文中必然掺入可以和史实对象相对应的指称性语言。例如《三国演义》，它的许多语词指称的人物和情节，时间和空间，环境和地点，都同真实的历史相吻合或基本吻合。历史文学语义的这种现象，至少在心理上使人们解除了怀疑和设防，而乐于接受。其负向效应是，指称性语言和非指称性语言掺杂运用，从纯历史真实的角度会认为它过于虚妄，而从纯艺术真实的审美观点来衡量，又觉得它创造不足。对作品的评价之所以常常出现截然对立的观点，从语义角度看，就是这个道理。正确的批评应该是用审美的视界看其在指涉史实的同时是否也是“构成诗的要素的材料”（苏珊·朗格语），而不是把语义指称的作用降为准历史学的反映功能。

历史文学语体形式与一般虚构性作品的区别，其次的表现是语言媒介的非现实性。历史文学反映的是历史生活内容，但如果按照内容和形式统一论的机械理解，认为它采用的纯是历史的语体形式，则是天真的误解。事实上，被史家当作“真的语言”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都是加工过了的，如有意拟古、文言化等（中国长期以来“文言分家”，更为典型）。历史文学作家的描写即使字字句句有出处，或将史载的语言复呈到作品中来，它们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语言”。退而论之，假如真的使用“历史语言”，又能有多少观众和读者接受得了呢？黑格尔说得很好：历史文学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

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⑩所以，为了与现代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相吻合，它的语体形式就不能不采用与内容颇不一致的现代形态，将历史内容符号化为“属于我们的”审美对象。文学史上举凡优秀之作，总是尽力剔除那些冷僻艰奥的古语而代之以一般读者可以欣赏的较为通俗的现代语。郭沫若《屈原》的开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修改。作者为了刻画诗人屈原的性格，初版本让屈原朗读《桔颂》原文：“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由于语言过于历史化势必阻隔观众的审美接受，所以作者后来把它改成了颇有现代诗意味的翻译：“辉煌的桔树呵，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李渔说，剧作家写古人古事，应该“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⑪这和黑格尔提出的为“进一步发展的文化”之需，历史文学创作可以“破坏所谓妙肖自然的原则正是艺术所必有的反历史主义”，^⑫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不过，我们并不主张完全不加改造地采用规范的现代语。因为现代语言，包括语感、语态、语调、语势、语汇、语词等，毕竟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今天的意识形态、思想道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其制约；在表达历史生活内容方面无法构建具有历史感而且读者可以接受的艺术意象。正因为语言具有符号、意义和指称三元一体的特点，作家在描写昭君出塞、贞观之治时，为使作品能为现代人所欣赏，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采用颇富现代

意味的语言，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让王昭君、汉元帝、李世民、魏征、长孙皇后等人嘴里吐出诸如“民族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之类的词儿，以免会诱使人们将它和现代生活内容直接挂钩，使审美心理上积储起来的历史感顷刻之间崩溃倒塌。

既不能“纯历史化”，又不可“太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语言正确的形式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陈白尘、郭沫若两位作家的有关意见：

“历史语言 = 现代语言，‘减’现代术语、名词，‘加’农民语言的质朴、简洁，‘加’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术语、词汇。”

——陈白尘《历史与现实》

“史剧用语……根干是现代语……在现代人能懂得的范围内，应该要掺进一些古语或文言，这也和写现代剧要在能懂的范围内使用一些俗语或地方语一样。不同的只是前者在表示时代性，后者在表示社会性或地方性。”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

在他们看来，历史文学的语体形式既不是

绝对的古言文，也不是纯粹的现代白话文，而是以现代语为基础对古今特有的名词术语或非常熟悉的习惯用语严加增删选择的特殊图式。他们的意见已基本为作家和理论家所接受。不少历史文学作品，尽管或采用半文半白的语式，在文中有意化入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成语典故，如《胆剑篇》、《大风歌》；或是叙述语言以现代白话文为本，人物语言则带一点古味，具体表现形式各有差别，但细细品察，彼此又都暗合上述的特殊图式。历史文学采用这样的语体形式，一方面能使人感到亲切，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陌生奇异，从而达到感情与共而又处处隐伏历史距离的特殊美感。历史文学语体形式并非生活中所实有，它是出自作家之笔创造的一种“第二自然”。如果归结到文化范畴考察，可称为“历史——现代”形态的中性物（不是真正的“历史”语态，也不是真正的“现代”语态），这是历史文学语体形式的独特之处。

①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

②③④⑤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36、242、346~347、353页。

④ 乔治·森茨白瑞：《司各特和奥斯丁女士》，转引自《司各特研究》第127页。

⑤ 威廉·赫兹利特：《时代的精神》，转引自《司各特研究》第7页。

⑥ 《说岳全传·序》。

⑦ 《读第五才子书法》。

⑧ 《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157页。

⑨ 列夫·托尔斯泰：《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点申述》。

⑩ 《巴尔扎克论文选》第100页。

⑫ 李渔：《闲情偶寄》卷一。

作者单位：杭州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道家美学

杨煦生

一

道学，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和哲学流派。因以“道”作为宇宙论的终极始因或存在论的最高价值境界，故名。从先秦时代起，由于对“道”“无为”等主要观念理解上的差异，使道家学派分为老庄学（事实上乃庄学）与黄老学两个派别。约略而言，老庄学以庄子思想为代表，完成了道家思想中从宇宙论及策略学向存在论的转向，即保留了《老子》中一定程度的对社会、历史、文明的批判而略去其策略学思想，而单从形而上学角度将自然本体论转向人的本体论，使道家思想成为一种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本质和可能性的终极关怀，这一思想传统开启了魏晋玄学并与大乘佛学的般若学思想相融汇而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产生，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条极为可贵的以人的现实存在为核心的存在论传统。而黄老学则一方面坚持了老学的宇宙论传统（从《管子》至《淮南子》俱然），从道而气，企图为宇宙的发生和发展寻找根据，或“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坚持以无为思想为核心的策略学，兼收并蓄儒家之仁义、墨家之兼爱、名家之刑名、法家之法治思想，将策略学扩大为一套政治伦理思想。

道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庄学”这一系统，尤以《庄子》最为典型和杰出。道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主要并不见于那些使用频率不高的“美”“丑”等字眼出现的地方，而潜藏于整个道家思想体系之中，故尔，对道家美学的了解只能着眼于整个道家哲学体系。尤其是那些决定道家理论旨趣的有本体论意味的观念。

道无疑是首要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出现，将先秦时代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理论形态的形而上

学的初露端倪。“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篇》，本文所引《老子》皆据许抗生帛书校勘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德篇》）“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播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道篇》）老子一开始就似乎陷入混乱，道或者忽而近于“一”，作为宇宙动力学的始因和发生学的始点，从而成为宇宙学概念；或者忽而近乎“无”，作为不可致诘的终极本体而成为本体论概念。于是道的属性学术界颇有争议，或以为是物质性的实体概念，或以为是观念性的诗意假设。事实上，道即一即无，三者老子中乃是等值的。这一点倒为并不重要的道家著作《关尹子》所道破：“圣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合而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然而，只是庄子带来道家内部的理论转向之后，这个问题才明朗起来，并且才真正地转向美学。

《庄子》书中，虽有“泰初有无”（《天地》）“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知北游》）等一类有宇宙论色彩的语言乃至有有道在蝼蚁、在瓦壁、在尿溺等似乎有泛神论倾向的语言，然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齐物论》）庄子对于有关自然存在的宇宙论问题是持“悬搁”态度的。

老子之道的秘密在于其无为无不为的特性。庄子继承了这。老子无为无不为之道在于为其社会政治理想寻找一个宇宙论根据和启迪，“至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道篇》）而庄子之谈天论道目的却在于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种有宇宙论色彩和本体论意味的绝对价值境界，因为，庄子哲学中引入了“天”“人”“吾”“我”四者的关系：“今者吾丧我”（《齐物论》）“无为为之之谓天”（《天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天，在庄子哲学中丧失了“天帝”“天命”等人格化或宿命性的意义，做为与人（人为的、社会的、文明的诸种特性）相对的自然的本然状态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吾，则做为与我（被历史地位的社会化、伦理化的主体现实命运）相对的理想无待的纯粹主体性。于此，道在庄子哲学中的特性终于豁然：做为不期而然的自然存在的运作方式和无所为而无不为的人的存在绝对境界，成为一种本体化的无限可能性和绝对性的价值境界。这种本体性的无限可能性和价值境界所起的范导作用使道家哲学真正地成为美学：1. 把道广被其中即无目的无意向无谋划的无限可能性磅礴其中的自然界设定为审美对象界。2. 把体悟、皈依和把持这种无限可能性的理想人格设定为审美人格（或以这种拟态化的方式来状摹契悟这一无限可能性时的亢扬的审美心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真正能观于天地而体道得道的理想人格，便是那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至人神人。至此，道家思想中，包孕了1. 审美境界2. 审美人格（或审美心态的拟态化形态），因此，道家思想在庄学阶段上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成为美学。

二

老子对文明的异化有某种朦胧的预感，由此，他采取了一种迥异于儒家积极的文化态度的非文化主义立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道篇》）“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道篇》）对于恶劣的感性放佚和文明必然的恶果，老

子不无直觉，从而采取了两种立场，一种是策略学的解决方法：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见素抱朴，被褐怀玉，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一种则是近于人本学的解决：弃知绝圣，闭门塞兑，复归于婴儿。这两种途径都通向庄子，而庄子采取了哲学人类学的立场。

“吾命有所制矣”庄子从人的存在的受动性出发，对文明所带来的所有罪恶提出了卓绝的抗议：“及至圣人，黜黜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千世之后，其甚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庄子对个体的感性存在（肌体之累、声色之乐以至死生大关）到社会存在的理性规定（仁义礼乐、聪明言辩即伦理道德等表层理性因素到语言逻辑等深层理性因素）及至物质工具（有机事必有机心，有机心则纯白不备）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仁义不泯，众生不宁，成心不去，生命便不本真。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要求恢复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而他所最为着力之处为1. 超越伦理；2. 超越逻辑。在庄子所处的文明发轫期，他所能采取的超越方式绝非总体的历史的实证的方式而仅能是个体的心理的体验的方式，这就决定了审美心境的确立，因为只有审美心境能使人相对地领悟存在的本真性。这种确立审美心境的具体途径便是1. 体验化途径即现实超越的心理化和体验化，（这一途径始于老子式的涤除玄览和复归于婴儿）即以“心斋”“坐忘”而入“朝彻”“见独”“撝宁”之境，亦即通过心理层次上消解存在的外在规定性，使强意识化的伦理偏执（儒墨）走向无意识化，从而使被禁锢压抑在无意识层次上的本真生命力充分地显意识化。“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撝宁。”（《大宗师》）“堕肌体、黜聪明，离形知去，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同上）“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缮性》）在庄子哲学中，“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人的存在无往而非网罗拘羁且终不免于为大化所泯灭，因此，超越便只

能首先是个体的且是心理的，即只能通过体验与内省。以仁释礼的儒家文化通过外在规范的内在化形成强烈的伦理醒觉而缚人以礼，庄子的体验化途径正是以审美心境解除外在抑制，让生命在心理解放的阳光下得到舒扬——与物为春而莫知其极。2. 相对化途径即实证问题的相对化和价值化。在庄学中，心斋坐忘等体验方式更适合于消解个体存在的感性规定性（肌体、声色）及社会存在的理性规定性的表层因素（仁义、礼乐等伦理因素）相对化途径则主要针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规定性的深层因素——语言、逻辑层次的是非、名实、盲意等等。这里，庄学把超越的矛头指向文明自身、维系社会存在的理性网络和个体存在的深层结构。“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齐物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齐物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同上）“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与天为徒，其不一也与人为徒。”（《大宗师》）对于庄子，在作为无限可能性的道面前，在作为无为无不为无目的而无不合目的的未被人类所扭曲和玷污的本真状态的自然而然的“天”面前，一切差异、分别、是非、然否、彼此之分、物我之辨，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为了使人类从各种泛滥的伪价值（仁义、礼乐、贵贱、得失、荣辱、穷通、毁誉、是非等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庄子使用了惊世骇俗的相对化法则即把一切对待的相对性绝对化。老子也讲“得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德篇》）然而真正领会“一”之大义是庄子。《庄子》逼着人们去明道面一，迎大通，求无待，入于寥天一。用一种悠永弘深的宇宙意识（和之以天倪，照之于天，莫若以明）来君临这一纷扰的失去价值依据的世界，在指向大一的途中与道遭遇从而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并化从而返归生命之本根。

总之，道家美学或通过“复归于婴儿”“心斋”“坐忘”等心理途径令人去物欲、超功利，或通过“天地一指”，“万物一马”“道通为一”的逻辑途径

令人超对待、破拘执，其目的都在于一种审美心境中领悟存在的至高的统一性从而获得本真的感觉和本真的存在。

三

道家美学只是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才成其为美学。道家思想对于美学和艺术诸问题从未有过自觉明晰的表述，我们只能得之于对道家思想体系的整体探索。

天：自然·人生·艺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篇》）与荀子式“制天而用”的儒家观念不同，道家哲学中之天作为自然、生命的本真状态揭示了无所欲成而无所不成的无限可能之道，从而成为人类存在所必须皈依趋赴的理想范本。自然也就因此失去其神秘意味和恐怖色彩，不成其为宗教对象和科学对象，不再作为人类生存斗争残酷的疆场而成为“望之畅然”的“故国故都”——诗意的家园。正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人要超越现实存在必须“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身与物化”、“与物为春”，于是，避世者躬耕于皋壤，厌世者回归于山林，愤世者逃遁于江海。自然成了人生的总归宿也成了艺术的总渊藪。中国艺术精神的很多方面都源于此：1. 观于天地的观念开启了后代“含道应物”“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的山水画（及山水诗）传统。2. “道”“一”“精”“气”的观念（与易学的某些观念相辅）奠定了中国画和中国书法的形式风貌。一方面，于《老子》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于《庄子》是“通于一而万事毕”；于《淮南子》是“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道家美学对存在的统一性和时间性的领悟决定了中国艺术中线条至高无上的地位。石涛曰：“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苦瓜和尚画语录》）另一方面，于《老子》，道之物惟恍惟忽，道有微、希、夷诸种特性；于《管子》，虚者乃万物之始；于《淮南子》则是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于关“精”、“气”、“细缊”观念，成为中国画尤其是南宗文人画（王维、董源、二米、龚贤、石涛等等）的“墨气”风貌的理论底蕴。

大：审美理想 与自然与天相关的是“大”，这是道家美学在审美理想上的特征。于《老子》，道即大，“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于《庄子》，“夫道，覆载万物者，洋洋

乎大哉”。道即一即大，道磅礴万物，覆载天地亦即领有了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于是在审美问题上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惟无限、悠永、旷大、弘深为大美至美，庄子更直接用审美意象以拟化形态来表现体道的自由的审美心境和得道的自由的审美人格；那水击三千，海运万里，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那树于无何有之乡的大树，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真人至人神人。这种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审美意象对中国艺术的风貌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影响甚为深远，遍及楚辞、汉赋、唐宋诗文（屈原、李白、韩愈、苏轼），单就书法艺术而言，从汉《乙瑛碑》到唐张旭《断千文》就是这一审美理想的天才表现。

谬，喜剧精神 由于前述的道家美学中人对自然的亲和感和皈依感，道家美学并未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崇高感和决绝的悲剧意志，相反，对存在的有限性和文明的悲剧的宿命式的强调却引出一一种独特的喜剧精神：“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世界状若泥涂，生灵万劫不复，人的出路便仅在于：或成真人而乘云气翔于六合之外；或为龟而“曳尾于涂中”。为抗击荒谬，庄子只能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同上）对这个世界进行价值审判。这就形成一种对民族性格影响极深的傲睨一切、排调万物、七分激绝三分佻黠的“喜剧精神”。这种精神以轻诋任诞、狂情怪胆的风貌，在不无一丝自我耍弄的境遇中无情地耍弄、亵渎世界。（从“竹林七贤”到“扬州八怪”，从嵇衡、李白、柳永到关汉卿、徐渭，都是这一传统的承继者。《列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这一传统。）

言与意 语言问题一开始便为道家思想家所

重视。对于语言与存在之间有无同一性、理解的历史距离能否克服等大问题，他们都表明了态度：1.“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道篇》）“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不能论、意之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道家思想坚信有言之不能论、意之不能致的“不期精粗”之物存在着，这与他们关于道与体道的思想是内在地统一的。因为，“道”“一”“天”“吾”所指向的无限可能性是无法以语言（言论）穷尽也无法以个体体验（意致）穷尽的，故尔，通过审美心境的确立，一方面向内返光自照，一方面向外观于天地，正是为了假审美之途开辟遭遇无限可能性之路。2.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迹与履、迹与所以迹之辨，表示了道家思想中对理解的历史距离的不可克服性的判定，即历史意蕴（“所以迹”）不可能通过历史文献（“迹”）的解读而被完全破解。因此，理解活动必须审美化，通过直觉性的契悟超越历史距离直接切入意蕴，这就是所谓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外物》）。道家（尤其是庄子）的语言观，揭示了历史意蕴和审美意象的不可穷尽性、理性的理解活动的有限性和审美体验的能动性，从而使审美体验的意义得到高度的凸现。这一传统为玄学、般若学、禅宗佛教等思想体系所继承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并且导发了“妙悟”“意境”诸说。

此外，道家美学中，“真”“丑”“技”等一系列问题也颇有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刘斯翰**

《历代赋汇》评议

马积高

《历代赋汇》，清康熙间陈元龙奉敕纂修，正集140卷，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共184卷，收自宋玉至明代的赋3834篇。据湖南图书馆刘志盛同志《赋书目录》，此书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另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162卷本及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点石斋印162卷本。（无《补遗》二十卷）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曾据清光绪间双梧书屋俞樾校本整理影印，我所见者为康熙间刻本及1987年影印本。

陈元龙（1652—1736），字广陵，号乾斋，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进士及第之后即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除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因被劾休致回籍外，长期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讲、侍读、侍讲学士、少詹事、詹事等职，为康熙所眷顾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奉命辑《赋汇》，不知始于何时，此书题“经筵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书士加三级陈元龙撰”。考陈氏任经筵日讲官及由少詹事升詹事均在康熙四十二年，次年即以父病请假回家侍养，后又遭父丧，至康熙四十九年始还朝。此书有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御制序，又陈元龙有四十五年上书表：知成于陈氏回家养亲之时。（陈元

龙事迹见《清史稿》及《清七百名人传》本传）。

本书按内容分类，《正集》30类，依次为：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搜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鸟兽、鳞虫。《外集》8类，依次为：言志、怀思、行旅、旷达、美丽、讽谕、情感、人事。据《凡例》，《正集》所收，为有裨于“经济学问”及可为“格物穷理之资”的作品，《外集》则为“劳人思妇，触景寄怀，哀怨穷愁，放言任达”之作。正外集的这种类次的安排，大体上是承袭唐以来的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类）和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之类）对文献和赋的内容的分类法，代表着帝王和知识广博的宫廷文人对文化（包括文学）内容先后主次的看法，惟划分正、外，则陈氏所创。（《古赋辨体》亦有外录，然是从体式着眼，不是从内容着眼）这种分法，可议之处颇多，其正外的区分欠当姑不论，以览古、寓言属正集，而以行旅、讽谕属外集，即很难自圆其说。但分类欠妥，并不妨碍它作为资料的价值。同时，也不妨碍我们利用它分类编辑的特点，作研究辞赋各类题材演进的参

考。

本书的主要成就是其中汇集了两汉以来大量的赋。陈元龙在《凡例》言其编辑的情况说：

“秦汉六朝及唐以前之赋，有梁《昭明文选》、《汉魏百三家集》、《修文御览》、《文苑英华》、《唐文粹》、《赋苑》六种书内所载甚多，咸为类次。其宋元止有《文鉴》《文类》二书。至明文未有专书。即近时所刻《赋钞》《赋格》《赋楷》等书，殊未详备。此外散见杂出者不少。今从各人文集及别种书广加搜罗。就臣见闻所及，诚恐缺漏正多。至所采之原本，每有缺字误字，若有他本可较，从其善者从之。其他无本可较者，不敢以臆见增损改易，谨遵古人缺疑之义，仍依原文誊写，以俟参考。”

从这段文字来看，他的采集是勤的，态度也是审慎的。其搜罗之富，尤为他所提到的《历代赋钞》《历朝赋格》《历朝赋楷》等所不可比拟。但是，陈氏编纂此书时，清廷“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搜集未备”。（康熙语）其所见书不是很多，故其名虽为《赋汇》。实则所收并不完备，只能看成是一部大型的“赋钞”。这一点，我们只要将此书中所收唐以前赋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董浩、阮元等辑的《全唐文》相较即可了然。而此书所收唐以前的赋还是较完备的，宋以后的遗漏就较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皇帝敕撰各书例加赞扬，不予批评，于此书则只言：“二千年体物之作散在艺林者，耳目所及，亦约略备焉”。用词极有分寸，殆为定评。

然自今观之，唐以前的赋，虽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全唐文》可供

研究者取资；自宋迄明，则尚散在艺林。且陈氏所见明人之书，颇有今所不得见者，故此书的价值仍不能低估，特别是对研究明代的赋，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不容忽视。

但陈氏在康、雍间，虽久司文翰，颇负文名，而于学术非深有造诣。且其时考证之学未盛，整理文献的义例，尚不为人们所熟习和注意。故他在纂集此书时虽意存谨慎，除搜罗未备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疏失。本书所收作品以题上有赋字者为限，未标明者则虽为赋体亦不录，即为缺陷之一。然这尚不失为一种省事而审慎的办法，可以不论。另有一些疏失则给我们在使用此书时造成困难，现就我所见到的略举如下：

1. 本书所收各赋，例不注明出处，除少数篇章外，亦不注明异文，与严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相较，优劣自见。（尽管严辑在这方面仍有缺点）特别是先唐诸赋，采自《艺文类聚》《御览》等类书者不少，此类多非全篇，而本书多作全篇收入；唐以后此类问题较少，然《补遗》卷五所收明桑悦《北都》《南都》两赋亦非全篇。

2. 本书所标作者姓名及所属朝代多有讹误。《正集》卷一《天象赋》为隋李播作，误为汉张衡。卷七《飓风赋》宋苏过作，误为其父苏轼。卷三九《武关赋》唐王桀作，误为王启（此处可能为刻印之误），卷四七《郊祀赋》东汉邓耽作，误为陈邓耽。卷八八《鲸鱼灯赋》晋殷巨作，误为魏殷臣；卷九八《奇布赋》同。卷一〇八《露台遗基赋》唐孙樵作，误为元孙樵。卷一〇九《太白楼赋》元张夔作，误为宋张夔。

卷一一〇《三公山下祠赋》两篇，一署魏孙该作，一署晋扬该作，两篇实为一篇，均孙该作。卷一一一《鸚鵡洲赋》宋罗愿作。愿字端良，陈氏误署为罗愿端。卷一三二《鸡子赋》涂几作，几为明人，此书收其赋数篇均误为元人。《外集》卷四《悼骚赋》东汉梁敬叔作，误署为陈人。卷十《远游赋》明袁袞作，误为袁袞（此处亦可能为刻印之误），卷一七《离忧赋》宋刘敞作，误为梅尧臣。《补遗》卷一一《亭山赋》北魏姜质作，误为王质。卷一二《珠赋》宋崔伯易作，误宋为唐。（另收崔伯易《感山赋》不误，此处或系笔误。）此外，尚有一人而用二名者，如温岐即温庭筠，本书《正集》卷九九《锦鞋赋》署温庭筠，卷一一七《再生桧赋》署温岐。

3. 本书所收赋有的显系伪作，有的出处待考，亦难征信，陈氏既不注明，更不加以考辨。如《外集》卷一五《楼东赋》，署唐江采蘋作，出小说《梅妃传》，江采蘋即所谓唐玄宗之梅妃。然考唐人纪载，玄宗之妃并无其人，此小说盖南宋人所作（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赋亦当为宋所假托。《正集》卷一二四收唐宋璟《梅花赋》又收李纲同题之作，然李赋序明言“广平之赋今阙”，是宋璟之赋南北宋之际已不存。《赋汇》所录，为明杨慎所传，其文乃袭李赋而稍加变换，显系伪作。（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纲《梁溪集提要》）此外本书还录了宋张镜《观象赋》，宋王徽《咏赋》，均不见唐宋以前的古籍。《咏赋》出明人刘节编《广文选》；《观象赋》未详所出，《隋书·经籍志》有《观象赋》一卷，不著撰人，不能断定即此赋。这两赋盖均可疑，故严辑《全宋文》均不收，又张

镜乃南朝宋人，本书以为陈人，亦误。《渊鉴类函》引此赋作宋张镜。

4. 本书所收赋有缺作者姓名者，有缺作者所属朝代者。作者缺名之赋大都采自《文苑英华》，该书作者缺名有为承前篇而省者，陈氏概从盖缺，尚属审慎，不可轻议。《补遗》卷五《蜀都赋》署明缺名作，《明史·艺文志》著录范榭明有《蜀都赋》一卷，疑此赋即范氏作。亦难遽定。至于缺朝代者确有属于无从考证或难以考证的可存疑；然亦有因失检而疏漏的，如《正集》卷九五《声赋》之作者张德升，乃唐人，见《文苑英华》，而本书缺载；又《金山赋》《焦山赋》《北固山赋》之作者盛恩，虽声名不著，然《金山赋》中有“英庙巽申而晋锡，武皇驻蹕而来临”之句，英庙谓明英宗，武皇谓明武宗，则作者当为明人无疑。陈氏大概未读本文，故从缺，这就太疏忽了。

5. 本书所收赋有误分一篇为二篇者，前已指出，此外还有全篇前面已载，后复另易篇名收其片断为“逸句”者。如高似孙《松江蟹舍赋》已见《外集》卷十三，《补遗》卷十七复收《蟹赋》逸句，实即前篇之文，此类当是抄录来源不同，又失于检点，故有此误。

但以上诸失，尚可以说是局部的，有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有的则还可能是刻印之误（顺便说一下，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影印重版时，将分集目录抽出，重编总目录，这于读者有方便，然作者姓名出现了新错误，以非原书所有，不具列）。而最令人不解的则是：

1. 陈氏在《凡例》中提到了一些他曾加采录的文献，还讥诮当时一些赋的选集采录不周。然而这些书中所收之赋，他却

遗漏不少，甚至有些著名的篇章也失收。如《唐文粹》中孙樵的《大明宫赋》、何讽的《梦渴赋》，《宋文鉴》中秦观的《黄楼赋》，即均未收。赵维烈《历代赋钞》所收明人赋，陈氏遗落者亦有九篇之多。

2. 有些名家文集，当时很易找到，陈氏不容不见，然遗漏者不少。如刘基《诚意伯文集》有赋八篇（不包括骚辞，下举各家同），陈氏仅录四篇；李梦阳《空同集》有赋三十五篇，陈氏仅录六篇；何景明《大复集》有赋二十二篇，陈氏仅收十二篇；欧阳修《欧阳文忠集》有赋二十一篇，陈氏仅收十五篇；苏轼《东坡内外集》有赋二十三篇（不包括应试的律赋），陈氏仅收十七篇（内律赋三篇）……等。

这类遗漏，是有意剔除还是无意的疏忽，已难断定。我们推测：有的可能是出于政治思想上的考虑，如孙樵的《大明宫

赋》，大概是因其对统治者的抨击太露骨而见遗；晚明某些作者如陈子龙、夏完淳等，其赋牵涉满洲贵族者多未录，当更出于这种考虑。但通观全书所收，对政治黑暗批判颇为尖锐者尚不少，即涉及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斗争者，亦不一概摈斥。则造成遗漏，主要当是由于疏忽，有的赋也可能由于归类困难，遂弃而不收。

总之，本书汇集了自宋玉至明的大部分赋，明代部分尤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至今仍是研究赋的一种必备的基本资料书。但我们在使用时必须考虑其不足之处和缺点，而不能仅仅依靠它来对各代和各个作家在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作出判断。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辨正

陈 伟

关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内涵以及经济效益同政治效益、精神效益之间的联系，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不同见解，而其中有些观点确实需要进一步推敲或完善。为此，我乐于和大家一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早在50年代后期，我国理论界曾经出现过对经济效果的讨论热潮；60年代初又有人首次使用了经济效益的概念；到了80年代初，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由对经济效果的讨论到对经济效益的普遍重视，标志着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的轨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经济效益以及它同其它社会效益的关系已经认识得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有的同志往往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立起来。似乎经济效益不是一种社会效益（或者说不具有社会效益的属性），经济效益同其它的社会效益不能并存，倘若追求经济效益，就极易忽视社会效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它不仅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效益的实质，而且人为地将经济效益排斥于社会效益之外，这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本义的。

大家知道，所谓经济效益，是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之比，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对经济活动实效的评价。它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节约投入；二是在节约投入的基础上尽量增加产出；三是生产出的产品要符合社会需要。三者是内在的结合，缺一不可，其中“产品要符合社会需要”系经济效益内涵的核心。因为只有按照社会需要将社会劳动合理地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才可能避免无效劳动，节约劳动时间，以较少的生产费用获得较多的效用。否则，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劳动成果的增加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根据经济效益的涵义，它实质上要达到几个统一：

第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应体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人所共知，任何一种商品经济活动都不能脱离社会需要去实现经济利益（诚然，实现的形式可分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只有当商品生产者生产出合乎社会需要、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如果一味追求商品的价值，就有可能由于这些产品不为社会所需要而致使付出的劳动完全白费；反过来，若果无视用较少的劳动取得较多的成果，经济效益也无法体现出

来。因此，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高度统一，是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

第二，经济效益体现了利益性和有用性的统一。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都是某种物质利益关系。因此，“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晶，经济效益的实现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实现程度息息相关，它甚至关系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因而这个经济范畴的特点之一，就是利益性。据此，有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效益实际上是经济得益或经济利益，追求经济效益亦即追求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经济效益不仅强调要通过节约劳动时间使经济活动者获得尽量多的经济利益或经济收益，而且尤其突出强调经济成果必须具备有用性即符合社会需要这一方面。也就是说，经济效益不仅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实质，而且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为此，如果只看是否“有利可图”，而不问经济活动是否切合社会需要以及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是违背经济效益本义的。总之，将经济成果的利益性和有用性融为一体，是经济效益的显著特征。

第三，经济效益体现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一般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从一方面看，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和相应的物质手段来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和成效，对这种关

系，经济效益是借助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对比关系表现出来的，因而其内涵具有经济性的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还反映了人们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个人单独进行的，为了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人们必然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其经济活动互相影响，各自的经济效益对社会也就产生程度不同的和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关系和作用，经济效益通过劳动成果与社会需要的对比关系加以概括反映，这种反映往往比经济性的意义更丰富、更广泛、更有扩展性，因而富有社会性的实质。可见，不能从纯经济角度评判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其经济性越是合理，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往往就越大。

第四，经济效益体现了具体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多元化、多渠道的，因而对经济效益的考察就不能局限于生产领域，而应贯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此外，不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存在经济效益问题，而且非生产部门也存在经济效益问题。这些效益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于是，作为透视经济活动的一个“缩影”，经济效益是应具有综合性的特征的。但是，仅靠综合经济效益难以精确地反映经济效益，因为各项经济活动的性质和构成经济效益的成因相当复杂且存在差别，这就需要用单项或具体的指标来反映不同质的经济效益。只有将经济效益的综合性和具体性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准确地衡量经济活动者的效益。

概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一）劳动成果符合社会需要是经济效益

的精髓。应该明确，经济效益中的“社会需要”是有特定涵义的，是指经济活动有益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需要。换言之，如果某种产品旨在满足畸形的社会需要或迎合落后的社会消费心理，即使能够一时倾销攫利，却不能视为符合社会需要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道理很简单，这种以妨碍社会进步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劳动和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谈不上有什么经济效益，充其量只可看作经济的负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讲求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社会性，是经济效益的题中之义以及最基本的要求，因而经济效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效益。（二）从实现经济效益的目的、手段、方式、后果看，均打下了鲜明的社会印记，如果用纯经济的观念把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的“家族”中排除出去，是欠妥的。即使经济效益与其它社会效益诸如政治效益、精神效益、生态效益等产生矛盾，亦只是属于社会效益内部的问题，应通过协调社会效益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加以解决，而把经济效益作为“异己的力量”从社会效益之中排除出去，或人为地对立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容易造成混乱。（三）再从经济效益的本义看，将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对立起来，会产生逻辑上的困惑。如果将某些唯利是图的经济活动批评为“只顾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效益”，这就好比说“这些活动只注重通过节约劳动消耗来增加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而不顾社会效益”。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四）不能混淆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经济范畴，经济利益与经济效益虽然都反映了经济活动

者对实体性利益的追求，但是两者又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要指的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动因和受益，是主要就生产者本身说的；后者则在肯定经济活动者本身收益的同时，更突出地强调经济效益符合社会需要的有用性。可见，不要将经济效益与经济利益混为一谈，更不要把某些人和某些单位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的行为，简单化地归咎于是由于追求经济效益。

基于这些认识，应该坚持这样的观点：经济效益是一种社会效益，追求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题中之义。

再说到社会效益，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概念。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似乎不那么清晰，因而实际运用起来也就出现一些混乱：有的人时而承认经济效益是社会“合力”的结果，时而又把它从社会效益之中“驱逐”出去；有的同志一方面承认只有社会效益才是“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又把政治效益作为社会总体效益的化身，置于其它所有的效益之上，如此等等。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对社会效益及其内在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成熟，需要加强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就一般而言，社会效益是指一定条件下社会活动的总效益以及这种活动运行状况和协调程度的综合反映。

然而，仅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事实上，人们对社会效益的考察和评价往往采用不同的视角。因此，社会效益大体上应包括三种含义：第一，指某种社会形态或某个社会大系统的社会活动的整体效益，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效益、资本主

义社会的社会效益，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效益等，这是宏观的社会效益，它囊括所有的效益。第二，是指社会活动中具体的、专门的社会效益，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军事效益、精神效益、科学技术效益、人类生态环境效益、卫生效益等等，这是中观的社会效益。第三，某个社会单元参与社会活动所形成的效益，如某个企业、某一社会团体的效益，这是微观的社会效益。

这三种含义的社会效益概念，最为流行的是第一种；而对于后两种，人们有时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加以运用，容易被忽视。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已经有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精神效益等包容性很强、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为什么还要使用中观社会效益、微观社会效益这些概念呢？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活动有别于其他动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性。于是，要把握人类一切活动的本质，不但要认识其“自然质”，更重要的是揭示其“社会质”。因而，分别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精神文明学的角度去考察人类活动（劳动）与效益的关系，其认识和结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需要有不同的方法去研究效益问题。明白这一点，就不难解开上面这个疑团了。

那么，面对含义如此丰富的社会效益

概念，运用起来会不会造成思维的混乱呢？

我们认为，关于社会效益三种含义的界限，虽然具有相对性，存在“亦此亦彼”的情况，但是有两点必须明确，对同一思维对象，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无论哪一种含义都应有确定性，不是主观随意的；其次，无论哪个层次或哪种含义的社会效益，其社会性的实质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各自包含的“系统质”以及内在关系有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不同的社会效益序列、层次和形成不同的社会效益功能，并使不同系统质的社会效益相互区别开来。明确这两点，不仅可以防止对社会效益含义理解的混乱，而且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一是注意到社会效益的普遍性、多样性，防止把社会效益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得很抽象或极其狭窄；二是不会忽视社会效益特定含义的规定性、客观性，防止任意变换角度来运用不同层次的社会效益标准；三是不至于忽略社会效益的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孤立地看待社会效益大系统内部诸要素、各层次的关系；四是有助于树立辩证思维的眼光，准确地分析、判别社会效益内部主从关系的界定和变化发展，以免犯简单化或绝对化的错误。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英

“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

程家明

《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导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对此我有所启发，但不敢苟同，特提出一些看法与之商榷。

姜建强同志的立论依据之一是：“应用哲学”取消了哲学思维的特点。这一论据，至少包含五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特点、什么是“应用哲学”、什么是“应用哲学”的特点和“应用哲学”是否取消了哲学的特点等，对这些问题，我与姜建强同志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在姜建强同志看来，哲学“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与最高抽象”，如老子的哲学，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因此，他认为哲学的本质特点是反思。从姜建强同志对“应用哲学”的批评中可看出他对“应用哲学”的界定——不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和最高抽象，不具备反思的特点。同时，“应用哲学”还取消了哲学的本质特点，是“无哲学”。

其实，哲学是一门历史的发展着的科学，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人把它理解为聪明学、明白学，有人把它理解为各门科学的总汇，是科学的科学，有人把它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今天谈哲学，应以今天人们

对于哲学的理解为依据，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其本质特点是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这种反思，既包括对思想过程和规律的探索，也包括对思想规律所由产生的客观对象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一门有着内在联系、层次相依的学科系统；其中既包括基础理论部分，也包括应用理论部分。“应用哲学”属于应用理论部分，其本质和特点，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反思。就拿姜建强同志赞为真正哲学的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来说，毕达哥拉斯不就是对数学这一具体科学进行哲学反思，从中抽象出“数”这个概念作为世界的本质吗？这与姜建强同志极不赞成的“技术哲学”、“管理哲学”等也是对某一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就是真正哲学的开端，而这些“应用哲学”就“取消了反思，取消了哲学”呢？当然，有些“应用哲学”的学科，由于初创阶段或其他原因，的确存在姜建强同志所批评的“把具体的科学随意戴上哲学帽子，用具体科学的思维特点代替哲学的思维特点”的现象，这是应该努力避免和克服的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的“应用哲学”的学科存在发展中的缺点，就否定它的本质特点以至于取消它存

在的权力。这是不利于我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的。

姜建强同志的第二个论据是：“应用哲学”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化了。这个论据难以成立的原因就出在对现实的片面理解上。在姜建强同志的眼中，哲学所面对的现实，是“永恒的现实”，“当下的那个现实”是不包括在其中的。

这种理解，就使得现实被片面的抽象而变成虚无。因为“永恒的现实”必须寓于“当下的那个现实”之中，由无数“当下的那个现实”展示出来，才成其为真实的现实的。没有“当下的那个现实”，“永恒的现实”是抽象的虚无。哲学与这种虚无的现实不存在什么关系。当然，报导中介绍了姜建强同志这样的观点，认为站在现实生活之上把握时代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与现实的本质所在。看来，姜建强同志是不反对哲学与“当下的那个现实”发生关系的。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赞成姜建强同志的观点，站在现实生活上去把握时代精神。这也是“应用哲学”处理自己与现实的关系的原则。“应用哲学”并没有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化。那种对现实政策和形势的图解，把自然科学的成果随便戴上哲学的帽子的做法，正是“应用哲学”所要反对的。那种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并不是“应用哲学”本身的罪过，而是某些从事“应用哲学”研究的人所造成的一种不良现象。这恰恰说明了“应用哲学”发展的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应用哲学”已处于长足发展之日。美国、欧洲等，都有众多的“应用哲学”杂志。如美国的《哲学与

文化》杂志、加拿大的《社会科学的哲学》杂志、英国的《应用哲学》杂志、法国的《形而上学与道德》、苏联的《哲学问题》、《科技与新生活事物》（哲学类）。瑞士向被世界公认为最崇尚抽象思维的德意志民族也用德文出了一份纯属“应用哲学”的杂志：《情报哲学》。此外，日本的《哲学杂志》也经常刊登“应用哲学”的文章。而且，国外“应用哲学”的学科发展门类齐全，不仅有被姜建强同志斥之为“无哲学”的“技术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人才哲学”，而且还有“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等等，为哲学基础理论穿透现实生活，引导社会发展，使哲学反思的思维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使得欧美人改造现实生活的实践具有极浓的理性指导的色彩。与此相比，我国“应用哲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需要的是热情的扶持和保护，而不是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以致于使得哲学缺乏通向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而造成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冷漠、现实生活发出“哲学贫困”的抱怨。事实上，一个从事社会改革巨大系统工程的国家，如果缺乏整体的宏观思路，不能从哲学的高度结合中国国情对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探索，便会导致社会的短期行为，政策的自相矛盾，措施的软化和漏洞，思想的片面与混乱。面临这样的现实，对“应用哲学”持批评态度的同志，难道不应该深思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广东“流民”问题突出，学者提出治理对策

本刊记者雷比瑞报导：继去年春节几十万人的盲流浪潮之后，去年7、8月份广州火车站又挤满了各地南下的民工。于是交通、公安、劳动、粮食乃至计划生育诸线频频告急。据省公安部门统计，到1988年底止，广东的暂住人口已达500多万（尚不包括未经登记的外来人口）。全省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镇村企业共有从业人员650万，而其中就有50%属外来人口，无疑，这样庞大的流民队伍对广东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流民带来的副作用，且看如下数据：

公安方面：1988年全省发案数中的40%为外来流民所为。

计划生育方面：全省近2/3地、市、县、乡无流民管理机构，大多数流民的临时居住地成了计划生育的“防空洞”。据广州市有关部门统计，每100个计划外超生者中就有40个是外来流民。

工商管理方面：每年各地均有一些区乡政府凭借行政手段到工商部门拿执照，然后租借给外来流民，人为地造成管理的困难。

粮食方面：广东属缺粮省份，在外来流民的冲击下，全省每年的粮食缺口都在21亿斤以上。

商业方面：全省购买力按银行框算，1988年净流入达86亿元人民币，占全省零售总额的13.5%，外来购买力对广东冲击最大的主要是猪肉和蔬菜。广州市1987年日供应蔬菜达200万斤，1988年则上升到300万斤；猪肉每年上市量2000多万担，其中1/4要到省外组织货源。

交通方面：去年以来广州火车站每天的客流量均逾10万人，高峰期滞留人员高达5万多。为了疏散滞留人员，广州仅流花地区开往各地的汽车就达1000多辆（春节前后）。而又由于大量流民的南下也使得广东的货运受到影响。

此外还有供电、供水、日常消费、环境卫生等问题。

流民如此汹涌南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情况下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趋势的严峻化，严格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数量变化问题，更是一

个结构性变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是流民产生的重要的宏观背景。具体说来，广东流民问题突起的主要原因有：（1）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低下以及城市制造业对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偏低，是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2）农村中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流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农民的流动风险不大甚至无风险可言。这是在制度上给流民以鼓励。（3）产业间的比较利益使然。由于价差引起的产业利益分配不均，加之城市社会福利生活与农村生活相差甚远，客观上也鼓励了农民的流动。（4）农业中农作物生产的间歇性、季节性使得农民在农闲时流动的机会增大。（5）广东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为全国最为开放的地带，三来一补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较多，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加之劳动力成本较高，流民们只要出比流入地略低些的劳动力价格，就可谋得一份工做，且得到比流出地高得多的收入，何乐而不为？（6）外来流民相对比当地农民素质高些，尤其比广东山区的农民素质高，且成本低，雇主均乐意雇佣这些人。

如何解决广东流民问题，广东理论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各省财政包干、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宜先行解决本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因此主张限制省外流民的流入，把本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为扶贫、支援山区的重要措施。他们认为，对省外流民不纯粹是管理的问题，而主要是控制的问题。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作用无国界、省界而言。既要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要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外省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广东的）素质相对就是比本省山区的农村劳动力素质要高些，只顾眼前本省局部利益而不顾全省社会宏观经济效益，是否可行，值得研究。他们认为，流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合理的。问题是怎样加强管理，对流民的结构、素质、流入方式、流速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并把它纳入正常的商品经济运行轨道上来。

广东有关部门的具体意见是：

(1) 建立公安、工商、计生、劳动、粮食等部门协同作战的综合管理系统。系统内部要分工明确，职责分明，打破那种多家收费一家管理的混乱局面。

(2) 要配套。价格、税收、立法要跟上，尽量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使比较利益差相对缩

小些。

(3) 短期内可采取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措施，如对弃农进城者征收土地税，征收城市土地及公用设施使用税等。当然，这个措施最好是全国一盘棋，各省一起来协同实施。

(4) 在劳动力基本条件大致相等的情况下为顾全本省利益，应优先招收本地工。

转变观念，更新方法，扩大视野

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新特点

本刊通讯员冼剑民报导：

当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一般总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能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经验教训，使其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所以广东社会经济史这一原来有着良好基础的研究领域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更加繁荣。除近年来陆续发表的学术成果外，去年秋“广东社会经济史暨电白县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又云集了广东、香港两地的一批成果，这些论文重点研究明清之广东社会经济，有的还下溯本世纪初叶，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又一次荟萃。

这些论文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研究领域、对象大为扩展，角度、层次上亦有新的突破，使地方经济史研究向着系统化、立体化迈进。从横向分支来看，水运史、外贸史、造船史、农桑业史、陆路交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等课题百花齐放；从学科的综合交叉来看，则有政治史与经济史、方志史与经济史、文化史与经济史、科技史与经济史等方面的互相交叉和结合。例如叶显恩的《明清水运组织与地缘关系》、黄启臣的《元代广州外贸》、罗一星的《清代前期广东造船业》、蒋祖缘的《明初惩贪倡廉的吏治与广东社会经济发展》、邓端本《试论明清时期粤人重商思想》、连浩鏊（香港）的《三十年代广东南路的土地利用与农业概况》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点。

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深入乡野，广泛收集、调查民间史料，为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例如，刘志伟、戴和、陈春声等深入番禺县沙湾镇进行了数月的社会经济史调查，广搜各类乡间口碑素材和散落文献、实物，整理研究后写出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再认识——沙湾调查综合报告》，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该论文不仅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史提出了新的认识，而且，在治史观念上有新的飞跃：他们认为，口碑资料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事实真伪，而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他们从沙湾市场区域与社会文化区域间的不吻合，提出了政治中心与财富积累中心不一定是区域市场中心的新论点，从而对以往“以经济理论来考察社会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法提出了质疑。罗一星、陈忠烈的芦苞田野考察，则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要写出社会组织下的经济史，要表现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样以新颖的治史观念引人瞩目。此外，一些地方志学者还对本县社会经济史作了专门考察，试图填补县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从这次会议以及这些论文所反映出来的新特点，我们可以预想，不独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会更趋活跃和繁荣，而且可能会为整个史学研究怎样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子。

“小太阳”如何升起？

——顺德县乐从镇旅行袋厂艰苦创业记

本刊记者 石 成

学生书包，平常又平常的小商品，人人用过，人人都不会留意。然而，今天竟有一种书包，成了上百万、上千万少年儿童宠物，并且，也成了无数做家长的大人们所瞩目的新鲜货，这就是“小太阳”书包，一种新型的学生保健书包。它的名字很别致，还很有内涵，就象每一个祖国的小太阳们一样，受人爱，受人宠，给人以欢悦和希望。它是两年前诞生的，出自一间很不知名的乡间小工厂，但它飞起来了，飞进了城乡大大小小的学校和家庭，飞入了各地知名商店的货架，还飞出了国界，远销五大洲四大洋。“小太阳”两岁成名，一举天下知。大家都知道有个“小太阳”，却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娘家——顺德县乐从镇旅行袋厂。

“小太阳”如何升起来？我们带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这间仅有300余人的镇办小企业。接待我们的厂长邓继冲，二十七岁，是个挺有“信息量”的采访对象。

邓厂长告诉我们，这间厂是1981年办起来的，当时，无非是为了解决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投资小，规模小，产品也小，几十个人，几十台缝纫机，做各种各样的手提袋、行李袋，一年产值十万八万，富不起来，但总算是让几十个人有碗饭吃。但到了80年代中期，便感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压力。首先，珠江三角洲镇乡工业的蓬勃兴起，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仅顺德县，各乡镇办起的手提袋厂、旅行包厂等类的工厂便不下20家。市场越来越挤，消费风气的变化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一种款式，往往只是时髦几个月，况且，旅行包、手提袋热了两三年，市场便

趋于冷落。其次，同类企业中，“三来一补”和港商独资厂的资金、设备、技术、工艺、管理水平有较大的优势，外销市场方面更具优势，这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再次，对于原来底子较薄，人员素质、技术工艺方面力量不足的乐从镇旅行袋厂，产品更新率不高，就更难以适应竞争的浪潮。因此，邓厂长用一句话比喻，“我们就象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时可能被排浪吞没。”

但乐从镇旅行袋厂的干部、职工不甘被竞争的压力压跨，他们意识到危机，但不屈服于危机的压力，他们以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决心去开拓新的出路。他们分析了形势，作出决策选择：一是以艰苦创业的精神为立厂之本，300个人一条心；二是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尽快研制新产品，以我有人无的新产品，抢先占领新的市场领域；三是大搞科学技术开发，以产品的科学工艺水平，优质实用，新颖多样化方面创出名牌，打出拳头产品；四是以科学管理出效益，全面推行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技术攻关，并大力引进智力和人才，增强企业的技术力量。正是在上述决策思想的指导下，他们选定了研制开发学生保健书包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从经营、产品到销售市场的全面转轨更新。

他们听说深圳的关令华医师创造了一种新型保健书包，于是积极引进关医师的科研成果，并反复研究了当今学生书包的各种功能、特点和利弊，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比较了上千种书包，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出有利于青少年身体骨骼成长、方便、美观、耐用的“小太阳”书包。这种书包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科学性，它结合

了人体骨骼力学和学生活动特点，靠书包后背板，使负重均匀分散，与青少年背部生理弧度自然适应，使学生在使用时始终能保持自然挺胸的良好姿态。它的问世，解决了普通书包存在的力学结构不合理，负重时背部受力不匀，常斜压学生腰背部，使学生使用时常出现“驼背”姿态，影响青少年身体健康发育的问题。经多位高级专家鉴定，认为是“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健康发育”的书包，填补了空白，在国内尚属首创。“小太阳”书包的问世，一下子便获得教师、家长、学生的欢迎，经两年多的大批量使用，反复跟踪反馈，认为确是新型实用，效果良好，质量稳定。据市场调查结果，售出70万个中仅5个质量有问题。1988年被评为广东省第三届儿童用品优秀新产品奖及

最受儿童喜爱的儿童用品奖。目前，乐从旅行袋厂已将“小太阳”书包的生产规模扩大至年产70—100万个，但仍供不应求，仅1990年便已订货600万个。整个企业也由此步上新的台阶。1988年，上交国家税收80万元，是建厂初期的3万元的20倍。工厂的条件和职工的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邓厂长说，我们目前要不断防止自满，继续保持艰苦创业的精神，进一步树立顾客至上，用户第一的思想，力争多创新款式、新品种，为国家、集体多作贡献。

“小太阳”如何升起来？我想，大家或许会从邓厂长的上述话中找到答案的。

※

※

※

（接109页）

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寻找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过渡的经济成长的新增长点”；“选择有利的市场区隔，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相对集中战略资源，形成战略优势”；“以县经济为主导，自上而下牵引起飞”，“培育新的产业组织制度”等对策意见，都是很有启发的。

战略研究和决策是一个空间跨度大、时间区间长的系统决策工程，需要集中群体智慧。德庆县县委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方法，动员县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直接参加了这项研究工作，并且广泛邀请省内各方面专家学者、领导干

部共同研究，集思广益。这项成果的主要负责人梁桂全、郑炎潮、张硕城、甘少聪均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所做的选择，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是有启迪的。

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德庆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免不了存在若干不足。况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发展战略还须不断地充实、完善甚至作出必要的修正，那也是必然的。

* 此书已于1989年9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市场疲软：促销渡淡的几点做法

——佛山市企业调查

梁灿荣 黄海宁

去年下半年以来，不少工业企业资金短缺，成本上升，加上市场销售疲软，导致了产品大量积压，而不得不放慢了生产速度，甚至停产或半停产。据我们去年9月份对佛山1380户工业企业书面调查，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已达478家，占被调查企业的34.6%。所以说，拓展市场，促产促销，已成为工业企业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的重要问题。对此，佛山市企业分别采取了如下做法：

一、拓展国内市场，进一步搞活营销

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我国已初步改变了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问题，但短缺经济的市场并没有改变，而且近来工业发展速度回落过猛，有效供给相应减少，还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个矛盾。因此，切不可把市场销售的一时疲弱误认为是生产过剩，一哄而下，造成生产的大起大落。

其次，要积极开拓市场。目前全国居民结存购买力6000多亿元。佛山市的人均储蓄额也达3000元。而且从佛山市积压的几十亿元工业品中，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市场，主要是市场开拓不足，流通渠道因资金短缺而不畅。另外，社会预期心理造成市民蓄币待购，降低购买欲望。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和调整营销策略，建立多层次的销售渠道，树立全方位的市场观念，通过拓展市场，带动生产的发展。如去年下半年，顺德县神州燃气具实业公司由厂长带队到10多个省市推销产品，仅半个月就把积压的2.8万台燃气热水器销售一空。

第三，实行工商联合营销。工业企业要把流通部门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推广1986年工商联

合让利销售的经验，“引厂进店”，实行联销展销，代销赊销。去年以来，佛山市内的50多家生产企业到佛山市兴华商场设置专柜展销商品70多次，成交金额1720万元，交由该店代销产品1600多万元。

第四，加强供销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人员的积极性，解决好供销人员存在的“三怕”（怕负政治责任，怕担经济风险，怕个人经济负担增大）的思想，教育他们树立“三千”（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推销产品的精神。对于过去行之有效的推销措施，只要是不违法的，都应继续执行。为了鼓励多销、快销，可推行供销人员把销售额、货款回笼与销售人员的收入和销售费用挂钩包干的办法。

二、转向变型，从国际市场寻求出路

去年国内市场相对疲弱，但国际市场则比较稳定。凡是外向型的企业，日子就比较过好。据对以出口为主的223家纺织服装企业调查，去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加了75%，能保持正常生产的企业占85%，利润保持增长的占55%。沿海城市资源一般比较缺乏，劳动力价格高，如过分依赖国内市场，削价竞争不但于己不利，也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相悖。因此，沿海地区工业企业必须尽快转向变型。转向，就是要从偏重于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向以海外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转变，逐步实现资金、原材料、产品市场“三头在外”，“大进大出”。例如，南海飞行家用电器集团公司积极扩大产品出口，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去年1—10月份共出口风扇50.56万台，创汇750多万美元，比前年同期增长28.6%，税利增长38.76%。变型，就是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从纯产

销型向产销、加工型转变。如佛山市无线电五厂在去年国家开征彩电消费税和国产化基金后一度积压彩电2万多台，处于半停产状态，后转为外商来料加工彩电出口，生产已基本正常。目前，佛山的出口产品90%是销往港澳地区，今后要在巩固扩大对港澳出口的同时，大力发展远洋市场，并开发对苏联、东欧、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据调查，顺德、南海县在黑龙江开展了对苏贸易，市属一些企业在广西与越南开展边境贸易已经取得了新的突破。因此，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是完全可能的。

三、调整结构，以高、新、优产品获取市场的优势，最终是产品的优势。前几年，在需求过旺的经济环境下，佛山市有相当部分企业“跟着感觉走”，产品仿制的多，创新的少，大路货的多，具有特色的少，但由于当时供求紧张，这些矛盾一度被掩盖起来。目前市场疲滞，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此，必须加快产品结构调整，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促使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以“高”、“新”、“优”的产品取得市场的优势。

大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以高附加值取胜。佛山市是加工型工业城市，资源缺乏，但有利的是利用外资引进了大批先进设备技术，企业的装备一般比内地的领先3—5年。鉴此，佛山产品结构调整应向工艺新技术难度高，用料较少，附加值大，单位原料创汇高的产品转变，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佛山市光电器材厂以生产薄膜按键开关、发光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主，产品畅销国内外，去年1—11月产值比前年同期增长30%，创汇比前年同期翻了一番，与一些不景气的企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取胜。在治理整顿，提倡过紧日子的情况下，更必须大力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价廉赢得市场。佛山市陶瓷工贸集团公司把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优化产品结构的

突破口，在去年11月全国陶瓷产品行检行评中，共有14个产品获A级产品称号，占全国参评产品的23%。因此，在压缩基建，建筑陶瓷需求量锐减的情况下，该公司去年1—10月的销售和实现税利仍比前年同期增长32%和19%。

四、加强管理、提高效益

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迫使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去年以来，多年形成的卖方市场已转化为买方市场，优胜劣汰十分突出。因此，眼睛向内，强化各项管理，切实提高企业的素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大力开展“双革双新”，提高企业的技术素质。目前，佛山市工业企业具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设备已占40%，这为产品的升级换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应把立足点转移到内涵扩大再生产上来，通过消化吸收，技术改造，改革工艺设备，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要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降低生产成本。去年，佛山市华侨造纸厂通过落实各项经济责任制，发动职工开展挖潜降耗活动，各项物耗水平均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年度利润计划。

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佛山市现有国家二级企业27户，省级先进企业130户，但整体上看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还较低，在经济紧缩，市场疲弱的劣境中，生存发展能力还不太强。因此，要抓住时机，及时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从管理到职工素质等诸方面尽快有所改观，从而提高企业抗风浪、渡难关的能力。例如，佛山市温控器厂抓住当前家电产品滞销，部分车间较空闲的间隙，完善各级岗位责任制和经营管理制度，组织职工进行岗位培训，提高工人的业务技术水平，改变了产品质量不够稳定的状况。

作者单位：佛山市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周华

一部新颖的断代社会经济史

——《明清经济史》评介

黄启臣

李龙潜著《明清经济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国目前少有的第一部明清时期的断代社会经济史专书。李龙潜教授自五十年代始，在著名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的指导下，悉心攻读和刻苦钻研明清经济史。三十多年来，他不顾研究环境和条件的困顿，革路蓝缕，辛勤笔耕，勇于探索，一面搜集资料，一面作微观专题研究，发表了数十篇明清经济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从1982年开始编著本书，并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反复修改，于1987年完成付梓。全书共分为五章十七节五十四目，洋洋四十二万言。笔者读完本书认为，李著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变革辩证地考察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阐明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著者认为，明清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先进工具的推广使用”。（本书第20页，以下只注页数）。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除了继续使用宋元以来的犁、耙、铧、镰、锄、镢、耩、耨、水车

等十七种农具外，明中叶以降，在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出现了“木牛”代耕犁，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犁地机械，其效率比牛力提高一倍。正因为耕作农具的不断改进，大大促进耕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据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耕地面积为366,771,500亩，二十六年（1393）增至850,762,368亩，雍正十二年（1734）又增至890,138,724亩，道光十三年（1833）再增至911,976,606亩。^①同时，“深耕、熟耨”，精耕细作亦得以实践，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著者对水利工程也作了详尽的介绍。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统计，南北各省共开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堤岸5048处。接着用相当多的篇幅具体地叙述明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任命潘季训为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总理何漕，和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整治黄河以及乾隆年间整治卫河、子牙河、永定河、运河等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的技术如适时播种、施肥，复种轮作，适当密植、田间管理等也作了详细的

叙述。最后用文献资料证明明清时期兴修水利和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密切关系，使明代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96亿斤，清代增至2,320亿斤，^②比宋代的464亿斤分别增加百分之五十至四倍。这样，使读者具体地认识到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

著者还用了相当重的份量去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占有形态、封建剥削方式和劳动组织等。认为，在明清时期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土地占有形态分为官田与民田两大类。其中民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第43、321页）而“民田绝大部份为地主阶级所垄断”，“地主阶级……又可分为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第321页）说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明清时期主要的土地占有形态。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问题的错综复杂，皆根据于此。因而，著者对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地租和封建赋役制度进行深入的剖释，认为明清时期的租佃关系存在三种形式：“严格的隶属关系、从严格的隶属关系向单纯的纳租关系过渡、单纯的纳租关系。与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封建赋役制度，著者着力介绍了万历年间实施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年间“摊丁入亩”的改革的原因及其意义，指出推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明中叶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第187页）其意义是“废除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使赋役制度具有近代财产税的性质。同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398页）从而说明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

革息息相关的。

第二，注意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阐释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避免了就经济论经济的形而上学。

总览全书，著者在撰写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萧条、危机和衰落的演变过程时，总是先分析每个相应阶段明清政府所实行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的，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衰落无不与政策有关，因而在全书的架构上也打破了一般经济史书按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和赋税等块块安排的结构，而是把每个阶段的政治状态、政策、法令和农、工、商的兴衰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编写和论述，使读者获得一个鲜明的概念：那怕是在封建社会里，执政者所制订的政策正确与否，将会促进或阻滞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资料丰富而翔实，做到言必有据，据必足征。

三十多年来，著者一直注意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搜集和整理有关明清经济的史料，然后编写本书。我统计了一下，本书引用资料的注释共2,610条，95页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如果把引用的资料原文统计在内，估计占全书的五分之二左右。可谓丰富至极。所引文献资料包括马列著作、正史、政书、实录、会典、会要、方志、文集、笔记、诗歌、档案、族谱、家谱、专著、论文、外文等不下千种（部）。这样丰富的资料不仅是为本书的论述提供充足的论据，也为广大读者研究明清经济史提供了极大的参考方便。尤其可贵的是，著者对引用的史料还尽可能作了校勘和订证，去伪存真，并从中提出自己的发现和见解，纠正某些研究者引用

史料的舛误。

从上三方面所述，说明李著确实是一部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架构新颖，体系完整，纲目分明，详略适中，举要中肯的成功之作，值得高等院校历史系、经济系的师生以及从事历史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阅读参考。

当然，金无赤足。本书并非完美无缺。我感到美中不足之处是著者比较少注意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宏观来把握和考察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即少把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同世界各国社会经济作横向比较，使读者难以得到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居于世界何种地位的鲜明概念。十五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是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直接交往时期。从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乾隆中期（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各国中仍然是居领先地位的。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粮食亩产量一般达到354斤，^③最高为749斤（第201页），而此时西欧各国的粮食亩产却因战乱、灾荒和瘟疫的侵袭而不断下降，直到1820年（嘉庆

二十五年）英国的粮食亩产量只不过是188斤。^④生铁产量方面，明末已达到45,000吨，^⑤而英国在1625—1635年（天启五年至崇祯八年）只有26,000吨，^⑥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又下降为17,000吨^⑦。纺织业生产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丝织业占绝对优势不在话下。如果李著能加以比较撰述和分析，我想对于读者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历史地位和探索中国近代经济落伍的缘由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李著在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根据数据而编制的明清时期土地、人口、粮食产量、商船、赋税等十三个统计表格中，均缺少“指数”这一项在统计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使读者一时难以看出统计数字增长或递减的比率。这是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进行统计时往往疏忽的。其余由于忙中有失或印刷校对不慎而出现的字句笔误或缺漏亦时有发生。这些技术性的缺点纠正并不困难，完全相信本书在重版时会得到更正。尽管本书有些“小疵”，但并不掩其大醇。我完全同意汤明棧教授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内容翔实的好书。”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9—10页。

② 参阅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0页，按江苏、湖北、广东、广西四省平均数。

④ 格里格：《人口增长与农业变革》第36页。

⑤ 周世德：《我国冶炼钢铁的历史》，载《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2日。

⑥ 迪恩：《第一次工业革命》第103页。

⑦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17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 峰

开拓区域发展新领域

——读《德庆发展战略研究》。

何 湛 峰

近几年，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研究工作已迅速展开。仅广东来看，以县、市为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至少已有一二十项之多，但最终形成著作出版的毕竟不多。早两年，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曾出版过佛山市、南雄县的经验总结，是一个方面的可喜开端，而从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结合历史、现状，着重于未来发展趋势的综合性动态研究的专著，我认为，《德庆发展战略研究》可谓新的领域的尝试。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本18万字的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在某一方面的首创性。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礪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此书稿的审阅工作，他阅后兴奋地写下评语：“在我国，县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德庆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不仅对德庆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其它一些县研究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国家计委副主任、经济学家盛树仁审阅书稿后也作了充分肯定。广东省的一些负责同志和著名专家、学者更是认为，这项成果是广东省经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可喜收获。

县，从秦代至今，便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关键的单位层次。以县为特定的范围进行综合性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过去，我们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视野和触角，极少涉及到这个领域，开放改革的要求，把它们推到了这块处女地上，但开垦工作，仅仅是开端而已，因此，《德庆发展战略研究》的出版，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它对于理论的应用化，对于基层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均有大益。我国有2000多个县，我想，这方面的研究的前景无疑是十分可观的。而

承担德庆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和广东生产力经济研究会的同志，其眼光和务实精神，是堪佩的。

《德庆发展战略研究》就其内容来看，读后也颇多启发，给人一种思想开放、思路新颖、不落俗套的感觉。战略决策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该书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创见性和求实性的统一。战略报告从总体的框架模式到分体的战略内容，从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到发展方针政策和战略措施，作了较全面的设计论述。尤其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描述，以新的思路提出了三条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即封闭—滚动式平衡增长的传统发展道路；开放—阶跃式不平衡增长创新发展道路；滚动—阶跃相结合的双轨交叉发展道路。经过论证和选择，从中确定了走资源—技术—市场相结合的道路，实行滚动—阶跃式发展战略。显然，这个构想是符合德庆实际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超前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战略研究必须具有超前性、预见性，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德庆战略较好地二者统一起来。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根据德庆发展的历史、现状、面临的矛盾、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确定德庆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方针。另一方面，又把所确定的发展方向、目标分解为可以把握、实施的战略阶段和战略任务，并提出相应的具有直接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达到了在较高的层次把握现实，指导实践。

为了加强战略的可操作性，德庆战略很注意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入手，分析各种制约因素，提出突破战略战术制约的各种对策。如在战略总方针中提出“把资源优势、市场和新

（转108页）

《开放经济学》评介

张炳申

最近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开放经济学》一书，系广东省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沈贵进、赵瑞彰、隆江、唐大进四位同志所著，该书系统地探讨了开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了开放经济发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性，是对外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都值得一读的好书。

该书具有如下几个较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是学科建设的新尝试。尽管对外开放的理论问题，在世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以及部门经济学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专门的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很多学者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特区经济、开放城市、开放区经济也作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开放经济学学科却尚未形成。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缺陷，而且是开放经济理论滞后于开放经济实践原因之一。该书从世界范围开放经济运动的普遍性、实践的成熟性、存在的长期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出发，以创新的精神把对外经济开放问题从众多经济学科的交叉地带分离出来，作独立的、系统的探索，试图建立开放经济学的体系与框架，为我国开放经济学的学科的建立作了

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主要表现在：1. 该书从开放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入手，坚持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作为理论经济学专著，它不是首先从生产关系入手来讨论经济问题，而是从开放经济运动的内在逻辑联系出发，概括世界开放经济的实践，明确界定其发展阶段和本质特征，并进而展开讨论开放经济发生、发展与运动的客观规律。2. 该书既不是从经典作家有关国际分工、国际价值、世界市场的论述出发，进行注释，演绎一般，推导特殊；也不是用世界开放经济一般来代替中国开放经济特殊，或以中国开放经济特殊去取代世界开放经济一般；而是从丰富的开放经济实践出发，紧紧抓住开放经济运动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个出发点，通过世界范围开放经济运动的比较分析，抽象出开放经济运动的一般问题、一般理论和一般规律，并进而从中国开放经济的实践和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开放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经济理论与对策。因此，该书既具有理论的探索性，又具有实践的针对性。3. 该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注重定量分

(下转第18页)

佛山市

佛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本市社科工作者紧密围绕本市现代化建设实际，开展研究活动，积极为各级机关和企业出谋献策，1989年被省社联评为学术研究先进单位。



▲ 1989年11月佛山市社联第三届代表大会。市委副书记韩英、市委常委黄永尧、省社联副主席陈枫等亲临大会指导。



▲ 佛山市社联召开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理论研讨会”。

肇庆市

市委重视，各界支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较快，图为市委常委李魁耀（左四）与肇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同志一齐研究社会科学如何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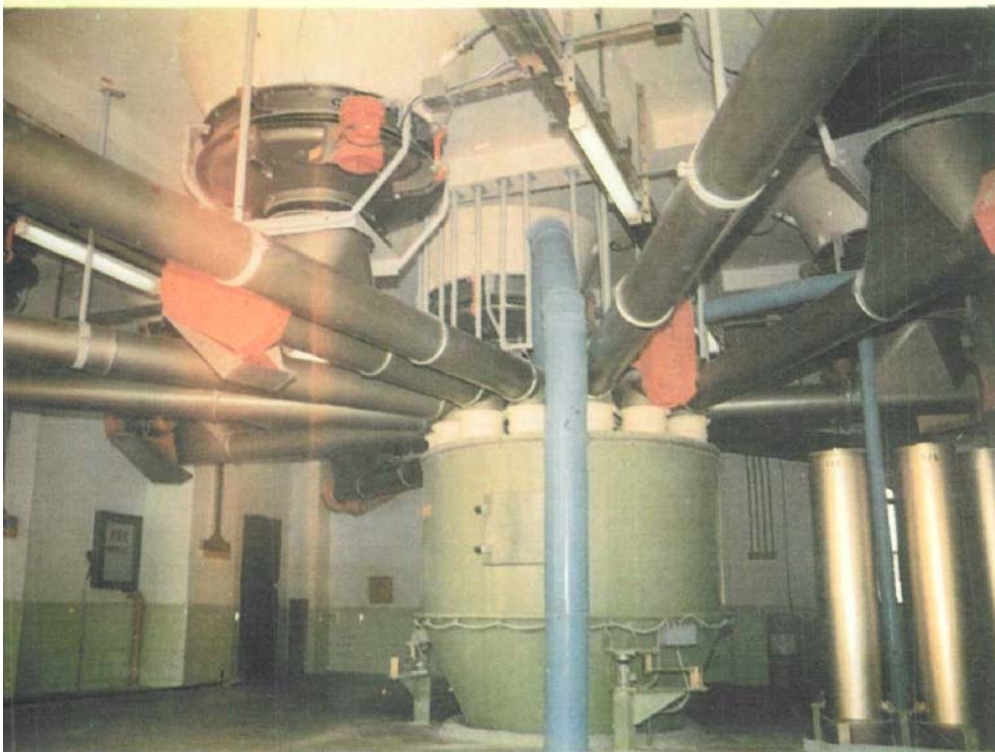
▲ 市领导来厂视察

广州市南方面粉厂 省级先进企业

《红牡丹》牌特精面粉
《白玉兰》牌高级糕点粉
《凤冠花》牌特制一等粉
1989年被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

南方面粉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大型面粉加工企业。
主要生产高、中、低筋度三大类面粉十一个品种，产品畅销全
国20个省、市和地区。

▼ 车间一角



厂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电话：525035 765847

邮政编码：510655 电挂：7844

供销办事处：广州市珠光路仓前
直街37号 电话：33211

综合商店：广州市天河区员村

黄埔大道白水塘4号 电话：52532